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十八世紀初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

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

Kim Chang-Op's Journey to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Gift and Joseon Korean's Image of Qing China.



裴英姬

Young-Hee Bae

指導教授：徐泓 博士、王鴻泰 博士

Advisor: Hong Hsu, Ph.D Hung-Tai Wang, Ph.D.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July, 2009



摘 要

過去關於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的過去論述，多是針對金昌業的出身來做探討，或以文學作品研究的角度為主，來談燕行日記的內容或寫作方式上的特色，及思想方面對北學派的影響。這其中即使有提到金昌業與清人之間的交流的敘述如何讓十八世紀後期使節得以做為典範，也均未觸及文人交流和物品交流方面的細節和代表意義。因此，本文將以 1712 年燕行使者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錄》為研究的對象，論述金昌業的燕行紀錄，與清朝文人交流過程和交換的內容，特別是在交流間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各種物品。在此過程中，不僅可揭示出兩國文人對彼此國家事務的看法，更可進一步讓我們瞭解它們在雙方文人世界、社會文化上的作用與價值，進而形塑這些文人的價值體系與異國想像。

本論文主要論述的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的討論是，主要從觀察朝鮮和清朝之間的重大事件來了解 1712 年燕行的背景。透過前者的研究，可見燕行具有固定路線、限制私帶物品、更無法買或帶中國書籍及地圖等等限制。因為如此，本文更可關注金昌業究竟私帶了哪些物品及如何就此跟清朝人接觸的議題，並進一步討論了金昌業本身和他的家庭背景。第二章是從金昌業如何與清朝人交流的疑問開始，透過中國文集上關於朝鮮物品的敘述來理解中國人對這些物品的認知。接著討論這些朝鮮物品有哪些、金昌業如何使用那些物品與清人交流的問題。筆者從《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擷取各種例子，來討論這些物品交流所產生的作用和它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意義。第三章關注的在於朝鮮使節金昌業在中國所觀察到的人、物及山川相關的描述：金昌業在中國共 146 天行程中與接觸的清人交流後如何改變對其觀感；另外金昌業在中國觀察，購買的物品有哪些；以及金昌業離開固定路線而特別去參訪的地方有哪些。

金昌業從前者的燕行日記中想像中國，得到機會往北京的路程中見聞許多名地，他以中國親自見聞過的經驗，故而寫成《老稼齋燕行日記》。之後，金昌業的日記被朝鮮人讀過，因此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的燕行紀錄中，也隱隱然可發現從金昌業對中國的態度與觀感的影響力。即金昌業對中國仍保有開放的態度，讓他更多地方經驗寫成燕行日記，這本書逐漸改變了朝鮮人對中國的看法，也許清朝的先進文物等這些都引起了朝鮮人需要學習清朝的北學態度。

關鍵字：燕行錄、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物品交流、中國觀感、山川旅遊、北學思想

Abstract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this thesis is the Yeon-haeng(燕行)envoy Kim Chang Op (金昌業)'s "*Nogajae Yeon-haeang diary*(《老稼齋煙行日記》)" in 1712. It discusses Kim Chang Op's Yeon-haeng records, interaction process and content with literati of the Qing Dynasty, particularly various things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change activitie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y not only reveal literati's opinions of these two countries towards foreign affairs with each other, but also furthermore make us understand their effects and values on the literati circle and social culture of both sides, and then shape up the value system and exotic imaginations of these literati.

The mainly-discussed content in this thesi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Chapter 1 discusses mainly about the background of the Yeon-haeng in 1712 through major incidents between Joseon and the Qing Dynasty. Chapter 2 begins with questions about how Kim Chang Op interchanged with people of the Qing Dynasty. Chapter 3 focuses on related descriptions about people, matters, landscape or scenery the Joseon envoy Kim Chang Op observed in China: how Kim Chang Op's interchange with people of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his 146-day journey in China affected his opinions, and besides, what Kim Chang Op bought and observed in China, and what places Kim Chang Op specifically visited after he left his fixed route.

Kim Chang Op imagined China through forerunners' Diary of Journey to China. He got the chance to see and hear in many famous places on his way to Beijing. He wrote the "*Nogajae Yeon-haeang Diary*" according to his seeing and hearing experiences in person in China. Afterwards, Kim Chang Op's diary was read by the Joseon people. Therefore, among those Yeon-haeng records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rough the 19th century, influences of Kim Chang Op's attitudes and opinions towards China can also be indistinctly found. In other words, Kim Chang Op still maintained an open attitude towards China, which made him finish the Diary of Journey to China according to more regional experiences. This book gradually changed the opinions of the Joseon people towards China. Perhaps things like advanced cultural relics of the Qing Dynasty all gave rise to the attitude that the Joseon people had to learn from the north,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Yeon-haeng, Kim Chang Op, *Nogajae Yeon-haeang diary*, Gift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錄	iv
緒論.....	1
第一章 十八世紀初朝鮮使行的背景與金昌業的出身.....	12
第一節 朝鮮時代對外關係中的燕行.....	12
第二節 使行貿易與文化交流.....	15
第三節 壬辰（1712）年燕行的主要事件.....	18
第四節 文人畫家金昌業.....	22
第二章 燕行路程中送禮與回禮.....	26
第一節 送禮的時機.....	26
第二節 禮品的內容.....	28
（一） 紙.....	28
（二） 扇子.....	31
（三） 清心丸.....	33
第三節 物品交流的功能.....	34
（一） 贈送.....	35
（二） 貨幣.....	37
（三） 賄賂.....	40
（四） 文化交流.....	41
第三章 人、物互動與其中國觀感.....	46
第一節 人物交流.....	46

(一) 譯官.....	47
(二) 清人.....	50
第二節 文物交流.....	55
(一) 繪畫作品.....	55
(二) 書籍.....	58
第三節 山水遊覽與書寫.....	64
結論.....	73
附錄.....	76
引用/參考書目.....	77
圖版出處.....	87



緒 論

研究目的

中國和韓國長期以來交流頻繁，明清時代朝鮮使者及隨行使團，以每年燕行的機會，寫下了各式各樣的《燕行錄》，紀錄所見過的中國文物和社會面貌，表達他們對這些新鮮事物的看法。十八世紀以降，來往兩國之間的燕行使者促成文化交流，朝鮮使者所寫的紀錄，對當時朝鮮的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有不少的影響。

清朝二百多年間，朝鮮王朝對中國實行「事大」外交方針，每年派遣稱作「三節年貢使」的「定期使」和各種「別使」，並且還有根據各種必要情況派遣的「賚咨官」等燕行使。¹目前在韓國整理出各式各樣的燕行紀錄共 500 多種，名稱為：《燕行日記》、《飲水錄》、《西行日記》、《熱河日記》、《薊山紀程》、《燕行紀事》、《燕行記》、《燕記》等。²不過，由於每年有兩次以上定期燕行，推測還會有更多目前還沒發現的紀錄。³從 1645 年（清順治二年，朝鮮仁祖二十三年）到清末每年派遣朝鮮使行，詳細地紀錄每年路程所發生的事情，朝鮮使者固定的燕行路線為經清朝滿洲地區進入北京，沿途經過柵門、鳳凰城、遼陽、瀋陽、柳條溝、撫順、山海關（秦皇島）、北京（朝陽門、東岳廟、玉河館、觀象臺、東天主堂、琉璃廠、景山、習禮亭、天安門、南天主堂）。⁴因此這些各式各樣的燕行紀錄，是十八世紀朝鮮使者針對中國社會及變化的觀察。朝鮮使者們曾廣泛地與他們所遇到的北方士大夫或平民對話，而一般人對外來的陌生人講話比較直接，朝

¹ 李敦球，〈論十八世紀後期朝鮮進步文人的中國外交使行〉，《世界歷史》第3期（北京，1998），頁81。

² 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³ 金聖九，〈燕行小考〉，《歷史學報》，12（首爾，1966），頁1-79；黃元九，〈燕行錄選集解題〉，《燕行錄選集》第1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委員會，1976），頁1-15；崔昭子，〈十八世紀後半『燕行錄』을 통해 본 朝鮮知識人의 對中國認識〉（從十八世紀後半從『燕行錄』來看朝鮮知識人對中國認識），《國史館論叢》，76（首爾，1997. 10），頁192。

⁴ 崔昭子、鄭惠仲、宋美玲點校，《十八世紀燕行錄과 中國社會》（十八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首爾：HYEAN出版社），頁30。

鮮使者下筆時又沒有清朝臣民的政治忌諱。⁵因此，在各種《燕行錄》上許多地方可見到兩國文人的互相接觸和思想文化交流。舉例來說，使行時同行的譯官和北方商業活動的面貌，是未含在兩國的官方紀錄上，不過許多朝鮮使者都對此處有詳細紀錄。

使行紀錄以「刊本」、「寫本」的方式，出現於專書或朝鮮文人私人文集中；因此，最早注意到此一材料的韓國，除了歷史領域外，來自韓國文學、漢文學等領域的研究者，也提供不同的角度和論點。尤其在 2001 年出版《燕行錄全集》之後，各國研究明清時代史的學者，可以據此發展更多新的課題。⁶

關於中韓關係，此種透過冊封與朝貢所建立的東亞國際秩序，早已是 1940 年以來各地學界關心的主題。韓國學者朴元煥對目前東亞國際秩序的理論進行了整理和批評，⁷指出西嶋定生的「冊封體制論」為最早提出的理論架構。⁸西嶋定生的觀點，以中國的王朝為主，觀察六至八世紀東亞的冊封體制開展的過程，並主張由於冊封體制，將漢字文化、儒教、律令制、大乘佛教擴展到東亞各地。⁹朴元煥認為，「東亞世界論」、「朝貢體制論」都是以西嶋定生的理論為基礎，更進一步發展出來的理論。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則在 1941 年提出「朝貢體制（Tributary system）論」來解釋東亞世界。¹⁰1968 年，費正清在其所主編的論文集序論中，將西嶋定生對中國文化地區的定義擴大，甚至包含內陸亞洲以及東南亞各地。¹¹之後，「冊封體制論」、「朝貢體制論」受到許多學者的補充說明或批評。¹²

⁵ 王汎森，〈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第1號（大阪，2008.3），頁 94。

⁶ 關於中日韓學界對《燕行錄》研究的介紹，請參閱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43（臺北，2009.6），頁219-255。

⁷ 朴元煥，〈近代以前中韓關係史에 대한視覚과論點：동아시아國際秩序의理論을덧붙여〉（關於近代以前中韓關係史的視覚與論點：加以東亞國際秩序的理論），《韓國史市民講座》，40：1（首爾，2007），頁 40-58。

⁸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體制——六～八世紀の東アジア〉（東亞世界與冊封體制——六至八世紀的東亞），岩波講座《日本歷史》，2（東京：岩波書店，1962）。

⁹ 西嶋定生，〈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I・總說〉（東亞世界的形成 I・總說），岩波講座《世界歷史》，4（東京：岩波書店，1970）。

¹⁰ 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 (1941).

¹¹ John K.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¹² 菊池英夫，〈總說——研究史的回顧と展望〉（總說——研究史的回顧與展望），收入唐代史研究會編，《隋唐帝國と東アジア世界》（隋唐帝國與東亞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67）；堀敏一，〈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 II・總說〉（東亞世界的形成 II・總說），岩波講座《世界歷史》，5（東京：岩波書店，1970）；猪口孝，〈傳統的東アジア世界秩序試論〉（傳統的東亞世界秩序試論），《國際法外交雜誌》73：5（1975），頁 57-68。

韓國學者全海宗，以朝貢關係的成立、發展、變質等各時代變化過程，研究韓中關係史，在他的研究中，明清時代的朝貢關係是中韓關係的典範。¹³至於朝鮮經過二次與清朝的戰爭之後，重新建立的朝貢關係，則又有轉變，崔韶子對此問題有許多研究。他寫於1995年的論文〈清與朝鮮——從明清交替期東亞洲的國際秩序〉，以朝鮮的外交觀點談兩國關係之變化，在處理第一次丁卯胡亂（1627）及第二次丙子胡亂（1636）兩次戰爭前後，¹⁴中國和朝鮮之間關係的演變，包括朝鮮與清朝在1637年訂立條約，昭顯世子（1612-1645）因而被派到當時清朝首都瀋陽當人質，並中止對明朝貢及斷交等事件。¹⁵台灣學者張存武則關注清朝以後兩國的互動。他利用清朝（崇德二年至光緒二十年，1637-1894）與朝鮮關係相關史料，分析兩國關係發展的背景外，也討論各類朝鮮朝貢使節在兩國間來往的使行貿易，尤其是在北京會同館及遼東的交易。他把討論空間集中在中國北方，也就是鴨綠江、圖們江流域朝鮮境內的會寧和慶源三處邊市，透過統計和分析各種貿易的項目，提供了交易數額及物價資料。他不但觀察中韓兩國之間因朝貢而出現的貿易，也參照清代與其他朝貢國家，如安南、琉球等之間的貿易及其變動。¹⁶

至於日本學界對中韓朝貢關係的研究，則大多在東亞政治外交的脈絡下，企圖透過研究中國與朝鮮的交流狀況，瞭解日本與週邊地區（包括琉球等地）的交流關係。日本學者夫馬進，則分別以明清時代中國對朝貢國家朝鮮和越南（安南）的關係進行比較，討論中國對東亞國家的冊封和政策。他指出，清乾隆時期的冊封，對於朝鮮和越南的意義並不一樣。對越南而言，中國冊封並沒有那麼大的象徵意義。¹⁷此外，他探討明清時期東亞朝貢關係中的「禮」與「問罪」的形式，明清兩代對朝鮮外交關係不同的原因，與朝鮮內部之華夷觀念有密切關係。他利用政治上的外交文書和冊封制度，對這一點進行深入的析論。

18

¹³ 全海宗，《韓中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0）。

¹⁴ 即朝鮮與清朝的戰爭。

¹⁵ 崔韶子，〈清과朝鮮——明清交替期東亞洲의國際秩序에서〉（清與朝鮮——明清交替期東亞國際秩序），《梨花史學研究》，22（首爾，1995.12），頁183-196。

¹⁶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¹⁷ 夫馬進，〈明清中国による対朝鮮外交の鏡としての対ベトナム外交——冊封問題と「問罪の師」を中心に〉（明清中国作為對朝鮮外交之鏡的對越南外交——以冊封問題與「問罪之師」為中心），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中國東亞外交交流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會，2007），頁225-252。

¹⁸ 夫馬進，〈明清中国の対朝鮮外交における「礼」と「問罪」〉（明清中國對朝鮮外交中「礼」和「問罪」），《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頁311-353。

關於中韓朝貢關係史的研究中，朝貢關係的課題可以說是最早被關心的議題。在中韓關係以及東亞世界秩序的脈絡中，韓中日三國學界都已經注意到朝鮮與明、清兩朝的朝貢關係，並討論兩代之間的差異。而學者討論朝貢關係，也從原本的政治關係，逐漸擴展到以經濟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日本學者更把討論視野延伸至琉球與越南等地，作為比較與參照。

朝鮮王朝後期思想史領域，尤其以「實學思想」的形成相關研究而言，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號湛軒，1766年燕行）的思想所受到的關注最早，千寬宇在1958年的實學思想相關論文，而北學派¹⁹文人思想潮流相關研究也最為豐富。²⁰學者透過這本書，討論北學思想形成和推動的過程，並探討北學派對於社會經濟方面的看法，將其稱為「利用厚生學派」。²¹韓國學者劉奉學是從明末清初朝鮮對外意識變化，注意到北學意識如何形成，再以北學思想家對朝鮮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作用為例，討論北學論在朝鮮形成和傳佈的整個過程。²²此研究對於了解當時朝鮮文人的思想潮流、歷史背景及政治文化很有幫助。

北學派文人的重要性，在於他們主張脫離「小中華」的觀念，積極學習清朝。但對於這一段思想史的演變，夫馬進則提出了不盡相同的觀察。他在1990年的文章〈萬曆二年朝鮮使節的中華國批判〉中指出，就目前〈燕行錄〉的研究而言，多數學者只集中在北學派文人的研究上，他主張，應該將考察時間拉長，特別要注意十八世紀北學派思想出現前的狀況。夫馬進就研究萬曆二年（1574）兩個朝鮮使節的著作：許筠

¹⁹ 「北學」指的是朝鮮英、正祖時代（1694-1800）以後，主張學習清朝學術、文物的朝鮮文人主張。「北學派」的代表成員如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號燕巖，1780年燕行）、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號湛軒，1766年燕行）、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號雅亭、炯菴、青莊館，1788年燕行）、朴齊家（1750-1805，字次修、在先，號貞蕤、楚亭）等；「利用厚生」為這些北學派學者所主張的學說，關於「北學派」、「利用厚生」學說之詳細研究請參閱，陳尙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

²⁰ 千寬宇，〈洪大容的實學思想〉，《文理大學報》，6：2（首爾，1958）；金龍德，〈貞蕤朴齊家研究〉，《史學研究》，10（首爾，1961）；閔斗基，〈熱河日記的一研究〉，《歷史學報》，20（首爾，1963）；李家源，《燕巖小說研究》（首爾：乙酉文化社，1965）。

²¹ 金龍德，〈貞蕤朴齊家研究〉，《史學研究》，10（首爾，1961）；金容燮，〈朝鮮後期農學的發達〉，《首爾大學校韓國文化研究所韓國文化研究叢書》第2期，（首爾：1970）；金容燮，《韓國近代農業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5）；韓佑勳，《李朝後期社會及思想》（首爾：乙酉文化社，1961）；李元淳，〈朝鮮後期實學者的西學意識〉，《歷史教育》，17（首爾，1975）；李元淳，〈韓國近代文化的西歐基礎〉，《韓國史學》第1期，（城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2）；朴忠錫，《韓國政治思想史》（首爾：SAMYOUNG社，1982）；韓永愚，《朝鮮後期史學史研究》（首爾：一志社，1989）。

²² 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

(1551-1588)《荷谷先生朝天記》和趙憲(1544-1592)《朝天日記》，以此觀察明代朝鮮人的中國及中華觀。結果發現，這兩位使節並沒有對明朝有著強烈的嚮往。²³也就是說，朝鮮對於中國的態度，是否真的存在推崇明朝的「小中華」思想或華夷觀念，其實仍然值得商榷。

葛兆光注意到燕行使節觀察清代衣冠的變化，他廣泛地引用從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許多燕行紀錄，指出當時朝鮮人的衣冠是「明朝遺制」，這表示朝鮮人對明朝的嚮往。但是葛氏也提出，這樣的服飾到了明清易代以後，卻具有確立朝鮮文明主體性的意義，使得朝鮮人可以自豪地宣稱自己是「小中華」，而中國是「夷狄之邦」。²⁴關於以衣冠為主的討論，呈現出當時朝鮮人對中國的認識，另一方面也可以觀察中國人對清朝的觀念如何。另外，他在〈從「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一文中，從「他者」來定位「自我」的角度出發，討論朝鮮對明、清兩代觀點的轉變，尤其是朝鮮人如何由排拒清人到逐漸接納，甚至視清為「中華」的過程。此外，朝鮮人經過對清朝文化與學術的觀察，他們清楚認知，明、清其實是不一樣的異國。²⁵接著，葛兆光以朝鮮使者《燕行錄》和日本長崎唐船員的筆談內容，更進一步討論十七世紀以後東亞三國的認同問題，透過朝鮮和日本人對清朝的觀念，作者認為，「東亞」、「中華」意識已經漸漸崩潰。²⁶劉靜在〈從《燕行錄》看十八世紀中國北方市集——兼論中朝文化交流與文化差異〉一文，以十八世紀的《燕行錄》來討論朝鮮使節所紀載的中國北方市集，如柵門、通州、盛京和北京等相關描述，指出市集上的招牌、叫賣、娛樂文化，並且呈現出在北京琉璃廠兩國文人交流的面貌。劉氏指出十八世紀後期朝鮮文人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情形都有一定的了解，透過他們的觀察以及與中國人士交流，改變了朝鮮人的傳統華夷觀念。²⁷至於孫衛國則廣泛地參考了朝鮮的資料，並在中韓文獻以及日英文的相關資料上，從朝鮮的角度來看朝鮮對中國的意識變化，並分析明清兩代中韓關係明顯差異。²⁸本書深入分

²³ 夫馬進，〈萬曆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国批判〉（萬曆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国批判），收入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 547-569。

²⁴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第 10 期（開封，2005），頁 41-48。

²⁵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十七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第 1 期（上海，2006），頁 28-58。

²⁶ 葛兆光，〈西方與東方，或者是東方與西方——清代中葉朝鮮與日本對中國的觀感〉，收入葛氏，《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 204-223。

²⁷ 劉靜，〈從《燕行錄》看十八世紀中國北方市集——兼論中朝文化交流與文化差異〉，《北京社會科學》，第 3 期（北京，2006），頁 34-38。

²⁸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

析朝鮮思想的流變，讓讀者理解朝鮮產生小中華意識的時代氛圍，以及韓國學界對此領域的研究取向和成果。

以上回顧了學界對於明清時代朝鮮華夷觀念演變的研究，從 1990 年代以來，這是許多學者注意討論過的議題。學者曾深入分析了朝鮮人對中國的認識，不過，除了少數研究之外，大都是以清代、尤其朴趾源等北學派文人的文集為主。原因就是北學派文人引起了實學思想，而被學界重視。不過，夫馬進的研究提醒我們，只靠十八世紀後期北學派文人的燕行錄來討論朝鮮人的華夷觀念，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如果他的結論是正確的，那我們現在對朝鮮思想的理解，應該還需要修正。而對《燕行錄》研究者而言，明代或十八世紀前期的燕行紀錄，也還具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討論。金昌業的燕行紀錄是其中之一，尤其對北學派文人而言，作為很有參考價值的紀錄。雖然如此，過去學界比較沒有注意到金昌業燕行紀錄以及他對北學派文人的影響等。²⁹筆者的疑問則是從這點開始：朴趾源等北學派文人的中國觀感，是否有受金昌業燕行紀錄的影響。本文討論，亦將觸及此問題。

過去針對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主要材料的論述中，韓國文學領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和論點。早期論述有朴智鮮在 1996 年的博士論文〈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是以文學作品分析的方式，解析《老稼齋燕行日記》的詳細內容，及對洪大容、朴趾源的影響。該文的主要討論觀點為書志學的角度，考證金昌業的生平和《老稼齋燕行日記》的不同版本，也納入了金昌業文集中的燕行詩。³⁰本論文是首次提出十八世紀初期金昌業燕行使記錄的重要性，還聯接到十八世紀後期洪大容和朴趾源的燕行記錄。同樣，金賢漢的〈十八世紀《燕行錄》的展開及特性研究〉論述，也是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洪大容《湛軒燕記》和朴趾源《熱河日記》為主，討論作著的意識和敘述面貌。³¹雖然這兩文都是以文學的角度看《老稼齋燕行日記》，不過更可發現金昌業的燕行日記對後代《燕行路》的極大影響力，也可以推論金昌業對北學派文人的影響。

務印書館，2007)。

²⁹ 請參考崔韶子、鄭惠仲、宋美玲點校，《十八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十八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首爾：HYEAN出版社，2007）。這本書是十八世紀的《燕行錄》中，選出金昌業（1712年燕行）、洪大容（1765-1766年燕行）、朴趾源（1780年燕行）的燕行紀錄，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的四個部分分類整理，並加以點校。這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透過金昌業、洪大容、朴趾源的燕行紀錄，韓國人對中國觀感的變化，而討論的時間集中於十八世紀初期，尤其是過去忽略的。

³⁰ 朴智鮮，〈金昌業의《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首爾：高麗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1996）。

³¹ 金賢漢，〈十八世紀《燕行錄》의展開及特性研究〉（十八世紀《燕行錄》的展開與特性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2004）。

高蓮姬的《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一書，是由其 2000 年的博士論文發展而來，內容針對金昌業兄長金昌協（1651-1708，字仲和，號農巖、三洲）和金昌翁（1653-1722，字子益，號三淵）為主，和他們與朝鮮畫家鄭澈的互動。作者主要利用金昌協和金昌翁的文集中的內容，來呈現出他們兄弟的藝文觀點，更進一步討論金昌業家人對清朝的觀感，以及贊助朝鮮畫家。³²本論文是以文學和藝術史的角度切入，由於高蓮姬的研究角度及方法，與藝術史學者所關注的焦點有所不同，而引起學界的討論和注意。

這些討論引起了筆者對金昌業文人畫家身份的興趣，及其長久以來接觸中國文物的家



圖一 金昌業，《秋江晚泊圖》。

庭背景。尤其是《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呈現出來的金昌業與清人之間交流的過程中文人畫家的面貌，所以更想進一步觀察兩國文人交流中的文化傳播。筆者比較關注的是，從金昌業私帶的物品來觀察金昌業對中國的觀感如何。透過十八世紀初金昌業的燕行紀錄，來論述兩國文人的文化交流過程。中朝雖語言不同，但仍能以漢文筆談、交換漢詩、書籍、繪畫等物品。這些物質文化交流的視野，值得進行深入的討論，尤其朝鮮文人的如何認識中國物品最值得重視。金昌業是詩書畫

力固相當出名的朝鮮文人，在他的燕行紀錄中，詳細記載兩國人物之間的物品交流；可以藉由再進一步觀察雙方文人如何使用、看待、理解這些物品，而物品的選擇與交換，如何形塑了這些文人的價值體系與異國想像等。以《燕行錄》史料來討論，這種物質文化交流的問題，是過去研究者沒有注意到的，也有待研究者更多的討論。

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這是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朝鮮肅宗三十八年）

³² 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首爾：一志社，2001）；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文學紀遊圖比較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2000）。

他的兄金昌集（1648-1772，字汝成，號夢窩）被派遣到燕京時，金昌業一同前去而寫下的紀錄。金昌業燕行的那年，使臣的行動範圍，與清朝前期狀況有所不同，可自由自在離開住宿的地方，也可以與當地人接觸交流、買賣書籍或地圖等。³³

金昌業，在詩文、山水畫、人物畫方面特別著名。後其傳世的作品《秋江晚泊圖》（圖一）和《宋時烈肖像》（圖六），了解金昌業在此方面有相當高的水準，及其對書法或繪畫方面的鑑賞能力。對於燕行過程中所看到的作品，他都有描述自己的感想以及看法；另外，也可以看到他在燕行之前，已經讀過前人的紀錄，而對清朝有相當豐富的知識。不過，這些燕行紀錄，雖然對當時清朝城市生活、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有廣泛的觀察，也可能只是反映觀察者個人的看法。對此，我們不妨也比較當時清朝當地文人的記載，思考這些紀錄是否正確，又反映出了怎麼樣的異國想像。

十八世紀北學派文人如朴趾源及洪大容、李德懋，他們的燕行紀錄與前期有所不同，比如對「清朝」、「中華」、「華夷觀」出現意識上的變化，逐漸改變當時所謂「尊周」、「思明」思想。燕行紀錄上所敘述對清朝的見聞，形成以學習清代為重心的北學派，也引發了當時朝鮮文人的北學意識。這一點，研究兩國文化交流的學者大多已經注意到，對朴趾源等人燕行紀錄研究尤其多。朝鮮思想史學界，之所以重視這些北學派文人對清朝的看法，原因在於他們推動了朝鮮後期「實學思想」的形成。然而，從這些所謂北學派文人的燕行紀錄中，也隱隱然可發現從金昌業燕行紀錄的影響力。如 1832 年（道光十二年，純祖三十二年）金景善（1788~？，字汝行，詩號貞文）的《燕轅直指》的序論中提到：

適燕者多紀其行，而三家最著，稼齋金氏、湛軒洪氏、燕巖朴氏也。以史例則稼近於編年，而平實條暢；洪沿乎紀事，而典雅縝密；朴類夫立傳，而瞻麗閎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長，繼此而欲紀其行者，又何以加焉。³⁴

除此之外，在朴趾源的《熱河日記》和洪大容的《湛軒燕記》中，對於北京各地的理解，也有許多來自金昌業燕行紀錄的描述。這些紀錄顯示，金昌業的燕行紀錄，影響力從十八世紀中後期，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如燕行使金景善等朝鮮文人，都透過閱讀金昌業的紀錄，形成對中國的印象。³⁵

³³ 宋美玲，〈想像속의中國——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을통해본清朝의統治〉（想像中的中國—從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看清朝的統治），收入崔韶子教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東亞歷史中的中國與韓國》（首爾：西海文集，2005），頁147。

³⁴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0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卷一，〈序〉，頁246。

³⁵ 鄭惠仲，〈十八世紀朝鮮선비의北京여행〉（十八世紀朝鮮士人的北京之遊），收入崔韶子教

綜上所述，關於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的過去論述，多是針對金昌業的出身來做探討，或以文學作品研究的角度為主，來談燕行日記的內容或寫作方式上的特色，及思想方面對北學派的影響。這其中即使有提到金昌業與清人之間的交流的敘述如何讓十八世紀後期使節得以做為典範，也均未觸及文人交流和物品交流方面的細節和代表意義。因此，本文將以 1712 年燕行使者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錄》為研究的對象，論述金昌業的燕行紀錄，與清朝文人交流過程和交換的內容，特別是在交流間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各種物品。在此過程中，不僅可揭示出兩國文人對彼此國家事務的看法，更可進一步讓我們瞭解它們在雙方文人世界、社會文化上的作用與價值，進而形塑這些文人的價值體系與異國想像。

研究方法與結構

《燕行錄》為明清時代朝鮮人即依據在北京（燕京）、瀋陽、熱河等地的經驗，撰寫成各式各樣的紀錄，這些紀錄後來被學界彙集而成。從 1960 年，隸屬韓國成均館大學校的大東文化研究院出版了《燕行錄選集》上、下兩冊；³⁶1965 年設立的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則在 1976 年挑選 20 篇燕行紀錄，將其譯為韓文並加附原文出版，即《國譯燕行錄選集》。³⁷此外，除了《朝鮮王朝實錄》和《承政院日記》，還有 115 種漢文古典文集被譯成韓文，計 1100 本。³⁸其次，韓國東國大學名譽教授林基中，於 2001 年編選出版了《燕行錄全集》100 本，並於 2008 年繼續出版《續集》50 本，將這些重要的史料更加完整地提供給學界，以推動後學的研究與運用。成均館大學校的大東文化研究院 2008 年又新出版《燕行錄選集補遺》三冊。³⁹除了韓國之外，2001 年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夫馬進也收集整理，並與林基中共同出版了《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篇》。⁴⁰綜觀現今已發掘的明清時代約 500 年間之各種《燕行錄》內容，多數未做解題，且整體、系統性的研究成果也仍不足。

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東亞歷史中的中國與韓國》（首爾：西海文集，2005），頁 127-129。

³⁶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上、下冊（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60）。

³⁷ 民族文化推進會，《國譯燕行錄選集》10 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

³⁸ 上述百餘種古典文集可於「韓國古典翻譯院」（原稱「民族文化推進會」）網站檢索：<http://www.itkc.or.kr>。

³⁹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補遺》3 冊（首爾：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

⁴⁰ 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篇》3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文學研究所，2001）。

本文即以藏在奎章閣版本之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主要史料之外，⁴¹也包含了金昌業的文集《老稼齋集》、金昌業兄長金昌集的文集《夢窩集》，以及同一年派往燕京的崔德中的《燕行紀》做為參考。透過前者的研究，也追補金昌業的其兄弟金昌協的《農嚴集》；金昌翁的《三淵集》；金昌緝的《圃陰集》。為了觀察金昌業使行記錄對後代朝鮮人的影響，透過朝鮮文人的其他燕行記錄，也參考金昌業後代文人對此燕行錄的評價，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等。

本論文主要論述的內容可分為三個部分。首先，第一章的討論是，主要從觀察朝鮮和清朝之間的重大事件來了解 1712 年燕行的背景。透過前者的研究，可見燕行具有固定路線、限制私帶物品、更無法買或帶中國書籍及地圖等等限制。因為如此，本文更可關注金昌業究竟私帶了哪些物品及如何就此跟清朝人接觸的議題，並進一步討論了金昌業本身和他的家庭背景。為了討論這些議題，除了主要參考前者的研究成果以外，還參考了《朝鮮王朝實錄》、《同文彙考》和《清實錄》等朝鮮和中國的官方資料，以及其他相關燕行日記來加以比較。

第二章是從金昌業如何與清朝人交流的疑問開始，透過中國文集上關於朝鮮物品的敘述來理解中國人對這些物品的認知。接著討論這些朝鮮物品有哪些、金昌業如何使用那些物品與清人交流的問題。筆者從《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擷取各種例子，來討論這些物品交流所產生的作用和它在中朝文化交流中的意義。本文主要討論的歷史背景和物品有關的紀錄，除了前文提及的中韓官方資料之外，還有同時代清文人的文集。關於這些朝鮮文人之燕行見聞紀錄，將會再利用相關清代文人的文字資料來加以比對，以瞭解雙方對異國和異國物品的焦點與理解有何異同。

第三章關注的在於朝鮮使節金昌業在中國所觀察到的人、物及山川相關的描述：金昌業在中國共 146 天行程中與接觸的清人交流後如何改變對其觀感；另外金昌業在中國觀察，購買的物品有哪些；以及金昌業離開固定路線而特別去參訪的地方有哪些。為此討論，亦將試圖追索中國地方志上，是否也記載著朝鮮使臣或他們所帶過來的物品的相關資料，如金昌業曾經參考的《大興縣志》、《清一統志》等史料。同時，目前的學界還沒有出現

⁴¹ 奎章閣版本的標題為《稼齋燕行日記》，每冊卷頭書名《老稼齋燕行日記》，共九卷六冊，每頁十行24字，供754頁。同一版本的內容也收錄在民族文化推進會，《國譯燕行錄選集》第四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見民族文化推進會，《國譯燕行錄選集》第四冊，〈解題〉，（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76），頁7。

針對物品交流的討論，因此筆者打算引用藝術史、書籍史領域的研究成果，來加以比對進行探討。



第一章 十八世紀初朝鮮使行的背景與金昌業的出身

第一節 朝鮮時代（1329-1910）對外關係中的燕行

明清時代朝鮮使節往中國使行，通常朝鮮前期派遣往明朝的使行紀錄稱為《朝天錄》，表示朝鮮對明朝的事大關係的一面。經過 1638 年丙子胡亂，⁴²1644 年的清入關後朝鮮和清朝，仍然保持著事大關係，不過從順治二年（1645 年，朝鮮仁祖二十三年）至光緒十九年（1893 年，朝鮮高宗三十年），對清朝的使行紀錄被稱為《燕行錄》，使行紀錄名稱從《朝天錄》改為《燕行錄》，呈現出朝鮮對清朝的使行意識與前期有所不同。

在朝鮮時代朝鮮對外交的窗口，是與中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之間的交流，交流的方式以派往中國的燕行使，及派往日本的通信使為主。尤其朝鮮對清朝燕行的期間大約 250 年，以每年兩次以上的燕行來推測，歷代以來燕行次數至少有 498 次，再加上非定期使行「別使」等，則燕行的總數可推測為 700 次以上。⁴³相較而言，朝鮮派遣日本的通信使，從 1607 年（朝鮮宣祖四十年，明萬曆三十五年，江戶慶長十二年）至 1811 年（朝鮮純祖十一年，清嘉慶十六年，江戶文化八年）為止僅 12 次。朝鮮的外交關係，不但集中於中國，而且朝鮮使節對中國文物的關心和興趣也相當深入，使節所寫的各种紀錄，詳細記載了使節往燕京的見聞和文化經驗。

朝鮮使節到中國主要目的為「朝貢」、「冊封」，並交遞朝鮮的外交文書，在《同文彙考》中可以見到兩國之間所來往的公式文書和歲幣、方物的品目的內容。這些文書可分為兩種，朝鮮國王跟中國皇帝往來的文書稱為「表文」、「箋文」、「祭文」、「奏文」，而對兩國朝廷之間的公式文則稱為「咨文」、「申文」、「呈文」、「單子」等。⁴⁴因此使節入京後各次燕行都有「表咨文呈納」的形式，使節回朝鮮時，也是帶回中國的「回表」

⁴² 即朝鮮與清朝的戰爭。

⁴³ 從 1271 年開始至 1893 年為止各朝，由朝鮮使節往中國使行的次數，元代（1271-1368）1 次、明代（1368-1636）82 次、清代（1637-1912）497 次等共 579 次。見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頁 11。

⁴⁴ 金暎綠，〈朝鮮時代朝貢體制와對中國使行〉（朝鮮時代朝貢體制及對中國使行，《明清史研究》30（首爾，2008.10），頁91-128。

或「回咨」等，相當於朝鮮的國王或朝廷之間各事件之回信內容。

朝鮮對清朝朝貢的類別，可分為「節使」和「別使」兩種。節使一年四次的定期使行如「冬至使」、「正朝使」、「聖節使」、「千秋使」，另外別使則是因特殊狀況而進行的非定期使節如「謝恩使」、「奏請使」、「陳慰使」、「進香使」、「問安使」、「賚咨行」等。⁴⁵從 1645 年以後，也可見到將節使和別使組成爲「兼行」。使行使節的基本成員爲使臣（正使、副使）2 名、書狀官 1 名、大通官 3 名、押物官 24 名等共 30 名，不過這其實不是固定的，例如「別行」，「告訃行」大約 20 名；「節行」中的「冬至行」則最多 35 名等。再加上同行的醫員、畫員、軍官、書者、馬頭等，整個成員的人數其實高達幾百個人。相對而言，中國將派遣朝鮮的使臣冊封爲「勅使」，按照《使朝鮮錄》可知被派往朝鮮的使節紀錄，是明代 9 種、清代 6 種，與朝鮮相比次數明顯變少，⁴⁶不過仍是呈現兩國外交關係的重要史料。透過《同文彙考》補編卷九〈詔勅錄〉及《迎接都藍》等官方史料，可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朝鮮時期對明朝之使行，可分為海路和陸路兩種路線。從 1368 年開始至 1420 年，明朝的首都在金陵（南京）時，多以海陸爲主往明朝使行。十四世紀末的元末明初及十七世紀初的明末清初時，因遼東和遼西地區由女真族佔領，所以無法選擇陸路使行，而選擇搭船經過登州（蓬萊）和遼東半島的旅順口等地。1421 年遷都北京以後，則開始以陸路爲主要使行路線，大致上都通過漢城至義州、義州至遼陽、遼陽至山海關、山海關至北京的四個階段。⁴⁷其中 1677 年（清康熙十六年，朝鮮肅宗三年）開始改路線爲經過盛京（瀋陽），⁴⁸於是 1712 年金昌業所經過的陸路地區爲：漢城至義州（漢城弘濟院、高陽、坡州、松都、平山、瑞興、鳳山、黃州、中和、平陽、順安、肅川、安州、嘉山、定州、宣川、良策站）；義州至瀋陽（義州、九連城、沙屯地、鳳城、松站、通遠堡、連山關、聒水站、狼子山、新遼東、十里浦）；瀋陽至山海關（瀋陽、孤家子、白旗堡、小黑山、新廣寧、十三山、小陵河站、高橋鋪、寧遠衛、東關驛、兩水河）；山海關至北京（山海關、榆關、永平府、沙河驛、豐潤縣、玉田縣、薊州、三河縣、通州）（圖二）。⁴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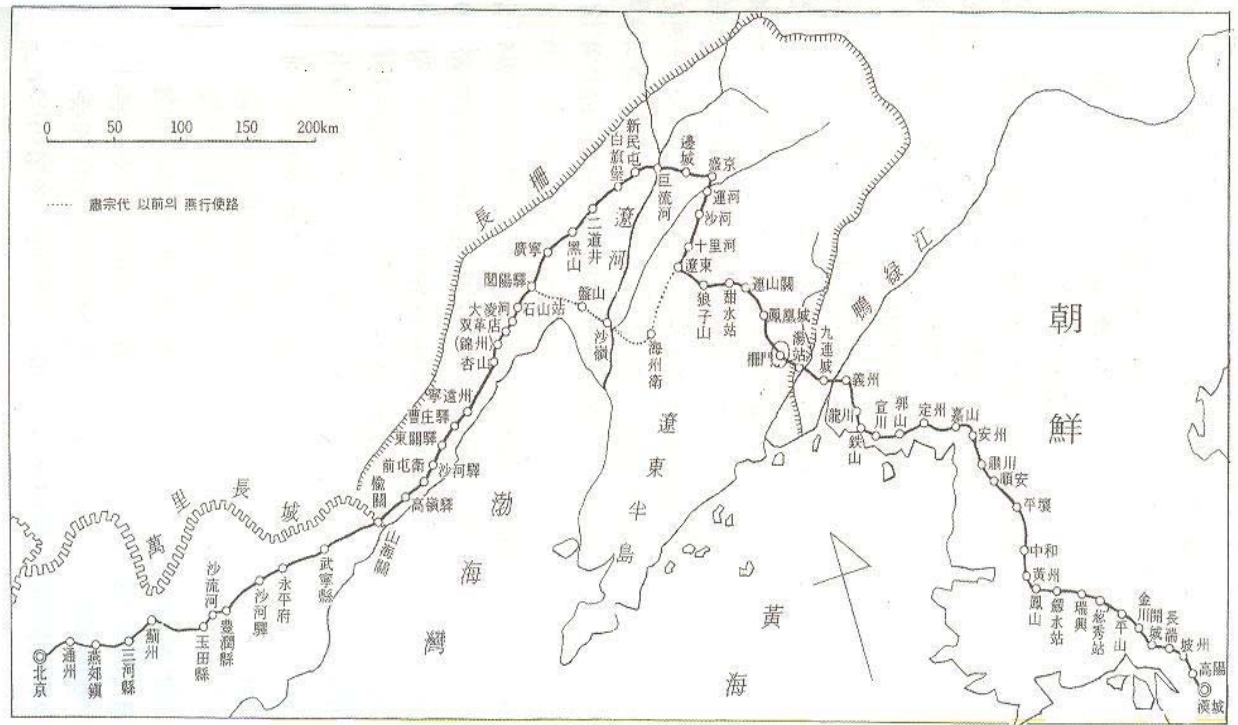
⁴⁵ 金暉綠，〈朝鮮時代朝貢體制及對中國使行〉，頁91-128。

⁴⁶ 丘凡真，〈清의朝鮮使行人選과「大清帝國體制」〉（清對朝鮮使行人選和大清帝國體制），《（首爾大學校）人文論叢》，59（首爾，2008.6），頁 180-181。

⁴⁷ 鄭恩主，〈朝鮮時代明清使行關聯繪畫研究〉（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美術史學博士論文，2008），頁16-18。

⁴⁸ 閻章閣資料叢書官署志篇，《通文館志》上（首爾：首爾大學校閻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頁162-163。

⁴⁹ 朴智鮮，〈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首爾：高麗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1996），



圖二 燕行路程圖

使行的陸路路線經過明清時代幾乎都沒有很大的改變，因此金昌業常常引用前者燕行紀錄中的描述，並加以比較，如往往被引用的父親金壽恒燕行紀錄中所描述。⁵⁰尤其，外國使節到北京有滯留住宿的地方「玉河館」，⁵¹則是金昌業的父親在清順治十年（1653年，朝鮮孝宗四年）和康熙十二年（1673年，朝鮮顯宗十四年）派往北京時所住的地方，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描述：「玉河館三面皆高牆，南邊是大路，而又有人家隔之，舉頭無所見，但聞往來車馬聲而已。東牆外有一小廟堂，立一竿懸紅燈，自是日始然，至二月乃止。」⁵²該年正使金昌集也是在玉河館停留中回想起父親，並在他的文集《夢窩集·燕行墳簾錄》中寫下詩文：

東來冠蓋入燕都，觸事那堪感慨俱。三世使星前後繼，百年文物古今殊。

頁 76-79。

⁵⁰ 見先君《癸丑日記》，又：以院中甃塔，或謂是崇禎皇帝妹所藏處。今之云無，乃以此而訛傳耶。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5日。

⁵¹ 根據松浦章〈明清時代北京的會同館〉的研究，可知明朝建國之初，蕃國和外國使節來朝之際，在京師設有宿舍「會同館」，不過明代的北京會同館，是與在皇城內的玉河橋鄰接之地，該會同館之南館，被朝鮮使節等人別稱為「玉河館」。會同館有北館和南館二所，朝鮮等使節稱南館所在地為玉河館。見松浦章，〈明清時代北京的會同館〉，收入松浦章編，《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朝鮮使節與飄着船》（台北：樂學書局，2002），頁 47-72。

⁵²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9日。

敢言專對追先武，但把遺篇驗舊途。不肖縱慚多忝墜，橐中應復越金無。

53

依據這些金昌業燕行紀錄中對所見之處的描述，及與前者燕行紀錄加以比較，可知明清時期陸路路線幾乎固定，甚至到十九世紀初朝鮮使節仍然描述了幾乎同一條路線上所發生的事情和周遭的變化。

第二節 使行貿易與文化交流

朝鮮每年向清朝獻納方物及巨額歲幣，清朝也回給各種中國物產，此種政治上的關係仍然可視做是一種兩國的貿易，研究東亞朝貢體系的學者便稱呼朝貢為「公貿易」。⁵⁴另一方面，固定的朝貢路線中，也出現了貿易現象，也就是兩國在鴨綠江下游中的中江，朝鮮咸鏡道地區的會寧、慶源，以及兩國使節往來途中，相互都有貿易或販賣的活動，即所謂的「邊市貿易」。⁵⁵在燕行記錄中，經常描述這些北方地區的邊市活動：如清朝派往朝鮮的兀喇⁵⁶摠管穆克登（1664-1735），為了定界兩國的邊境而經過這些地區的時候，便聽說會寧開市中，發生寧古塔人強買朝鮮物品的事件。⁵⁷此外，朝鮮使節往來中國時，也會在柵門後市進行貿易：朝鮮使節在柵門辦理入境檢查手續，使節和商人便順載貨物至柵門進行貿易。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注意到來往燕京過程中所見到的，關於北方商業活動的面貌。例如，經過錦州衛附近見到從蒙古往北京路上中的市集；⁵⁸經過瀋陽時，描述興盛

⁵³ 金昌集，《夢窩集·燕行墳簾錄》，〈玉河館感懷〉，頁158_064a。見尹景喜，〈十八世紀初壯洞金氏일문의燕行體驗——金昌集《燕行墳簾錄》을中心으로〉（十八世紀初壯洞金氏家族的燕行體驗——以金昌集《燕行墳簾錄》為中心），《漢字漢文教育》，19（首爾，2007），頁325-349。

⁵⁴ 關於朝貢貿易相關中日韓代表著作請參閱全海宗，〈清代韓中朝貢關係考〉，《韓中關係史研究》（首爾：一潮閣，1970）；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國際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⁵⁵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61。

⁵⁶ 「兀喇」在於遼寧省附近。金昌業往燕京途中，看見從兀喇地方為進貢往北京的使行團：「瀋陽以後，路中車馬益多，而向西去者尤多，獐鹿豕及木物所載之車，皆自寧古塔兀喇地方來。趁歲時入京者，其自西來者，皆載茶麵布帛，或有空車，是則遼瀋商賈，回自關內者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壬辰年12月8日。

⁵⁷ 我於北道往來，聞會寧開市，寧古塔人，抑買朝鮮人之物。歸奏皇帝，皇帝曰，朕亦嘗聞此，當加警飭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6日。

⁵⁸ 村中男女稍稍來集，見其狀，乃蒙古之種也。錦州城西北十里許有帶山，其外則盡為蒙古地方，近或五六十里。而蒙古往北京者，皆取道于此；故道路間往來者，太半是蒙古。鹿茸麝香之多，以此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八，癸巳年2月28日。

的當地市集；⁵⁹關於「柵門後市」的描述，⁶⁰讓我們知道使行貿易的規模和盛況。

除此之外，朝鮮使節在到達北京的玉河館可停留約一個多月之久，此處也是北京的公式貿易活動之所：如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可以看到，通常朝鮮使節會獻給中國皇帝，朝鮮國王的外交文書「表文」以及歲幣、貢物，這些正式的任務結束後，在使節離開北京之前，中國會便會公佈「告示榜」，正式允許使臣和商人可以進行買賣。⁶¹《大清會典》規定，外國貢使到燕京頒賞後可進行買賣，即是外交公事結束，即將回國之時，可於玉河館開市。開市期間為三或五日，惟朝鮮、琉球的使節不拘期限。貨物先由戶部收買，然後出示佈告，允許商人入館交易，戶部差官監市，市中交易的中國貨物亦全部免稅。⁶²在燕行過程中，往回的路程、以及在北京停留的時間，俱出現各種貿易或買賣現象，讓兩國的物品產貨物自然而然的流通。能夠溝通兩國語言之少數官員「譯官」，是主導這些商業活動的重要角色，擁有兩國貨品交換或貿易的豐富經驗。而那些一生可能只有一次到北京燕行的朝鮮使節，由於對於中國的了解不足，便需要倚靠譯官的交易經驗，以中國人習慣的方式進行物品交換或交流。

根據學者的研究可知，兩國之間因朝貢關係而出現的各種貿易現象，隨著朝代和時代的變化，曾數次改變貿易的政策和制度。根據《太宗實錄》明永樂三年（1405年，朝鮮太宗五年）朝鮮王廷已經在討論以馱載法來限制朝鮮物產帶往中國的事。⁶³從明代開始，朝鮮以「八包法」來限制使協節攜帶貨物的數量。八包法實施的翌年，使節的旅費及其他雜費也禁用銀兩，僅允許每個人最多帶人蔘十斤到中國進行交易，十斤人蔘分為八包，每包的價格約等於二十兩。雖然以八包法來限制買賣的數量，但後來「八包法」的發展和規

⁵⁹ 各色工匠，如鉅木造車、造棺、造椅卓、打造鐵器、錫器及礮米、縫衣、彈綿花之類，種種皆有，而器械無不便利，一人所為，可兼我國十人之事。出東城門，門制一如南門，而甕城只有一門。兩門之間，布列雜貨。城外亦有市房。《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壬辰年12月7日。

⁶⁰ 柵門作草屋庇之，門內有城將所坐屋及酒食店民居，共十餘家，而皆覆以草。在數里外望見，柵內有白物堆積如邱陵者，乃去核綿花，皆曆行所買。其數無慮累十萬斤，壯哉。《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壬辰年11月28日。

⁶¹ 夕時，告示榜出來，示使臣後貼之，告示榜者，許買賣榜也。自是日行中人益有忙色，南貨貴，故一行盡買雜物。雜物異於白絲段疋，無定價，遇一物則群爭之，一兩價增至十兩。以此所買之物，互相欺匿，譯輩亦言其可羞。蓋在前則不至如此云。譯輩自家賣買外，最以士夫家別付為悶，其價多是紙扇筆墨之類，以此失利甚多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巳年2月10日。

⁶² 《會典事例》卷511，頁4；免稅事見《禮部則例》卷185，頁1，第三條。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69、82。

⁶³ 立入朝使臣馱載之法。議政府請：「使臣每一馱，不過百斤；土物外金銀禁物齎持者，西北面都巡問使，考察禁止，如有犯令及奉行不至者，司憲府申請論罪。犯人將帶禁物，沒官，依律論罪，身充水軍。」從之。《太宗實錄》第九卷，五年（1405年，明永樂三年）2月20日。

定日趨混亂，如明崇禎（1628-1644，朝鮮仁祖六年至二十二年）年初，每人八十斤，每十斤爲一包，亦稱爲八包，故而後來便直接允許攜帶銀兩「包銀」，將前代蔘額，依每斤銀二十五兩的價格折算，八十斤共爲銀二千兩，亦爲一人八包。到康熙二年（1663年，朝鮮顯宗四年）清廷允許使團不限量入關後，八包法的制度並更趨向崩壞。到了康熙十六年（1677年，朝鮮肅宗三年）《肅宗實錄》寫道：

比年赴燕商賈車輛，倍蓰於前，彌亘數十里。此由於八包之法廢闕，商賈齎銀，靡有限節，故也。所貿唐貨，轉販倭館，而倭館物力，不能抵當。目今倭人之未償者，百萬餘兩，此皆各衙門生息之物，而收捧無期。申飭八包之法，使無如許煩雜之弊似可矣。⁶⁴

這是由於八包法的廢弛，朝鮮使團的貿易量太大，所以將在中國購買的白絲轉販倭館，但由於倭館無法缺乏同等的貿易能力，故而輒久仍無法收回價銀，朝鮮乃主動申飭此該法，此後出口一律改用直接銀兩，不過仍以此法計之，以兩千兩銀一包爲限。⁶⁵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提到，使節前往北京途中，停留在義州檢查每個人行李中的銀兩；不過在十八世紀初的八包法，檢查攜帶的銀兩，已經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動作，而不再具有嚴格的管制效力。⁶⁶

使節到北京時，必須向玉河館監督取得連環保結的書面證明，才能發給腰牌，允許入館交易。玉河館並按日輪派通關及大使一人，在門按冊稽查人數，館內貿易禁止誣騙、欺詐及賒欠。朝鮮人一旦出館，便不准貿易，若發現館內外四鄉軍民以禁物賣與朝鮮使節，或朝鮮人收買禁物者，一律問罪。⁶⁷李肯翊（1736-1806，字長卿，號完山、燃藜室）所寫的朝鮮野史叢書《燃藜室記述》中，便描述朝鮮使節被人發現將《明史》和中國地圖帶回朝鮮，該件事在中國禮部的回咨提到：收買史書爲禁律當中最嚴重的一件事，因此付罰金五千兩，更必須把相關「屏障貼冊」等物燒滅。⁶⁸透過學者的研究可知這些禁物幾乎全部

⁶⁴ 《肅宗實錄》六卷，三年（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8月23日。

⁶⁵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70。

⁶⁶ 夕，往見書狀，與府尹方檢閱一行囊藏。以各人所持銀貨，量其輕重，錄其數，加封打印，然後還給其人。蓋畧依八包之法，防其私濫，而其事甚疏，不過文具耳。《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1712年11月24日。


⁶⁷ 《會典事例》卷512，頁4、卷511頁1。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69-70、82。

⁶⁸ 年貢使吳廷緯之回慎行建帶各省地圖，爲鳳城章京搜捉，詔免遣大臣查審着該國王查奏。行建供曰：「天下地圖自古流傳，或爲屏簇帖冊，故卻知走路遠近帶行，其摹寫紙可驗，爲我國物云云。」；丁巳遣福昌君楨等，賚進明史地圖事情，仍謝免遣查使。禮部回咨略曰：「史書收買，禁律最嚴，據奏，其犯官姓名盡行隱匿，罰銀五千兩，奉旨從寬免罰。十六朝紀已到部燒毀，慎行建雖稱出伊國人之手，如將朝鮮紙帶來，盜畫粧樣，亦何不可？將行建邊略充軍，在伊國屏障貼冊，該國俱行查毀。」李肯翊，《燃藜室記述》，〈別集〉第五卷，〈事大典故〉，〈使臣〉，頁703。

是指中國的產物，如史書、地圖，墨黃紫皂大花西番蓮緞，或硝磺、牛角等軍事物資。不過銅鐵、馬騾、角弓、絲斤等物，各國王可奏請或由各省督撫代奏請購，候特旨允許遵行。

69

儘管有諸多的限制，兩國因使行而產生的貿易亂象，仍無法藉由國家的政策而加以改善，尤其是可溝通兩國語言之譯官（通事）的腐敗，到十八世紀後期，產生了更多更大的問題。這些問題在十八世紀初的《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已逐漸看到朝鮮使節對這些譯官或通事的負面看法及腐敗的問題。燕行表面上是政治性的貿易活動，嚴格規定朝鮮使節的路線，並以八包法等貿易政策來限制交流物品的數量，不過實際上，使節仍以各種方式進行交換物品，出現多種文化交流活動。因此，中韓關係中的燕行，除具有政治、經濟方面的意義以外，還有文化交流上的意義。如朝鮮知識分子至中國，與中國人進行文化交流，並藉此過程學習中國的思想與文化等面向。這些知識分子中的金昌業，即在被派往北京與清人廣泛交流之後，將過程撰寫成《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了方便討論，以下將分別就1712年的燕行背景、作者金昌業及其金昌業家庭的背景等兩個方面，進行介紹。



第三節 壬辰（1712）年燕行的主要事件

依據前著的討論，在多次朝鮮往中國的使行團中，壬辰年（1712年，朝鮮肅宗三十八年，清康熙五十一年）「冬至兼謝恩使」燕行具有值得注目的情形。該年崔德中以副使尹趾仁的軍官身分，一同前往燕京的《燕行錄》中，可見當年燕行的主要四個事件：

壬辰之年，清國立石白山，審定境界；許減禮單，移准方物；既革貢金，又減豹皮；邊民犯越，免其查議；以此四件，又備四起，特令節使兼其謝恩。⁷⁰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當年的燕行成員是整個燕行歷史中，率領最多人馬前往北京的使節團。通常朝鮮使節由其護送軍保護，渡過鴨綠江，停留一宿後，在九連城和鳳凰城中間的柵門辦理入境手續，並與負責燕行的清朝官員會合。⁷¹一般使行的規模是約250人及200匹馬左右，但透過崔德中的記載可知，該年柵門進入了687個人和591匹馬，其中324

⁶⁹ 《禮部則例》卷185，頁2；《會典事例》卷511，頁1；中日韓，卷3頁1134、1135。見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69-70、82。

⁷⁰ 崔德中，《燕行錄》，〈燕行錄序〉。

⁷¹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頁35。

個人、232 匹馬繼續往北京，其他人馬則從瀋陽回到朝鮮去。燕行使在瀋陽的時候，將部份貢物分納給瀋陽，其他的貢物由清朝的官員運送到北京，自此到瀋陽運送歲幣與貢物的朝鮮人馬，便在此處往回朝鮮，只剩下人馬再往北京去。⁷²例如，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可見，渡過鴨綠江時，使節團到義州由於「赴京人馬，皆有名目，無名目者，不許渡江」。而修《渡江文書》的情形。⁷³至於此年燕行規模的相關解釋和理由，雖然相關史料中沒有很清楚的提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原來固定每年四次的燕行，從明崇禎十七年（1644 年，朝鮮仁祖二十二年）開始，便改組為一次「冬至」的使行。之後，每年往燕京的派遣便只有各次「節使」和「別使」共兩次。而且該年的燕行，崔德中提到具有上述提及的四件事謝恩，因此該年的燕行的名稱便也改為「三節兼年貢使」⁷⁴或「謝恩兼冬至使」。⁷⁵也許是因為包含該年的四件謝恩的事情、三節行的貢物量較大，所以該年的燕行規模便高達以往燕行的兩倍左右。

當年設立「白頭山（長白山）定界碑」，也是兩國之間發生的重要的事件（圖三、圖四）。實際上，設定界碑跟「邊民犯越」一事有直接的關係。由於兩國邊界不清，使得居住在中國和朝鮮邊境的人民，因為經常互相犯越鴨綠江或圖們江等地，而數度發生殺害中國人的事件，於是逐漸引起了劃定邊疆界線的需要。例如 1711 年 3 月「冬至兼謝恩使」鄭載崙從中國帶回的「回咨」中，便提到境界地發生朝鮮人殺害中國人的事情，以及禁止朝鮮居民到中國沿海漁採一事。⁷⁶之後，朝鮮派遣參覈使到中國協調該事，次年便設立了「白頭山（長白山）定界碑」，同一年 11 月，燕行使節所帶的朝鮮國王之「表文」上記載說：「去夏，皇華審界之行，不煩外國之供億，克正邊疆之界限，莫非皇上自小之德，庶絕奸民犯禁之患，小邦君臣聚首感頌，不勝瞻天愛戴之忱。」⁷⁷可知邊民犯越的事，是直接引發以長白山為定界，確立兩國邊界之主因。

⁷² 權乃鉉，〈從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前期平安道對清使行지원〉（從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前期平安道對清使行支援），《朝鮮時代史學報》，25（首爾，2003），頁 150-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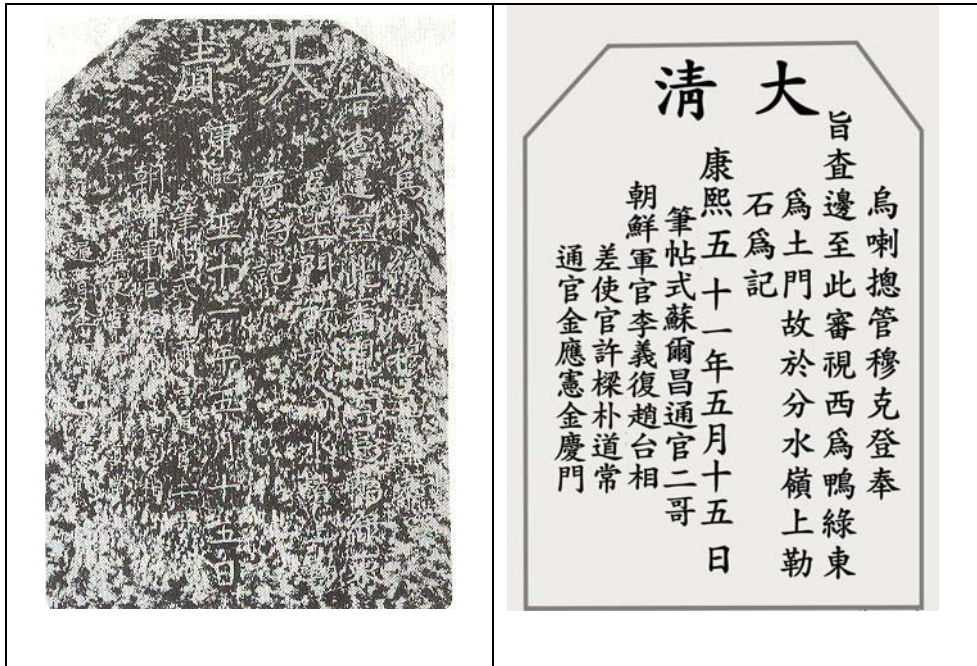
⁷³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壬辰年 11 月 25 日。

⁷⁴ 崔德中，《燕行錄》，〈燕行錄序〉。

⁷⁵ 《肅宗實錄》五十三卷，三十九年（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3月30日；「冬至兼謝恩使」《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11月3日。

⁷⁶ 冬至兼謝恩使鄭載崙等，先來軍官，齎咨草及狀啓入來。回咨以爲：朝鮮國人，殺害上國人事情，差部內及盛京章京各一員往鳳城，欲同朝鮮國官一員，查明殺人地方可也。海上漁採船禁斷事，移咨奉天將軍及府尹，將沿海居住人，嚴行禁止，不許往朝鮮相近地方漁採，若違禁漁採，被朝鮮捉送，從重治罪，該地方官，一併議處。別地方漁採人，亦令捕送論罪，該官亦一併議處。《肅宗實錄》五十卷，三十七年（1711年，清康熙五十年）3月5日。

⁷⁷ 《同文彙考》原編疆界48卷，頁9b-10a。



圖三 《白頭山境界碑拓本》

圖四 《白頭山境界碑拓本復原圖》

從《肅宗實錄》壬辰年2月，清朝的禮部給朝鮮的「咨文」中可知，前述提及的兀喇總管穆克登調查從鳳城至長白的邊境，⁷⁸兩天後朝鮮國王收到義州府使的「牌文」（「牌文」為勅使的路文），知道穆克登為了調查長白山已經到達義州。⁷⁹對朝鮮而言，劃定長白邊境的事情相當敏感，所以一方面招集大臣討論如何回應清廷設立界碑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討論如何接待接伴使和監司經過朝鮮。⁸⁰當年5月，在接伴使朴權、咸鏡道觀察使李善溥等的報告中，可見穆克登等一行人，四月已經抵達厚州境內看審長白山，由於中國與朝鮮基本上以鴨綠江為界；所以穆克登主要是想在長白山確認看到長白山西邊的鴨綠江的

⁷⁸ 清國禮部咨文出來。其咨文以為：上年八月太學士溫達等啓奏奉旨，今年穆克登等，自鳳城至長白，查我邊境，因路遠水大，未獲即抵彼處。俟明春冰泮時，另差司官，同穆克登，自義州造小舟泝流而上，若不能前進，即由陸路，往土門江，查我地方。但我邊道路遼遠，地方甚險，倘中路有阻，令朝鮮國，稍為照管，將此情由，着該部曉諭朝鮮國。《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2月24日。

⁷⁹ 清差烏喇總管穆克登等，將審白頭山，出來義州，府尹以牌文上送。《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2月26日。

⁸⁰ 引見大臣、備局諸臣。右議政趙相愚曰：「彼咨文，又有差官往長白之語。我國陸路之難通，壬申回咨得請，水路之難通，昨年穆克登，亦已備知。急修回咨，備陳水陸俱難得達之狀，則或不無停行之道。」……戶曹判書金宇杭曰：「穆差昨年，既經險艱，今又出來，其計不但已。今雖移咨，似為無益。」《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2月27日；右議政趙相愚，與備局諸堂上，來會賓廳……諸堂上請對，以穆差僨接等事稟定。蓋使臣狀啓中，穆差將出來廢四郡盡處越邊，宜以此待候云：故關西僨使，請以咸鏡道僨使改啓下，而僨使已自中和回程云，到京後，更使辭朝而去。且白頭、長白兩山間，有甫多會山分水嶺，今行似當由此路……。《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3月4日。

源頭，同時他們也看到在長白山下處東邊的圖們江（豆滿江）。⁸¹因此，在5月23日接伴使朴權的馳啓中，可見是以長白山的鴨綠江跟圖們江各發源地為主定境界，並且在當地設立碑石。⁸²另外在當年初的謝恩使回朝鮮的報告中，正使朴弼成（1652-1747）、副使閔鎮遠（1664~1736）、書狀官柳述，俱記載了當年2月往燕京的使團，在瀋陽遇見穆克登事，並肯定穆克登調查推定界碑的一事。⁸³另外，該年11月3日，從朝鮮首都漢城往燕京的使團中，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也描述兀喇摠管穆克登向朝鮮使臣詢問：「白頭山事，今已了當，不復往見，毋慮。地界立標，亦須勿亟。唯於農隙，徐徐爲之，毋傷百姓。」

⁸⁴金昌業並詳細描述對穆克登的印象：

克登，皇帝寵臣，守兀喇之地；年前，皇帝命往視白頭山，故有云云也。克登爲人，小而眼有英氣，語時如笑，甚慧黠，亦非雄偉人。曾於鴨綠江，躬自刺舡跌而舐其齒。⁸⁵

同一天崔德中《燕行錄》中，也描述穆克登完成長白山的地圖和定界碑的情形。⁸⁶從上書《燕行錄》的記載可知，該年5月清朝的總管大臣穆克登在長白山邊界劃定兩國邊界，並且持續進行在已確定的邊界上設立界石等事，⁸⁷從朝鮮使節的相關描述可知，他們也同樣相當關心定界碑一事以及清廷的相關反應。其中，朝鮮減少對中國貢物的數量，對朝鮮而言具有特殊的外交意義。根據1712年穆克登設定界碑相關記載，⁸⁸可知朝鮮使臣認爲將設

⁸¹ 平安觀察使李濟馳啓：四月廿四日，胡差侍衛一行，乘馬尙到楸仇非越邊，聞債使待候於三水地，泝流上去，穆差則從山路作行，當會於七道溝云。《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5月1日；接伴使朴權、咸鏡觀察使李善溥，四月廿七日封啓曰：清差侍衛布蘇倫，與大通官洪二哥乘馬尙來到厚州境，使譯官存問……且自言有二事，其一、長白山看審時，指導事也，其一、一行所騎及騾重所載馬整待事也。……《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5月5日。

⁸² 接伴使朴權馳啓曰：「摠管登白山顛審見，則鴨綠江源，果出於山腰南邊，故既定爲境界，而土門江源，則白山東邊最下處，有一派東流。」摠管指此爲豆江之源曰：「此水一東一西，分爲兩江，名爲分水嶺可也。」嶺上欲立碑曰：「定界立石，乃是皇旨。道臣、債臣，亦宜刻名碑端。」臣等以既不得同往看審，而刻名碑端，事不誠實，爲答矣。」《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5月23日。

⁸³ 謝恩使朴弼成、閔鎮遠、柳述入來，上引見慰諭。弼成曰：「臣等入去時，到瀋陽，適逢穆克登之行，言今番方物，亦必除減云矣，果如其言，而通官輩皆言克登，爲我國周旋，不特方物蠲免，定界亦必善爲之云。克登之爲我，似可信矣。」《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7月26日。

⁸⁴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壬辰年11月3日。

⁸⁵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6日。

⁸⁶ 午時，聞穆克登入奏長白山地圖云。曉來時，路逢扛擡畫本者數三人，認是地圖歟。白頭山長白山之形，今始畢畫故也；移時，穆克登出來。……使通官傳言曰。白頭山定界之後，使之築石爲限矣，有關民弊，徐徐舉行，毋貽民弊。崔德中，《燕行錄》，癸巳年2月6日。

⁸⁷ 《同文彙考》原編疆界48卷，頁8b-9b。

⁸⁸ 謝恩使朴弼成、閔鎮遠、柳述入來，上引見慰諭。弼成曰：「臣等入去時，到瀋陽，適逢穆克登之行，言今番方物，亦必除減云矣，果如其言，而通官輩皆言克登，爲我國周旋，不特方物蠲免，定界亦必善爲之云。克登之爲我，似可信矣。」《肅宗實錄》五十一卷，三十八年（1712年，清

定界碑的事，透過清朝對朝鮮減方物，朝鮮對方物的負擔變減少，也可以呈現兩國關係的一面。

第四節 文人畫家金昌業

金昌業家族為朝鮮當時著名的安東金氏家族。（附錄一）他的曾祖父金尙憲（1570-1652，字叔度，號清陰、石室山人）為朝鮮仁祖代（在位 1623-1649）著名的斥和派⁸⁹大臣，丙子胡亂（1636）戰敗後，在 1641 年被派到當時的清朝首都瀋陽當人質，待了四年，在 1645 年與昭顯世子（1612~1645）一同回朝鮮，朝鮮孝宗（在位 1649-1659）年代被選為左議政。1712 年金昌業的燕行記錄可見，在瀋陽時他曾試圖尋找曾祖父過去被拘留在瀋陽北館的相關事物。⁹⁰金昌業的父親金壽恒（1629-1689，字久之，號文谷）也是朝鮮肅宗（在位 1674-1720）年代的領議政。而金昌業和仲兄昌協、三兄昌翁，加上兩個弟弟昌緝和昌立都曾經是進士，被視為當代著名的文筆家，稱為「六昌」。父親金壽恒於肅宗十五年（1689 年，清康熙二十八年）被流配到珍島賜死，這件事對金昌業和他的兄弟有很大的影響，後來除了長兄金昌集之外，其他兄弟都因此而退官，透過《肅宗實錄》（1694 年，清康熙三十三年）的內容，可一窺其究竟。

副提學金昌協上疏曰：「臣亡父於臨命之日，手書遺戒一紙，以授臣兄弟，其言曰：『余素無才德，徒以憑藉先蔭，厚蒙國恩，竊位踰分，自速釁孽；今日之事，無非履盛不止，求退不得，以至於此，雖悔曷及？凡我子孫，宜以我為戒，常存謙退之志，居家則力行恭儉，仕宦則避遠顯要，以為禔身保家之地，至佳。』臣之兄弟，泣受而藏之，不敢忘失焉。蓋臣父之意以為：滿盈者，天道之所損；勢位者，人情之所忌。況地要則難居而嫌怨萃焉；任重則難稱而釁咎生焉；望隆則難塞而謗毀歸焉。此終古之所患，而已既不幸而見及矣。不欲使後之人，復蹈危機，故其丁寧告戒，特在於此。在後之人，所宜剗心鏤骨，

康熙五十一年）7月26日。

⁸⁹ 「斥和派」以性理學派為主，主張重視對明朝的大義名分，即明末清初主張與明朝保持友好的關係，並與清朝無法結合事大關係。相對「主和派」主要以反性理學派為主，主重現實、實利外交，而強調與清朝外交關係。

⁹⁰ 自入土城，左右市廛已櫛比，而內城尤繁盛，十倍遼東。入城數百步，東入小巷，密院在焉。有東西廊屋，而庭湫隘。聞譯輩言，通官金四傑之母，曾居此屋，常言此乃丁丑後朝鮮質子人等所接之家，世子館則今衙門是其地云。曾王考所拘之處即北館，而今無知者矣。《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壬辰年12月6日。

永遠遵守，況於臣身哉？今夫三司之職，孰非顯要，而經幄之長，尤為極選，使臣徒知寵祿之可懷，威命之可畏，而昧然冒進，揚揚於榮次，則是以先人將死之言而同之於弁髦也，臣豈忍此哉？」答曰：「雖有先卿之遺戒，朝家洞燭，昭雪無餘，則出而供仕，有何未安之理哉？」昌協以禍故自廢，遂不復起，其弟昌翕、昌業、昌緝，素不樂科舉仕宦，及經己巳，俱以韋布，終其世，人皆稱之。⁹¹

金昌業家族人士中，金尙容（1561-1637，字景擇，號仙源、楓溪，詩號文忠）是以聖節使的身份，在明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朝鮮宣祖三十一年）派往中國，⁹²而在明清時代，家族中包含曾祖父金尙憲和父親金壽恒等多達 17 人，曾做為使節被派往北京、瀋陽，及日本等共 20 次。⁹³透過燕行的機會，他們迅速地接觸吸收了各種新的學風。這對從小生長在可以接觸中國書籍和山水畫等的家庭環境裡的金昌業兄弟們而言，具有莫大的吸引力。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描述針對該年的燕行的理由：

壬辰六月二十三日政，伯氏為冬至兼謝恩使，時伯氏大病新瘳，子弟一人宜隨往，且吾兄弟，皆欲一見中國。於是叔氏欲行，已而止，余乃代之以打角，啓下⁹⁴

透過上文可知金昌業兄弟們對中國和中國文物之興趣，原本仲兄金昌協（1651-1708，字仲和，號農巖、三洲，詩號文簡、果川）往中國未能成行時，金昌業仍然以「弟子軍官」⁹⁵的身分前往，使得增廣對中國見聞及與清人交流。曾於 1778 年（朝鮮正祖二年，清乾隆四十三年）燕行的李德懋（1741-1793，字懋官，號炯庵、雅亭、青莊館）也曾表述過，金昌業家族之所以廣為後人所知，即在於自其曾祖父金尙憲以後，約 150 年間代代皆往中國燕行，並留下完整珍貴的記錄等所做出的貢獻。⁹⁶

⁹¹ 《肅宗實錄》二十六卷，二十年（1694年、清康熙三十三年）5月29日第6條。

⁹² 依上年聖節使金尙容例……《宣祖實錄》一一四卷，三十二年（1599年、明萬曆二十七年）6月8日第3條。

⁹³ 尹景喜，〈十八世紀初壯洞金氏家族的燕行體驗——以金昌集《燕行填箎錄》為中心〉，頁329。

⁹⁴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往來總錄〉。

⁹⁵ 關於「弟子軍官」，依據《通文館志》可知屬於謝恩使的正使帶的五個軍官，因此金昌業再中國參與正式活動時，按照弟子軍官的身份，必須要穿軍服。《通文館志》上冊，頁90-91。

⁹⁶ 蓋清陰先生，水路朝京，於濟南，逢張御史延登。後七十餘年癸巳，曾孫稼齋入燕，逢多青山人李錯鐵君，相與嘯咤慷慨於燕□之側。後二十有六年，清陰先生五代族孫養虛堂在行平仲，逢浙杭名士陸飛起潛、嚴誠力闡、潘庭筠香祖，握手投契，淋漓跌宕，為天下盛事。自清陰以來，百有四五十年，金氏文獻，甲於東方者，未必不由於世好中原，開拓聞見。遺風餘音，至今未泯也。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35〈清脾錄四〉農巖、三淵慕中國，頁258_053a。

金昌業家族對清朝學術文物的濃厚興趣可見於他們的私人文集中，⁹⁷如金昌協曾託朝鮮燕行使節買清朝書籍回來。⁹⁸尤其是伯父金壽增（1624-1701，字延之，號谷雲）對金昌業兄弟的影響深刻，常常一同到各地遊覽，享受山川美景。金壽增在親弟金壽恒，即金昌業之父，被流配時，選擇退隱谷雲，⁹⁹建造精舍渡過一段時光才回到公職，1689年金壽恒賜死後，再度離職並卜居在谷雲，自此金壽增便常帶金昌業兄弟四處遊歷，過程中留下了描寫自然山水的詩文和詩歌在他的《谷雲集》等文集中。¹⁰⁰在遊覽途中也讓私人畫家描繪所見景觀，如藏在韓國中央博物館《谷雲九曲圖》兩冊畫帖即為代表作品，該《谷雲九曲圖》的跋文由金昌協所執筆。¹⁰¹金昌翁《三淵集》中也曾描述過：「余少侍伯父飫，聞山水之談。數及乎出宰斧壤時所嘗歷覽，若本縣之青龍戲靈、伊川之廣福，乃其選也。余則欣然便有躡躅之意。」¹⁰²以上等等可見伯父金壽增常常與金昌業兄弟們談山水，並且跟他們兄弟一同去各地深山遊覽，贊助山水畫家的情形。更值得注意的是，金壽增在他的文集《谷雲集》中，提及《名山勝槩記》為，明萬曆年間（1573-1620）出版的山水遊記集，收錄了約 1550 幅關於中國六朝至明代之間的水畫。有學者認為金壽增和金昌業兄弟們文集中，也已經提到《名山勝槩記》，¹⁰³由此可推知該書為燕行使節帶進朝鮮，此舉跟明末清初從中國大量傳入到韓國的山水版畫作品關係密切。這些背景可能更金昌業到中國燕行時去山水旅行。關於這點本文在第三章再細談。

依據金昌業的文集《老稼齋集》描述：「從公兄弟遊，讀書講學，以春秋為期」及「間或設酒食，彈琴賦詩以為樂」，可見金昌業從小便與兄弟們一起唸書，並且有藝術方面的

⁹⁷ 至於金昌業兄弟的代表私人詩文集：金昌集，《夢窩集》；金昌協，《農巖集》；金昌翁，《三淵集》；金昌業，《老稼齋集》；金昌緝，《圃陰集》；金昌立，《澤齋遺唾》等等。

⁹⁸ 高蓮姬，〈鄭敦의 真景山水畫와 明清代山水版畫〉（鄭敦真景山水畫與明清代山水版畫），《美術史論壇》，9（首爾，1999.11），頁 140。

⁹⁹ 感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石守謙老師提供此論文和意見。見俞俊英，〈《谷雲九曲圖》을 中心으로 본 實景圖發展의 一例〉（從《谷雲九曲圖》為例看實景圖發展的一例），《精神文化研究》，8（城南，1980.12），頁42。

¹⁰⁰ 關於金壽增的山水遊記：〈遊戲靈山記〉、〈青龍山青龍寺記〉、〈遊松都記〉、〈遊白沙汀記〉、〈山中日記〉、〈七仙洞記〉、〈重遊七仙洞記〉、〈曲淵記〉、〈楓岳日記〉、〈花山記〉、〈寒溪山記〉、〈遊華嶽山記〉、〈谷雲記〉、〈遊曲淵記〉、《谷雲集》卷三、卷四等。見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首爾：一志社，2001），頁 43、（註）60。

¹⁰¹ 關於《谷雲九曲圖》為由畫師曹世傑（1636-1705）而成，透過《谷雲九曲圖》上的跋文和題畫詩，可瞭解這是金壽增於1682年請士人畫家曹世傑，以其「谷雲九曲」的風景為主題所作。《谷雲九曲圖》金昌協所寫的跋文上，記載著作者和製作背景。相關研究請參閱俞俊英，〈從《谷雲九曲圖》為例看實景圖發展的一例〉，頁38-46。

¹⁰² 金昌翁，《三淵集》卷二十四，〈平康山水記〉，頁165_497a；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頁148。

¹⁰³ 相關研究請參閱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首爾：一志社，2001）；高蓮姬，〈鄭敦真景山水畫與明清代山水版畫〉，《美術史論壇》，9（首爾，1999.11），頁 137-162。

才能。¹⁰⁴此外，父親金壽恒寫給金昌業的書信裡，¹⁰⁵也可看出金昌業非常熱衷並擅於繪畫和書法。他在 1681 年成爲進士，不過透過文集的描述：「二十四中辛酉進士，公戒家方隆盛，絕意公車。」¹⁰⁶之後，金昌業在東郊（今日首爾城北區長位洞）建立「別也庭園」做藝術活動以及養成後學。¹⁰⁷該時期與兄弟們一同到金剛山等地遊覽山水，¹⁰⁸並且自現存流傳作品中及後人的評語，可知他在山水畫方面特別著名。再加上，李德懋《青莊館全書》中描述：

兩先生道學，文章表準東國，家庭之內，頃倡麓和，不假外求，而俱慕中國，津津不已。終古讀書萬卷，芻襟恢蕩者，必具此想。其弟稼齋先生，則隨其伯兄夢齋先生入燕，壯觀山河之固，人物之盛、城池、樓臺、風俗、儀文，著錄而歸，選輯昆季之詩，爲《金氏聯芳集》，屬浙士揚澄寧水，評序而來。於是金氏文獻，照爛中國，寧水推獎農巖之詩。¹⁰⁹

金昌業家庭中兩位兄長農巖金昌協和三淵金昌翁，對中國文物深感興趣和關心，對燕行心嚮往之，但始終未能成行，而最後得以前往的金昌業，則留下對後代極具影響力的燕行記錄。

上述的金昌業獨特的家庭背景，及對清朝文物的興趣，透過往中國的旅遊中，必定影響了金昌業與清朝人物之間的交流。尤其本文關注的是，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提及的私帶物品，在使行過程中產生了怎麼樣的作用？這樣的私人貿易，是否扮演著兩國文化交流中重要的角色？接下來，第二章便將以朝鮮物品爲主討論，觀察使節私帶哪些物品？在何種情況與清朝人交換？那些特定的物品是特別針對某些特定階層的人？朝鮮使節運用朝鮮物品進行交換時，他們又希望獲得何種物品？

¹⁰⁴ 金昌業，《老稼齋集》卷三，〈老稼齋集跋〉。

¹⁰⁵ 程子曰：「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書札猶然，況其他乎。汝於繪事，好著成癖，每慮其有妨於學業矣。蓋一以此得名之後，則一家之間，或被強迫而亦不得辭，勢固然矣。近聞汝以摹畫之役，無暇讀書，數月之內，將未易斷手云。此固汝自取而亦非細慮也。今後則一切放下，勿復留意於此事。唯以讀書作文爲業。而人有強請者，以家庭有教，不敢犯戒之意，峻辭謝却。金壽恒，《文谷集》卷二十八，〈書牘〉寄業兒，頁 133_550b。見朴智鮮，〈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頁 15。

¹⁰⁶ 金昌業，《老稼齋集》，〈附錄·墓表〉。

¹⁰⁷ 昌集之弟昌業，家素富饒，又憑藉昌集之勢焰，大起別墅於東郊之外。《景宗實錄》十卷，二年（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11月11日第1條。

¹⁰⁸ 朴智鮮，〈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頁17。

¹⁰⁹ 關於「兩先生」指的是農巖金昌協和三淵金昌翁。見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三十五，〈清脾錄四〉，〈農巖、三淵慕中國〉，頁258_053a。

第二章 燕行路程中送禮與回禮

從明代開始的燕行路程中可以看到，許多朝鮮使節帶著各種物品送給中國人，十八世紀初前往北京的金昌業也不例外。朝鮮使節為何將這些物品送給中國人？這些物品對從異國來的朝鮮使節而言，是與清朝人物交流的重要媒體。金昌業在他的燕行紀錄中沒有直接提到他是為了與清人交流而攜帶物品，不過金昌業本身應該了解物品的交換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扮演著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角色。¹¹⁰我們可以透過在金昌業詳細紀錄的過程中，觀察不同兩國人之間如何買賣、買些何謂物品等的問題。實際上，金昌業與中國文人交流時，所進行送禮、互動的情形，同樣可見於朝鮮文人社會中，甚至在當年同行的朝鮮使節間也存在著。因此，以下要觀察朝鮮使節金昌業為何送禮、送的朝鮮物品有哪些、及中國人對這些物品的認識。再著，從這些物品的流動中，也討論金昌業送朝鮮物品後，又得到了哪些中國物品，以及身為文人畫家的金昌業是否有送與其他燕行使節所不同的特別的物品等問題。

第一節 送禮的時機

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第一卷首先列出當年朝鮮的朝貢物品（方物、歲幣），以及他所帶至燕京的物品項目和數量：

所持盤纏銀二十四兩、扇子五十餘柄、火鐵三十箇、清心元、筆墨各若干。¹¹¹這些都是私人帶過去的物品，都不是金昌業在整個 146 天燕行日程中個人所使用的藥品或衣服，而是屬於朝鮮使節的禮單中，對中國人來說較特別的物品，也就是具有朝鮮特色之日用品及藥品等等。雖然今日無法得知這些物品確切的樣貌，不過可以發現和該年（1712 年）朝貢的禮單物品相似。¹¹²實際上，當時物品交流的情形是相當頻繁，朝

¹¹⁰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gif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6-55.

¹¹¹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往來總錄〉。

¹¹²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方物歲幣式〉。

鮮和清朝之間，即貢品是維持外交的重要物品之一；因此，這些攜帶物本身有強烈的「禮物」性格。

準備這些物品帶過去的另一理由，也是因為前人的燕行紀錄提供了金昌業關於燕行的各種資訊。尤其，清代以來大部分的燕行路線以陸路為主，並且每年派遣朝鮮使行都有固定的路線；所以，朝鮮使節可以預期經過此路線將會遇到的人、事、物。朝鮮每年固定有兩次以上的燕行，許多燕行使節會寫下到中國的所見所聞，讓朝鮮人可依據書上的記載來想像、認識中國。同樣在金昌業的燕行紀錄中，可見金昌業除了曾讀過曾祖父金尙憲（1570-1652，字叔度，號清陰、石室山人，1626年燕行）的《朝天錄》、父親金壽恒（1629-1689，字久之，號文谷，1653、1673燕行）的日記以外，還有許筠（1551~1588，字美叔，號荷谷）《荷谷朝天記》、宋玉汝（1697年奏請使行，書狀官）《丁丑燕行記》、李世白（1635~1703）、白仁傑（1497~1579，字士偉，號休庵）、閔鎮遠（1664~1736，字聖猷，號丹巖、洗心，詩號文忠）的燕行紀錄等。並且，金昌業透過這些紀錄已認識了中國特定的人物或地方景觀。因此可推測金昌業也是參考前人的紀錄來準備這些路上送給清人所用的物品。如萬例二年（1574年，朝鮮宣祖七年）派往明朝之許筠《荷谷朝天記》中，也可以看到攜帶朝鮮扇子等物品給中國人的情形。¹¹³

同樣地後人也參考了金昌業的紀錄來做準備，如十八世紀後期朝鮮文人洪大容（1731-1783，字德保，號湛軒）於1765年（朝鮮英祖四十一年，清乾隆三十年）燕行中有機會與清朝人，如嚴誠、潘庭筠、陸飛長時間交流。這三位清朝人是洪大容在燕京約一個月的停留時間裡所遇到的中國友人，由於他們在琉璃廠偶遇而結為異姓兄弟，因此關係特殊。之後，李德懋、朴趾源、朴齊家等，也在前往中國時與他們有所往來。此外，在十九世紀派往北京的燕行使節，如韓弼教（1807-1878，1831年燕行）和金景善的使行紀錄中，可見參閱金昌業使行紀錄的狀況。¹¹⁴值得注意的是洪大容在他的燕行紀錄中就提到，因為讀過前人以及金昌業的燕行紀錄；所以，才為燕行準備了銀兩以外的扇子、清心丸等物品，所以攜帶物是具有慣性的。¹¹⁵

¹¹³ 余等先發向關，車輛則令追至。且空車一乘，尙未到驛，留安廷蘭催與俱來。過中前所至鎮遠鋪，鋪前水大漲，過涉者幾於滅頂，余等出扇數十把，雇人戴轎以渡。許筠，《荷谷朝天記》中卷，甲戌年7月18日。

¹¹⁴ 韓弼教，《隨槎錄》，收於《燕行錄選集·補遺》中卷（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卷四，〈聞見雜識〉，頁328-329。

¹¹⁵ 金稼齋，清陰之孫也，當壬辰之行也。……余宿聞其狀而揣摩已熟，及行前收包價，得銀子二百餘兩，為雇車及遊觀雜費。入館以四十餘兩，買紙扇諸種于東商。洪大容，《湛軒燕記》，〈外集〉卷七，〈衙門諸官〉，頁248_250a。

十八世紀初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所列出來的物品，大部分都是在同年朝鮮給清朝的貢物，以及在鳳城、瀋陽、山海關、北京所要使用的禮單物品一類等。¹¹⁶但他爲了個人在中國旅遊和交流的目的下，還是參考了前人的燕行紀錄而準備了其他物品帶過去。金昌業的燕行紀錄廣泛地被朝鮮文人參讀學習，所以這些私帶物品的作法，不但可見於十八世紀後期的燕行紀錄，亦可見於十九世紀的燕行紀錄中。因此，接下來要觀察金昌業帶過去的物品都送給了哪些清人、是在何種狀況下送禮、又是否不同的物品會給不同階層的清人等問題；同時討論觀察金昌業從清朝人物交流的過程中，又拿到了哪些清朝物品。

第二節 禮品的內容

朝鮮文人在燕行路程中與清朝人交流時，常常使用了扇子、清心丸、紙筆墨等物品，大部分都是在朝鮮人跟清朝人雙方皆準備了物品的方式來進行交換。清朝人可能以招待朝鮮使節（包含住宿、飲茶、飲食、服務等）或以書籍、畫帖等做爲回禮。因此朝鮮人送給清朝人之物品，實際上聯繫著雙方互動的關係。

爲了討論雙方之間物品的流動，本文特別以朝鮮人帶往中國的物品，如紙、扇子、清心丸爲主，首先觀察中國對朝鮮物品的認識和其面貌。

（一）紙

中國對高麗紙和筆的認識，在歷代都留下文獻記錄。透過《宋史》記載：高麗「地產龍鬚席、藤席、白硯紙、鼠狼尾筆」，¹¹⁷可知「白硯紙」應該是高麗紙的原名，而高麗紙則是中國人對「白硯紙」的習慣稱呼，一直到明、清都是如此。¹¹⁸明代《萬曆野獲篇·高麗貢紙》中也提及：

¹¹⁶ 此外乾糧所出、壯紙七束、白紙二十餘束、海蔘三斤、鞘刀十餘柄、扇子三十餘柄、烟竹十餘介、南草十餘封、花峯鐵五箇。《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往來總錄〉。

¹¹⁷ 感謝故宮博物院書畫處何炎泉先生提供「高麗紙」的意見。(元)托克托等，《新校本宋史》(臺北：鼎文書局，1983)，卷四八七，頁14043-14044。見何炎泉，〈中國古代之高麗紙〉，《中華文物學會年刊》(臺北，2009.3)，頁108。

¹¹⁸ (明)李賢等，《明一統志》(文淵閣四庫全書)，卷八十九，〈外夷朝鮮國〉，頁5；(清)嵇璜等，《欽定續通典》(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一四七，頁5。見何炎泉，〈中國古代之高麗紙〉，頁108。

今中外所用紙，推高麗貢牋第一。厚逾五銖錢，白如載肪切玉。每番揭之為，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鏡面牋，豪穎所至，鋒不留行，真可貴尚。獨稍不宜於畫，而董玄幸酷愛之。蓋用黃子久潑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其表文咨文俱鹵悍之甚，不足供墨池下陳矣。¹¹⁹

可見中國貢物品中的高麗紙厚度色澤等的特色，以及董其昌等畫家如何喜愛使用。朝鮮《明宗實錄》中提到：「且中朝士大夫間，喜見我國品，好大油菴及人蔘、咨文紙、硯面；此實文房所用。」¹²⁰也可見明士大夫對朝鮮紙的喜愛。這些對高麗紙的評價一直到清朝都在，清康熙皇帝對高麗紙的描述：

世傳朝鮮國紙為蠶繭所作，不知即楮皮也！陸璣詩疏謂之「楮桑」。又曰：「江南人擣以為紙，光澤甚好，蓋以其形似桑也！」朕詢之使臣，知彼國人取楮樹，去外皮之麤者，用其中白皮，擣煮造為紙，乃綿密滑膩，有似蠶繭，而世人遂誤傳耶！¹²¹

讓我們可理解朝鮮紙在明清兩代貢物品當中，佔有重要的角色。

朝鮮朝貢物品中值得注目的是針對「紙」的項目，金昌業燕行當年的年貢禮物中有「大好紙二千卷、小好紙三千卷」，冬至禮物中也有「白綿紙二千卷」，還有在鳳城、瀋陽、山海關、北京所用禮單中，也有「壯紙六百九十束、白紙一千三百束」。¹²²金昌業也是在燕行路程中，以壯紙、白紙、各種紙來代付旅館雜費或送禮。一直到十八世紀後期洪大容、朴趾源、徐有聞的燕行紀錄中，也發現帶著一半紙上有華麗裝飾的詩箋紙帶給清朝人送禮。

¹¹⁹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北京：中華書局，1997)，下冊，〈玩具·高麗貢紙〉，卷26，頁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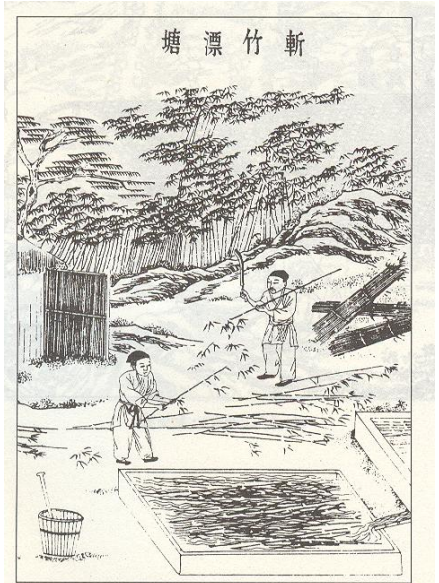
¹²⁰ 《明宗實錄》二十九卷，十八年(1563年，明嘉靖四十二年)12月13日第1條。

¹²¹ (清)玄燁，《清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四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二十八，〈朝鮮紙〉，頁9。見何炎泉，〈中國古代之高麗紙〉，頁109。

¹²² 「禮單」指的是，除了歲幣和貢物以外，到中國的各城另外特別送的禮物；《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鳳城、瀋陽、山海關、北京所用禮單人情都合數〉。

關於韓國製作韓紙的技術，¹²³最初起源是來自中國，¹²⁴然而遲至北宋時，高麗紙便已經廣泛地在文人圈中流行，且也得到相當的重視與討論（圖五）。北宋四大書家之一的黃庭堅，就經常提及「高麗紙」的使用。¹²⁵高麗時代已經由於寫經等印刷術的發達而韓紙具有了些特色，如我們已知明代畫家董其昌也愛用高麗紙。朝鮮時代在宮廷中的「造紙所」¹²⁶（後來改稱為「造紙署」）官廳負責製作生產，一直到十八世紀後期在朝貢品目中也大量涵蓋了各種韓紙。¹²⁷韓紙是朝鮮地方交納給中央的物品之一，地方政府在地方紙所生產後，交納給中央政府。由於各地的紙厚度不同的之故，¹²⁸在 1415 年設立由於中央政府管理的造紙所，該所生產的紙後來成為朝鮮對中國朝貢的物品。¹²⁹朝鮮《太宗實錄》議政府上書的啓聞中，可看到一些紙的名稱和用途：「紙地之品：以寫表箋而謂之表紙，寫奏聞而謂之奏紙，寫書狀而謂之狀紙。今也，不分名實，中外公私，皆用厚紙，以致製造之際，民受其弊。」¹³⁰在金昌業燕行紀錄中可看到大好紙、小好紙、壯紙、白紙，都是以厚薄、長短、廣狹分類之名稱。按照上文的内容，這些紙也是以厚度或大小的方式來敘述送紙的種類。其中關於詩箋紙，雖然在金昌業燕行紀錄中沒有提到，但它紙上有相當華麗的裝飾，而常用於寫詩或版畫、畫帖上，是十八世紀後期朝鮮文人常用的紙之一。¹³¹

圖五 明《天工開物》造紙圖



文震亨（1585-1645）是明代的藝術鑑賞大家和藝術品評權威，在《長物志》中推崇高麗的紙和日本毛筆值得擁有。¹³²《長物志》〈器具·紙〉中提到：「高麗別有一種，以

¹²³ 關於「紙」的用語，由於每個時代別、種類別具有特定的名稱，在燕行錄也出現不同種類的各種名稱，本文以「韓紙」來通稱在韓國所生產的各種紙。

¹²⁴ 後漢宦官蔡倫在西紀105年創作，在七世紀新羅時代使用了韓紙。

¹²⁵ 何炎泉，〈中國古代之高麗紙〉，頁 106-109。

¹²⁶ 造紙所的設立為朝鮮太宗15年（1415年）：署造紙所，戶曹請以前日議政府上納各道休紙造楮貨紙，以減外方造之弊。《太宗實錄》三十卷，十五年（1415年、明永樂十三年）7月25日。

¹²⁷ 諸洪圭，《韓國書誌學辭典》（首爾：景仁文化社，1974），頁175-177。

¹²⁸ 且楮貨之紙，各道分造以納，故其厚薄不同，揀擇之弊，亦由此而生。乞於京畿，別置造紙所，令司贍一員監之，使均厚薄。《太宗實錄》二十四卷，十二年（1412年、明永樂十年）11月28日。

¹²⁹ 金三基，〈朝鮮後期製紙手工業研究〉（首爾：韓國中央大學校史學科博士論文，2003），頁7-14。

¹³⁰ 《太宗實錄》十四卷，七年（1407年、明永樂五年）10月24日。

¹³¹ 關於朝鮮時代詩箋紙的研究請參閱高蓮姬，〈朝鮮時代詩箋紙版畫考察〉，《美術史學報》，23（首爾，2004.12），頁 253-285。

¹³² 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Distributed to the trade by Macmillan, 2008), pp. 70-83.

綿繭造成，色白如綾，堅韌如帛，用以書寫，發墨可愛，此中國所無，亦奇品也。」¹³³ 也可以看到中國人對高麗紙特色的認識，並可進一步看到中國人對高麗紙的欣賞。實際上，在《東史綱目》中可見於高麗時代已經把紙筆墨下賜給儒生當作及格禮物。¹³⁴在燕行過程中，朝鮮使節不但帶來相當數量的各種韓紙以朝貢，且五個月的燕行過程中也使用在付費和送禮等。至於筆墨，識字的清人有時會主動跟金昌業索求，金昌業也會在交流的過程中特別送這些毛筆和墨以表達感謝。十八世紀初朝鮮市場發達，而需要更多韓紙的流通與普及，造成了民間製紙業的成長。¹³⁵到十八世紀後期更出現華麗的詩箋紙，必定是文人對這些紙筆墨等文房具的講究，促成了這類文人專用物品的發展，這些現象同樣可見於金昌業與識字的清人之間送筆墨的交流過程中。

(二) 扇子

根據北宋黃庭堅《山谷集》對「高麗松扇」的描述：

銀鈎玉唾明靈紙，松篔輕涼并送似。可憐遠度憤溝淒，適堪今時襪襪子。丈人玉立氣高寒，三韓持節見神山。應得安期不死草，使我蟬蛻塵埃間。」「猩毛束筆魚網紙，松柎織扇清相似。動搖懷袖風雨來，想見僧前落松子。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持贈小君聊一笑，不須射雉殼黃間。

可知高麗帶回的毛筆，並論述高麗扇和毛筆都是出自高麗的特產。¹³⁶明代沈德符也在《萬曆野獲篇·摺扇》中提及，將高麗摺扇由於朝貢而在宋代已經入中國的情形：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聞自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目柄泥金面者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蓋自宋已入中國。¹³⁷

依據上文所述，高麗扇子是兩國之間朝貢物品中長期朝貢的物品。而透過《老稼齋燕行日記》朝鮮使節的私帶物品中，扇子為數量最多者，可能對朝鮮使節而言，摺扇是約四、五個月的行程中帶著移動最方便的物品之一，且在許多不同狀況中隨時可使用。在金昌業燕

¹³³ (明)文震亨，海軍、田君注譯，《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2004)，頁368。

¹³⁴ 《東史綱目》為朝鮮正祖二年(1778年完成)由安鼎福(1712-1792)寫成，從古朝鮮至高麗的通史書。他參考了當前的韓國史料《三國史記》、《高麗史》、《海東諸國記》等43種以及中國史書17種等廣泛的資料，並以考證學的方式描述及做比較，因此可說為朝鮮時代代表之史書之一。見國立中央博物館編，《朝鮮時代文房諸具》(首爾：通川文化社，1992)，頁172。

¹³⁵ 金三基，〈朝鮮後期製紙手工業研究〉，頁124。

¹³⁶ (宋)黃庭堅，《山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次韻錢穆父贈松扇篔〉，頁10；(宋)黃庭堅，《山谷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戲和文潛謝穆父松扇〉，頁10。見何炎泉，〈中國古代之高麗紙〉，頁106-109。

¹³⁷ 《萬曆野獲篇》，下冊，〈玩具·摺扇〉，卷26，頁663。

行日記的敘述中，可見一般中國人的認知裡，扇子是夏天用於扇涼的工具。¹³⁸值得注意的是，在金昌業燕行紀錄中可發現，許多中國人會主動跟朝鮮人要來自朝鮮的扇子。長期以來朝鮮使節使用這些扇子的原因，是帶有異國風味的扇子相當吸引中國人，能讓朝鮮使節在中國用於解決問題、或當做表示感謝的禮物、甚至用於購買書籍。

在金昌業的燕行紀錄中除了別扇、僧頭扇等以外，幾乎以「扇」或「扇子」來稱呼，沒有做更詳細的描繪。不過金昌業送扇子時，可以發現把僧頭扇送給金昌業認為重要的人物身上。如金昌業留在北京住玉河館時，在僧頭扇寫五言絕句送給清人交流的狀況。¹³⁹以及有機會遇到當時住在北京的通事文奉先家，年僅九歲的皇帝姪子，描述他禮貌又聰穎。金昌業意願特別去看他，並且看他想要扇子、筆墨，便送他僧頭扇和筆墨各一個。¹⁴⁰至於別扇，目前在金昌業的燕行紀錄中，也沒有描述它的特色或文樣所以不知其實際模樣為何，僅知通常用於稱呼比一般扇子還特別的材料而製成、且具有地方特色的扇子。¹⁴¹另外，僧頭扇是摺扇的一種，手把處像僧頭一樣圓而得名。¹⁴²金昌業批評針對乾糧官的行爲等，¹⁴³透過這些例子和給清人扇子的情形，也許可以推測，僧頭扇是朝鮮使節帶的扇子中被視為最有價值的一種扇子（圖六）。



圖六 僧頭紅摺扇

¹³⁸ 余以扇蔽塵，一市人皆笑之。似以冬月用扇為駭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6日。

¹³⁹ 書五絕一首於僧頭扇，使元建送馬維屏。維屏卽至坐東邊月廊見之，前日執筆少年亦來。《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8日。

¹⁴⁰ 貴同言皇帝孫兒來在通官所。余令驛卒引來，非皇帝孫，乃七寸姪。其父諸王，而通官文奉先，卽其奴，故此兒養于奉先家云。其年九，而人事穎悟，手引金世泓帶，索扇子、筆墨。金譯携至伯氏牕外與僧頭扇、筆墨各一送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29日。

¹⁴¹ Kum Bok-hyen, 《傳統扇子》(首爾: Daewonsa, 2006), 頁75。

¹⁴² Kum Bok-hyen, 《傳統扇子》, 頁64-65。

¹⁴³ 蓋上房乾糧馬頭名大直，龍川驛奴也。以利媚譯輩，連差此任，遂得事知名，而為人陰匈多慾。此輩所爲，有不可詳，而在東八站，大直以一僧頭扇，換一雉。元建以一別扇，換兩雉。《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30日。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燕京金昌業以弟子軍官的身分到太和殿¹⁴⁴時，曾遇過喇嘛僧向他索求扇子。¹⁴⁵儘管不曉得金昌業當時帶什麼樣的扇子給清人，不過在各種燕行紀錄中，常見清人甚至喇嘛僧直接向使節索求朝鮮的扇子；由此可知，朝鮮扇子從高麗時代到十九世紀一直是吸引中國人的異國物品之一。

(三) 清心丸

清心丸是針對解熱方面有功效的一種藥丸，在韓國自古至今仍常用於日常生活中。實際上，清心丸為朝鮮時代在宮廷裡固定使用的藥品，其作用可見於朝鮮崔崑（1539-1612，字立之，號簡易、東臯）的《簡易集》中說：「自吾忝知憐，種種拜大細，特感分臘封，以為新年計，清心攻盛熱，微猶去煩滯，蘇合下邪冷，貴在平乖戾。」¹⁴⁶由上可知清心丸的效能。在朝鮮《世宗實錄》中也可以看到世宗年代承政院的上書中提及一般民眾任何狀況都使用清心丸，為避免被濫用而不可在「惠民局」和「典醫監」以外的地方製作清心丸的事情。¹⁴⁷

¹⁴⁴ 關於北京的宮廷中「太和殿」的記載，除了金昌業以外，也可見於許多朝鮮燕行使節的紀錄中。例如，李宜顯（1669~1745，1720年燕行）描述：「北京宮闕制度，太和殿前有五重門：第一太和門；第二午門或名五鳳門；第三端門；第四天安門；第五太清門。門外數百步有正陽門，此城門也。自太和至正陽，其直如繩，闕則內外洞然，無少回曲。太清門內左右月廊，各百餘間。天安門內左右月廊，各二十二間。中間各有門，左通宗廟，名曰廟街門，右通社稷，名曰社街門。端門內左右月廊，各四十餘間，而北頭有兩門，左闕左門，右闕右門。南頭有兩門，右曰社左門，左曰神廚門也。」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雜識〉下；洪大容在《湛軒燕記》中描述：「太和殿，大朝會正殿也。南有太和門，在午門之內，左昭德門，右貞度門。東有協和門，在東華門之內，西有熙和門，在西華門之內。北有中和殿，單簷圓閣。中和之後，為保和殿兩簷。保和之後，為中禁大內，惟見彩瓦峻臺，簷峙于瑞靄中而已。太和正殿三簷，高可百丈。南北三間，東西九間，一間之大，可二十尺。」洪大容，《湛軒燕記》外集卷九，〈太和殿〉，248_290b；1780年燕行的朴趾源也是在《熱河日記》〈黃圖紀畧·太和殿〉中詳細記載：「太和殿，皇明時舊名皇極殿。三檐九陛，覆以琉璃黃瓦。月臺三層，各高一丈，每層為白玉護闌，悉雕龍鳳，闌頭皆為螭首外向。臺上立鐵鶴，翩然欲舞；第一臺闌中，列置八鼎；第二臺闌角，對峙兩鼎；第三臺闌中，夾闌各峙一鼎，鼎高皆丈餘。庭中亦列三十餘鼎，其出色神巧，古之九鼎，亦或在此也。自太清門為白玉闌，連延曲折至太和殿。又周匝至中和殿，又至保和殿，如亞字殿，前東曰體仁，西曰弘義臺。高幾與太和殿陛齊，而但一層一闌耳。大抵太和殿，乃天子出治之所，而不甚高大。」朴趾源，《熱河日記》，〈黃圖紀畧·太和殿〉，252_306a。感謝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朱鴻老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王一樵學長對康熙宮廷中「太和殿」的意見。

¹⁴⁵ 以一別扇與引來宦者，遂引余出坐中門外小屋，待以茶。一宦者求清心元，所謂官員亦欲得之，竝許，又有喇嘛僧求扇，亦許之，而以無持來者，使於明日。持問答所書紙，來館中討去，諸人喜而謝，問善興姓。《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癸巳年2月9日。

¹⁴⁶ 崔崑，《簡易集》卷八，〈西都錄〉前。

¹⁴⁷ 《世宗實錄》八十八卷，二十二年（1440年、明正德五年）1月22日。

值得注意的是，金昌業在返回的路上，經過通遠堡、乾者浦時都遇到索求清心丸的清人，這些地方為前燕行使節必經之處，住在當地的滿洲人更由於已經吃過、體驗到它的效果，所以會特別索求清心丸：「此處胡人求清心元者尤多。一胡云：『去年九月生小兒，患急驚風，目直牙堅，嚼清心元灌之，便甦，仍得痊可。』抱其兒來示，稱其神效云。」¹⁴⁸金昌業於返回的路上又數次遇到索求清心丸的清人，礙於當時手上無存，約好托人在下次的機會補送。

除此之外，金昌業在燕行路程中帶著清心丸送給清朝人的情形，大多數都是在清朝人主動請求時。例如，金昌業在北京的時候，認識清人序班潘德輿（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人，當時 27 歲），在跟他交談後，潘德輿便請求給他一個清心丸。¹⁴⁹因此，透過金昌業的燕行記錄，可觀察清朝人已經認知清心丸，及清心丸的效果，而大多數狀況都以清人主動請求清心丸。

第三節 物品交流的功能

朝鮮使節在中國已經形成了送禮的風氣，透過金昌業的燕行記錄，可發現他在往北京的使行過程中也不例外。被國家派遣往燕京，雖然整個行程需要耗費大約五個月的時間，但既然有機會前往燕京，便準備私帶物品過去，好趁機多與清朝人接觸交流。實際上，因為這些私帶物品，金昌業得以結識各種不同身分或階層的人。透過這些物品，我們可以看到兩國人建立起了一種人際關係，而朝鮮使節可以跟清朝人物交流中，得到各式各樣的資訊。¹⁵⁰通常在結識清朝人之後，會先用筆談提問關於出身和是否當官等個人問題，還會提出針對科舉、朝鮮衣冠、地方風情等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朝鮮物品，透過這些送禮用的物品在兩國人的互動中，產生了贈答、貨幣、解決人際問題與文化傳播的作用。因此，以下討論，是否把不同物品送給不同階層的人、如何交換？這些物品的交流中形成了什麼樣的

¹⁴⁸ 朝鮮人口中的胡人是居在於東北的滿洲人。《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12日。

¹⁴⁹ 序班中有潘德輿者，為人伶俐，文筆足以通情。因其入來邀坐，先問閒說，應對敏捷。余問貴鄉何處，姓名云何，年幾何，德輿對曰，家在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姓潘，名德輿，年二十七。問來到北京幾年，答曰，四十七年戊子來矣。《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之四，癸巳年1月3日；飯後，往見書狀，還坐堦上。序班潘德輿入來，求清心元，即與一丸。《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8日。

¹⁵⁰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gif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2.

關係？或雙方關係因此產生了什麼樣的作用等的問題。我們從金昌業在往北京的路程中的故事開始，觀察不同狀況中送紙筆墨、扇子、清心丸等物品的狀況。

(一) 贈送

首先，金昌業在中國送禮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人際網絡，他以贈答的方式來表示感謝。¹⁵¹金昌業在跟清朝人認識後，通常透過與其筆談可以得到相當多關於清朝的現況。

金昌業在紀錄中描述了往中國的路程中，使節團在停留瀋陽附近時，有機會去看附近的佛堂，還得以進入正殿參觀，見到精緻的桌子和玉器等，看完從正殿出來後，將一把扇子送給開門者表達感謝。¹⁵²到達北京後，第一次前來的金昌業對一切充滿了好奇，靠著牆壁遙望外面的景色，但遭中國軍（稱為「甲軍」）阻止。當年的朝鮮使節在北京的行動範圍比起前期要來得自由，¹⁵³不過通常甚至去汲水的時候，也仍然要由甲軍陪同往返。某次金昌業因為送了軍人一把扇子，而有機會跟甲軍一同走趨北京城內。他在北京三忠祠遇到幾位和尚，以筆談結識後送了朝鮮扇子給他們做禮物。¹⁵⁴另外，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可以看到金昌業獲譯官文鳳先送上兒子娶媳時的喜酒菜餚。其實這些料理對金昌業來說並不算稀奇，但他還是描述了菜色種類，而且因料理手法偏向朝鮮，還而感到很對味。除此之外，從餐碗的華麗也反映出文鳳先的富有。因為當時兩國之間的通事是通兩邊語言的人，並且每年有兩次以上的燕行頻率，所以他們可以靠買賣東西或收禮、收賄等來累積財富。到十八世紀後期，譯官因此腐敗而成爲新興的有錢階級，並且帶來諸多問題。透過金昌業對受招待的描繪，可見飲食的種類眾多，且使用的陶器帶有紋樣。而且通官大部分是跟朝鮮民族聯姻而成家族的，所以這些送過來的飲食對金昌業來說並不陌生。無論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通官文鳳先的招待，朝鮮使節以壯紙、煙竹、別扇等來做爲回禮。¹⁵⁵同時，金昌業發現清朝人有對朝鮮使節不收錢的情形，原因是前燕

¹⁵¹ 閻雲翔，李放春、劉瑜譯，《禮物的移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42-50。

¹⁵² 其徒開正殿。殿內有三座金佛，龕屋及几卓奇巧，曾所未見。卓上有玉器一雙，狀如筆筒。似是插花者，高可半尺許。以一扇與開門者，受而置佛前，又與南草一封。《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8日。

¹⁵³ 貢使入燕，自皇明時已有門禁，不得擅出游觀。爲使者呈文以請或許之，終不能無間也。清主中國以來，弭兵屬耳，恫疑未已，禁之益嚴。至康熙末年，天下已安，謂東方不足憂，禁防少解。然遊觀猶托汲水行，無敢公然出入也。數十年以來，昇平已久，法令漸疎，出入者幾無間也。洪大容，《湛軒燕記》，〈外集〉卷七，〈衙門諸官〉，頁248_250a。

¹⁵⁴ 所領甲軍凡兩人，其一，朝與約者。別贈一扇。《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癸巳年1月8日。

¹⁵⁵ 通官文鳳先，是日娶子婦宴客，以其饌送于三使臣各兩卓。一各□魚肉，一各□糖餅果子，

行使節在天丹門附近汲水的時候，送了他們扇子的關係。¹⁵⁶實際上，金昌業所參見的派往明朝之使節許筭的使行紀錄中描述：「遣李廷敏致禮物于江沿臺備禦指揮劉胤昌，守堡官副千戶程士忠，備禦、守堡官等送舍人六名，亦來致下程，依例饋餉，各給扇帽。」，可知將扇子或朝鮮物品送給中國人的一事，早在明時期已經有的情形。¹⁵⁷除此之外，在金昌業描述的很多相關送扇子的紀錄中，還可以看到把扇子送給幫忙遞送書信或物品的人、或其同行的人等以做托運之資。¹⁵⁸

金昌業在送禮回禮的時候，把扇子用於結識對方或感謝對方的招待。但金昌業送清心丸在不同的狀況下，如需要表示更多謝意、有特別想得到的東西時，或清人已經知道清心丸的作用而主動對金昌業索求的時候。金昌業往北京時經過寧遠衛，他認為寧遠城地比瀋陽還莊觀。¹⁵⁹他在這想起了前燕行使節宋玉汝《丁丑燕行記》中關於寧遠城秀才的紀錄，便去找了當時十四歲的漢人秀才王寧潘，與他筆談關於當地官員和各俸銀、關於明末在寧遠城的將軍吳三桂等情事。二人筆談到深夜，王寧潘送給金昌業幾本書，並且托金昌業送書給宋玉汝。當時金昌業正在往北京的路程中，因此約他回程中再向王寧潘拿取回這些書。金昌業認為即使送給他一把扇子，對透過前使節所認識的王寧潘也不足以表達感謝，於是問他如果要清心丸的話，想加送給他作回禮：「余曰：『領教此書，載重難運，今姑寄留，待回來持去如何。』」答：『恁憑尊意，今此暫別，待足下事畢回東，與足下相談終夜，亦欲領教矣。』」余曰：『深荷鄭重，適奉一扇，不足表情，如要清心元，當覓呈。』」答：『深荷，贈扇亦是感感不盡，何謂不足表情也。』」問：『清心元，曾未聞知否？』」答：『不知。如有少賜，徵須，但不敢啓齒。』」遂與一丸。¹⁶⁰此外，金昌業在經過三河縣時，知縣李長華由於想見這些朝鮮使節，送上兩隻豬和米六斗，朝

水陸珍味盡具，而極精潔。間染五色雜湯之類最多，余遍嘗，皆可食。我國鰻魚、海參、大口。亦有焉。果則自龍眼、柑橘至梨、柿之屬，無不登者，而柑子剝皮細切，又有藥飯，倣我國法爲之，其味最佳。器皆畫磁，而碗碟樣皆大，兩卓合五十八器也。上房以壯紙二束、烟升一枝、別扇二把回禮。來人亦與扇及烟升。《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癸巳年1月14日。

¹⁵⁶ 自天壇南去數百步許，當路有兩井，水極多，持桶而來者相屬，或馱驢，或扁擔。用轆轤而汲之，井旁小屋有守者，一桶收三錢，而於我國人不取直，屢汲，方酬以扇把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癸巳年1月19日。

¹⁵⁷ 許筭，《荷谷朝天記》上卷，甲戌年6月17日。見夫馬進，〈萬曆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国批判〉（萬曆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国批判），收入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委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558。

¹⁵⁸ 來人賞以一扇一煙升。《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癸巳年1月26日。

¹⁵⁹ 此處人家市肆之盛，雖不及瀋陽，而城池之壯。《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壬辰年12月15日。

¹⁶⁰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壬辰年12月15日。

鮮使節也是以紙和清心丸等回送做爲感謝。¹⁶¹抵達北京後 44 日（癸巳年 2 月 9 日），朝鮮使節進共方物時，金昌業得到機會與譯官同行進入太和殿各地，隨著到大光明殿。因官員的招待而得以進入參觀，所以金昌業給了官員一把扇做謝禮。而由於受官員（宦官）的招待，又遇上了索求清心丸的官員，且旁邊的喇嘛僧也同時索求扇子：「以一別扇與引來宦者，遂引余出坐中門外小屋，待以茶。一宦者求清心元，所謂官員亦欲得之，竝許，又有喇嘛僧求扇，亦許之，而以無持來者，使於明日。持問答所書紙，來館中討去，諸人喜而謝，問善興姓。」¹⁶²於是金昌業寫下保證書給他們，說明天來拿兩個清心丸以及扇子。¹⁶³

透過前述的內容可以發現金昌業會在筆談後送上扇子、清心丸等物品，當做相識後表示友情的紀念品。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金昌業企圖以送禮維持人際關係，尤其是在北京認識的漢人之間，如李元英、馬維屏等人，金昌業或對方會以送物品來表達自己想要交流或見面的意願。透過他在北京的期間，雙方都不斷地送各種物品給對方，以保持交流的關係。有關具朝鮮文人身份的金昌業和清人之間的兩國交流，於第三章金昌業和清朝文人的交流中，再提出來細談。

（二）貨幣

朝鮮物品中以贈答的方式表示感謝的禮物，在中國仍然是經濟活動中，一種重要的交換方式，即是貨幣的作用，也可說是市場商品體系的作用。¹⁶⁴

朝鮮使節往北京的路程中，通常過夜停留在前人所住過的地方，並可發現將住宿的雜費以朝鮮物品來付費的情形。金昌業在當年經過中國地區爛泥堡時，曾發生意外的插曲。也就是吃完早餐之後要離開前往北京時，滿人老闆因不滿意使節所付的住宿費用，而不讓使節同行的譯官走，金昌業便送他一把扇子，解決了這個問題。¹⁶⁵再過八天往北京的路程中，燕行使節在大凌河站留宿漢人家時，也發生類似的情形。到晚上他們要住前使節曾經

¹⁶¹ 本縣知縣以豬二頭、米六斗，分送上副房。上副房各以紙束清心丸等，送上通事回謝。彼又款待，知縣姓名，李長華也。後聞求見使臣，而譯官輩言于書狀。《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5日。

¹⁶²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之六，癸巳年2月9日。

¹⁶³ 大光明殿人持書來，以清心元二、扇子一送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巳年2月10日。

¹⁶⁴ 閻雲翔，李放春、劉瑜譯，《禮物的移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頁 15。

¹⁶⁵ 朝飯行，主胡嫌房錢少，執申之淳不放，余以一扇與之，始免。《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壬辰年12月5日。

住過的地方時發現，不但住宿費不理想，而且服務態度也讓他們不滿意。因此，朝鮮使節決定給他扇子和白紙等物品，不過收到這些物品的中國人不滿意。¹⁶⁶除此之外，燕行使節在前往燕京路途中，在豐潤縣留宿前使節住過的地方，漢人的主人招待了茶果和酒，朝鮮使節則把扇子和紙送給主人表示感謝。¹⁶⁷關於朝鮮使節到北京的住宿費，他們在北京的玉河館住了大約一個半月左右（按照金昌業當年的燕行，從12月27日至隔年2月14日共46天），離開北京那天付在廚房所花的費用上共銀100餘兩。¹⁶⁸負責這些住宿和飲食費用的是燕行路程中所需飲食管理的乾糧官¹⁶⁹，會爲了這些費用而準備所謂的禮單，如紙（壯紙、白紙）、海蔘、鞘刀、扇子、烟竹、南草、花峯鐵。透過這些紀錄可知，這些物品並不是朝鮮使節燕行路途中做全額支付住宿費用，而是在發生問題或接受了款待的時候，朝鮮人才會以扇子和紙等物品送給他們當做旅費和禮物。但收受的中國人反應不盡相同，有時願意以這些當做代價、禮物，有時仍然不接受，而讓兩者之間當下的問題不能解決。

不僅止上述所言，朝鮮使節的扇子用於交換物品的狀況處處可見，如使節停留在乾者浦時，便是以一把扇子換得二隻雉雞爲餐。雖然在中國境內的朝鮮使節在前往北京時必須一路有中國軍同行而受到行動上的限制，但每年的燕行中，自然而然出現了軍人私下和商人合作，而促使得許多中國商人可以經常和朝鮮人做買賣的情況：「其入門內者，除是與甲軍相親，否皆有賂；甲軍所以嚴門禁者此也。在乾者浦，以一扇換二雉，至是炙之，與諸裨同喫，味殊佳。」¹⁷⁰例如，朝鮮使節停留的地方，常會出現賣書的商人，金昌業即描述了主要的書目和價錢，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以扇子來付錢的狀況：

賣書者多，而索價甚高，有《畫苑》、《書苑》兩書，評論古人書法畫法，無價不得買。又有《昭明文選》無註者，字□大，宜於老眼，其價別扇八柄，而亦不能買。¹⁷¹

金昌業看到的書有《畫苑》和《書苑》，爲評論古代書法和畫法的相關書籍；另外還有金

¹⁶⁶ 入廊屋，亦可過夜，而索房錢倍於他處。女人尤悍惡，觸事生怒，啐罵不已。乾糧馬頭大直以壯白紙及扇竹等物，優數與之，而不肯受。其意無厭，可痛。譯輩言此家自前如此，使行無不見辱而去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13日。

¹⁶⁷ 南邊小巷有谷姓漢人家，自前使行宿處也，主人自稱舉人。……夜，主人出茶果一卓，饌品與沙河畧同，而酒則不及矣。既饋之後，索價多，可鄙。……家主亦出茶果及酒待之，與諸裨同喫。使廚房酬以紙扇等物。《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2日。

¹⁶⁸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癸巳年2月14日。

¹⁶⁹ 乾糧爲燕行使節在燕行路程中所需的飲食，在《老稼齋燕行日記》指的乾糧爲管理這些食物的乾糧官。乾糧官再可分爲乾糧軍官、乾糧譯官等。

¹⁷⁰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壬辰年11月29日。

¹⁷¹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2日。

昌業認為字體大，適合長輩讀的《文選》，此《昭明文選》即是以八把別扇的價錢賣給朝鮮使節。如前所述，在燕京的時候，金昌業穿著軍服與中國軍人找到機會一覽北京城內；在癸巳（1713）年1月8日時，也是穿著軍服和已經約好的中國軍人一起到崇文門，而在附近遇到賣東西的滿人，金昌業覺得眼前這類似水磨石的東西相當美，雖是人工做出來的卻比天然石還漂亮，於是以一把扇子的價錢買了下來：

立階上，一胡至前，袖出兩石，大塵數寸，圓而扁，如水磨石，而較溼潤，質淡黃，而有青紋。細視之，人物、樹木、巖洞、雲烟皆具焉。謂之天成則必無是理。然堅且重，亦似非燔物，磨之石，終不磷，又非染也。殊可怪，然其直一扇，明是假物，而人巧至此，却勝天造，遂買取。¹⁷²

以扇子和從朝鮮帶來的物品做買賣，尤其是朝鮮使節燕行的目的，也就是使節帶來的貢物獻給皇帝後，會出現稱為「告示榜」的公佈，讓使臣和商人可以進行買賣：

夕時，告示榜出來，示使臣後貼之，告示榜者，許買賣榜也。自是日行中人益有忙色，南貨貴，故一行盡買雜物。雜物異於白絲段疋，無定價，遇一物則群爭之，一兩價增至十兩。以此所買之物，互相欺匿，譯輩亦言其可羞；蓋在前則不至如此云。譯輩自家賣買外，最以士夫家別付為悶，其價多是紙扇筆墨之類，以此失利甚多云。¹⁷³

金昌業描述，由於藉此機會可以買帶南方的雜物，而與他同行的使節團為買賣忙著做準備，提到這時通用的主要是扇子、紙筆墨等，且朝鮮人以這些物品買東西多不划算而有損失情形。金昌業離開北京後到豐潤縣地方，又遇到去程時看過的書籍中的《文選》。這次金昌業與賣書的人商量討論價錢後，最終決定以九把僧頭扇買下這本書。同一天，金昌業描述因為曾經聽過該豐潤縣察院的毛筆很好，而以八把別扇買下一支當地的筆。¹⁷⁴

當時兩國都通用的金錢為銀兩，而朝鮮使節帶來的物品，是相當於銀兩的異國商品。實際上，金昌業所買的書籍和筆墨，就是跟對方講價後，以扇子購買的中國物品。在回朝鮮的路上，以清心丸來買花的狀況也如此。除了以通事為主形成的貿易現象以外，還有一些個人買賣的現象。燕行紀錄中，金昌業也曾提到朝鮮士大夫託譯官買中國物品的情形。

¹⁷²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8日。

¹⁷³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巳年2月10日。

¹⁷⁴ 多出書冊要賣，其文選亦在，而其直更討，僧頭扇九柄，乃許之。……曾聞此處筆好。使金尙鉉買來。其直一別扇八枝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七，癸巳年2月19日。

(三) 賄賂

朝鮮使節將朝鮮物品使用在於發生問題解決的時候。依據《老稼齋燕行日記》可見這些物品是金昌業主動給對方的禮物。基本上，這些禮物存在著金昌業有其想要達到某種目的的意味。金昌業在北京出入都有甲軍在監視，他都會拿各種朝鮮物品給他們，這背後就有著金昌業想要自由活動的目的。並且，在往北京的路程中，金昌業不但去各地的城市、寺廟，也通常會使用這些物品來請求當地人的許可進入參觀。例如，在北京的欽天監，並沒有對外國人開放，不過金昌業描述了自己當時用一把扇子便得到進入的機會。¹⁷⁵當然，在太明光殿也是當時金昌業無法進去的地方，但很意外地，有一個官員出來讓金昌業入內參觀，金昌業就以一把扇子來表示他的感謝。另外，金昌業還描述了關於譯官的腐敗，這些也可以說是透過兩國各自給通事送禮而產生的問題。前人透過譯官解決問題時使用的這些禮物影響著後代的使節，讓譯官期待從他們身上能得到更多更大的物品，也就是賄賂禮物 (corrupt gift)。¹⁷⁶

使節團在離開北京往回朝鮮的過後 15 日，途中停留在大凌河地方，又遇上當初往北京路上時曾交談過的當地人王俊公（當時 50 歲）。二人筆談後，王俊公送給金昌業兩條鯰魚，金昌業則回禮別扇和火鐵，但王對金昌業進一步索求了扇子、刀子、墨等物品。¹⁷⁷除此之外，金昌業還描述了在當天的路程中有一個衙譯，雖然對他的品性方面不太信賴，但因為想有機會去遊覽，所以送了這個衙譯白紙、別扇、僧頭扇等的物品。¹⁷⁸能夠旅遊到北京的金昌業，以後金昌業的遊覽離遼陽城約 30 餘里遠之往千山的途中，過夜在山上的寺廟時，也常常以各種韓紙、筆墨來代價為過夜的費用和感謝禮物等。

金昌業留在北京的時間都對清軍送了許多禮物，幾乎清軍所想要的物品都會送給他，因為這些清軍人是金昌業和許多朝鮮使節到北京時隨行監視的人，對朝鮮使節來

¹⁷⁵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七，癸巳年2月15日。

¹⁷⁶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gif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54-166.

¹⁷⁷ 王俊公又來見，呈一片小紅紙。……余問曰：龍河便是凌河否？曰：是。冠紫荆云云，指錦州形勝而言，蓋此處所傳俗語也。以鯰魚二尾來獻，長皆尺許，以別扇火鐵各一酬之。問特送兩魚，何意。答曰：至誠奉敬大老爺台前。問這魚何名。書曰：鯰。問人言平康王已招安，然否。答福建招安。上片又書曰：子念書小扇一把、刀子一把、烟代一介、頂子一介、墨一丁，其意蓋欲得也。答曰：刀子小扇俱無，一烟代、頂子、墨當送，即令覓給。書曰：讀書人至誠感謝不盡。問要錠子，何用。答地方共用，頂子，即紫金丁頂子，二字通用也。問其年，五十五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八，癸巳年2月29日。

¹⁷⁸ 衙譯求紙扇。以壯白紙各一束，別扇，僧頭各一與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八，癸巳年2月29日。

說他們畢竟最直接影響到自己的行動範圍。因此，金昌業給清軍人的禮物種類相當多，次數也頻繁。¹⁷⁹北京通事朴得仁也是金昌業停留在北京時常常接觸的人，亦為由於燕行的機會而有累積財富的通事之一，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山川風俗總錄》中介紹了朴得人家中的美酒，且提及在許多地方朴得仁招待了使節享用水果等當地特產與食物。朴得仁並清楚了解金昌業等朝鮮使節的興趣，送去「沈香山琉璃燈」讓金昌業玩賞，金昌業因此在歸還時，順便送他清心丸等各種物品表示感謝。¹⁸⁰另外，也可以看到金昌業將清心丸等物品用於購物上。在回朝鮮的路上，金昌業再次於當初往北京時曾停留過的沙河驛過夜，也就是每年使行所經過的地方。金昌業特別以清心丸二丸、蘇合元五丸等藥品給主人，請他托下次的燕行使節，寄送「探春花」和「茶□花」。¹⁸¹由於兩國之間每年有兩次以上固定的燕行，如此使節可以買些東西托下次的使行拿回。同樣地這些貿易現象，十八世紀末通事掌握對兩國的私貿易更深，出現更多私貿易和走私貿易現象。關於這點在第三章再提出細談。

(四) 文化交流的作用

金昌業所帶到中國的特別物品中，詩和畫是更有利於金昌業與中國文人之間交流的重要媒介。依據《老稼齋燕行日記》的記載，可知在中國也有將這些詩文和繪畫作品作為送禮的習慣，其中在金昌業燕行紀錄中描述關於看病時給醫生的禮物。金德三（1680-？，字鼎甫，號杏村）為朝鮮肅宗二十五年（1699年）及第被舉為內醫，當年以別遣御醫的身分往燕京。他曾在北京時，被找去太和殿替皇帝的第七個皇子看病，因此頗有名氣。¹⁸²某日金德三帶給金昌業一幅畫，¹⁸³又某日帶詩文來送予金昌業，亦稱得自病人：

¹⁷⁹ 歸館日已晡，俄已門閉。在前入門之際，提督奴疑有市物從人懷袖，盡行搜攞，是日則不然。蓋屢次探索，而無所得也。余亦以烟竹扇子清心元等物與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9日。

¹⁸⁰ 朴得仁以沈香山琉璃燈入送，為供伯氏一玩也。見後還送，以壯紙、扇子、煙升、清心元、花峰鐵、鷹鈴等物，酬其接待之意。來人賞以一扇一煙升。《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26日。

¹⁸¹ 乾糧以壯紙、青粧刀、清心元、長烟竹等物酬之。余亦贈清心元二丸、蘇合元五丸、紫金丁二錠，求探春茶□二花，待明春使行寄送許諾。主人見余所服木綿布，問價於元建，請於明年送二疋，許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七，癸巳年2月20日。

¹⁸² 譯官輩來言皇帝第七子在暢春苑有病，欲見御醫，再明間當邀去，通官預來傳之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4日。

¹⁸³ 金德三以畫簇一張來。即王子猷雪夜入剡圖，筆法蒼勁可愛，得於問疾人也。曾聞此處人問疾於我醫，勿論其效有無，皆有所贈，謂之面皮，其物無非錦緞。今則不然，而書畫之屬則頗有來遺者云。凡問於德三者，鎮日紛沓，而或入來，或坐衙門招出。女人則不得入來，皆舍于館門外，因通官求見，館門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

德三出示紅紙，書五言律詩一首，云是問病胡人所贈。詩曰：楊柳未堪折，君行何可留。語言相漸熟，離別忽深愁。袖拂春風裏，巾欵紫陌頭。一鞭果下馬，東海路悠悠。¹⁸⁴

該詩文的內容，可看出為病人針對金德三所寫的作品。並且透過「聞此處人問疾於我醫，勿論其效有無，皆有所贈，謂之面皮，其物無非錦緞。今則不然，而書畫之屬則頗有來遺者云。」可知金昌業描寫病人對朝鮮醫者醫病的效力不管如何，基於禮貌人情上都會送禮，但同時也可以推測這些現象不見得是針對朝鮮醫者的習慣，而是在中國對醫生普遍會有的行為。

除了以詩文作為禮物的情形之外，文人畫家金昌業特別帶過去的物品中，由其 1713 年 2 月 8 日的燕行紀錄可見一般，金昌業千里迢迢帶著鄭澈（1676-1759，字元伯，號謙齋、蘭谷）的作品至北京，終於在離開北京前六天找到知音馬維屏，送上該畫做為交流的禮物。馬維屏住在北京北方的大佛寺附近，金昌業由於前者燕行使的紀錄而知道該地點，前往拜訪，進而與其以筆談認識交流。透過金昌業的紀錄，可見馬維屏家中極華麗富有，具有各種藝術作品。馬維屏本身亦有相當高的詩作與繪畫能力，在金昌業所給他的許多繪畫作品中，對鄭澈的作品特別喜愛：

鄭生□、趙生榮祐、畫師李穉所畫山水、尹進士斗緒人物，有所持來者，遂皆出示。維屏以鄭畫為勝，遂與之。尹畫，即小紙畫一僧者，維屏以衣紋生短之。¹⁸⁵

鄭澈為朝鮮後期形成「真景山水畫」的畫家。¹⁸⁶實景山水畫早在中國出現，同樣在韓國和日本的畫實景早期以出現，然而十七、十八世紀的中日韓國各地都興成畫實景山水的風氣，東亞的共同繪畫現象中各國不同的風格被學界關注。¹⁸⁷

23 日。

¹⁸⁴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巳年2月14日。

¹⁸⁵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8日。

¹⁸⁶ 感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石守謙老師提供此論文和意見。觀於真景山水畫使用用語，實景山水畫（real-scenery landscape painting）與十八世紀在韓國興成的真景山水畫（true-view landscape painting）之間有所不同。真景山水畫具有描繪出名山川的實景以及更美的理想向含該在裡面。見 Song-mi Yi, "Artistic Tradition and the Depiction of Reality: True-View Landscape Painting of the Choson Dynasty," in *Arts of Korea*, fro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ed. Judith G. Smith (exh. Cat., New York: June 9, 1998-January 24, 1999), pp. 332-334.

¹⁸⁷ 高蓮姬，〈鄭澈的真景山水畫及明清山水版畫〉，頁 137-162；洪善杓，〈真景山水畫는朝鮮中華思想의所産인가?〉（真景山水畫是否朝鮮中華思想的所產物？），《KANA Art》，38（首爾，1994.7、8），52-55；韓正熙，〈朝鮮後期繪畫에미친中國의影響〉（中國對朝鮮後期繪畫的影響），《美術史學研究》，206（首爾，1995），頁 67-97。

金昌業家族和謙齋鄭澈之間關於繪畫的互動，可見於金祖淳（1765-1831，字士源，號楓臯，詩號忠文，1792年燕行）的《楓臯集》上：

謙齋，吾先世舊隣也。少而善畫，家貧親老，謀斗祿於先高祖忠獻公，忠獻權其入圖畫署，既而筮仕，官至縣監，壽八十餘。所與友皆一時名流，即其人可知。其畫晚益工妙，與玄齋沈師正並名，也謂謙玄，而亦謂雅致不及沈，但沈師雲林石田諸家體格，不離影響之中。謙翁毫髮皆自得，而筆墨兩化，非深於天機者，藍不能至此。中古以來，當推東國第一名家，然沈亦才思絕羣，政謙翁勍敵也。人之為言，良非無見。¹⁸⁸

按照該文可知由於金昌業的推薦可以在宮廷畫院「圖畫署」當畫員，後來成為縣監，並且鄭澈的畫風引起了朝鮮後期畫壇中十七世紀「真景山水畫」。關於形成鄭澈的畫風以及其發展，可發現他在與金昌業和他的兄弟之間交流學習中受了不少的影響。首先由上文亦可見，鄭澈得到金昌業的推薦而得到官職，並且在金昌業建立的圖書堂「洛誦樓」以及金昌業建立「別墅庭園」¹⁸⁹中學習了當時朝鮮流行的南宗畫，如此藉由洛誦樓等空間，鄭澈得以與金昌業家族和其他兄弟交流學習。¹⁹⁰

並且透過金昌業家族的背景中，也顯示出對鄭澈畫風的影響。鄭澈和金昌業家族的交流中，一方面可以得到金昌業家族的支持和山水遊記的趣向，另一方面可以參見十七世紀已經從中國傳到朝鮮的《顧氏畫譜》、《唐詩畫譜》、《芥子園畫傳》，¹⁹¹及明代代表版畫及《海內奇觀》、《名山圖》或清出《太平山水圖》等的山水版畫集，可以幫助鄭澈呈現朝鮮固有的真景山水畫之基礎。¹⁹²並且金昌業和鄭澈交流關係相關資料中，亦值得關注之處為金昌業的庶子金允謙（1676-1759，字克讓，號真宰、山樵、默樵），¹⁹³他也是受

¹⁸⁸ 金祖淳，《楓臯集》卷十六，〈雜著·題謙齋畫帖〉，頁289_382d。

¹⁸⁹ 金昌業曾經沒有任何官職，不過由於家門的權勢，金昌業可以建立「別墅庭園」。金昌業在「別墅庭園」做藝術活動以及養成後學。相關紀錄請參考《景宗實錄》第十卷，二年（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10月14日第3條：「向來逆集之當國也，其弟昌業，以貪財牟利之人，憑藉其氣勢，箭里閱武之場，郭外養松之地，作田作畝，募民耕墾，不有邦禁，任作已物。事之痛惋，莫此為甚。請令京兆，發遣郎廳，一一摘奸，依前禁斷。」；《景宗實錄》十卷，二年（1722年、清康熙六十一年）11月11日第1條。

¹⁹⁰ Song-mi Yi, "Artistic Tradition and the Depiction of Reality: True-View Landscape Painting of the Choson Dynasty." in *Arts of Korea*, fro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ed. Judith G. Smith (exh. Cat., New York: June 9, 1998-January 24, 1999), pp. 342-351.

¹⁹¹ 請參見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華發行，1994）。

¹⁹² 高蓮姬，〈鄭澈真景山水畫與明清山水版畫〉，頁157、159。

¹⁹³ 相關研究請參閱李泰浩，〈真宰金允謙의 真景山水畫〉（真宰金允謙的真景山水畫），《考古美術》，152（首爾，1980.8），頁1-23；李泰浩，〈韓國의 真景山水畫 真宰金允謙〉（韓國的

鄭叡畫風影響的朝鮮後期畫家之一，不但受父親金昌業的影響，也繼承了鄭叡的真景山水畫風，而被稱為「謙齋派」。

透過上述金昌業家族與畫家鄭叡的相關資料，一方面可知金昌業對詩書畫等藝文方面相當有才能和水準的朝鮮文人士大夫，另一方面可見因為金昌業與朝鮮後期著名的畫家鄭叡的密切交流、使得鄭叡的作品得以流傳至燕京，介紹給中國。而關於中國人馬維屏如何青睞、推廣鄭叡的作品，值得於日後透過中國的相關資料來進一步研究。

金昌業對鄭叡的惜才之情，按照金昌業私帶鄭叡等的朝鮮畫家畫作到北京給清人禮物，介紹了朝鮮的畫家和畫風。實際上，燕行的機會使中國的新學術或藝術可以急速傳入到朝鮮，引起了很多同樣的文化面貌，如詩文交流和山水遊記等旅遊。鄭叡的朋友文人畫家趙榮祐（1686-1761，字宗甫，號觀我齋、石溪山人）說：

謙齋《海岳帖》、《嶺南帖》、《四郡帖》，便一東國山海經，世間不可無者，而獨恨我國刻法魯莽，無以廣不傳遠。大抵書畫之出於東國者，其傳尤短，無妙於其剝刷之法也歟！¹⁹⁴

透過該文可知，燕行是朝鮮和中國之間很重要的橋樑。西方學者視為，中國與韓國、日本的文化互動，其來已久，因此韓國、日本的東西可視為和中國的東西屬於同一文明精神範疇。它們是和中國之物有所差異，但那差異不強烈，只是奇特，還沒到怪異的地步。¹⁹⁵其中，鄭叡的真景山水畫對日本山水畫的其影響，也是中日韓學界各關注的議題之一。這更讓我們了解燕行導致形成周邊國之間之文化交流的現象。

總上所述，朝鮮使節到陌生的中國，要找出在每個地方如何能真實地向自我和他者表現出自己的象徵的形式，如語言、形象、制度、行爲。¹⁹⁶由朝鮮使者帶的這些物品中，可發現為在中國已經有知名度的朝鮮物品，並且在許多地方清朝人更親自詢問朝鮮使臣帶過來的物品是否可送給他。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朝鮮帶過去的物品在朝鮮人和清人的交流之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連接了不同國家人民的人際關係。

一位真景山水畫真宰金允謙），《美術春秋》，10（首爾，1981.12），頁 3-7；李泰浩，〈謙齋鄭叡의家系와生涯—그의家庭과行跡에대한再檢討〉（謙齋鄭叡家系與生涯—對於他的家庭和行跡再檢討），《梨花史學研究》第13、14輯（首爾，1983），頁 83-93。

¹⁹⁴ 成均館大學博物館編，《槿墨》，下（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博物館，1981），頁 823。見高蓮姬，〈鄭叡의真景山水畫와明清代山水版畫〉，頁146。

¹⁹⁵ 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Distributed to the trade by Macmillan, 2008), p. 82.

¹⁹⁶ 閻雲翔，李放春、劉瑜譯，《禮物的移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頁43。

金昌業私人所帶過去的物品中，扇子的數量是至少 50 多把以上，在整個物品項目裡看來為數最多，在他於中國的期間著實發揮了不少作用：被頻繁用於朝鮮人在遇到問題、贈答禮物、感謝許可或幫忙、以及做買賣時送給清朝人。固定的燕行路程中前人已如此，甚至外國來的喇嘛僧也會索求扇子。另外，金昌業所帶攜帶物品中的清心丸、是在想要表達多感謝、持續接受幫忙或希望得到更多招待、協助的時候，才拿出來使用的。偶爾也有碰上對方主動跟金昌業請求清心丸的時候，如在往返途中遇到的人、在北京認識的人、或在大光明殿遇見的官員等，在這種情形下金昌業也會拿給對方。清心丸是小小的一種藥品，隨身攜帶方便，而且是無關身分，許多清朝人都知道、並且想要的物品。不過包含金昌業的燕行紀錄，可發現在十八世紀中後期許多燕行紀錄和派遣到日本的朝鮮通信使的紀錄中，清心丸的數量比扇子少，由此可見僅在扇子之外，還需要表示更多感謝的時候才會拿來使用。所以參閱過《老稼齋燕行日記》的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燕行之朝鮮燕行使節，皆持續帶扇子前往燕行，在路程中用做兩國之間友好的物品。

尤其是文人畫家金昌業，不但私下帶了前人紀錄中可發現的這些物品，還帶了朝鮮畫家的作品贈送給清人，呈現出當時兩國人的交流中，物品的交流在交流學習與互動方面，具有重要的存在意義。另外也可以看到兩國文人之間，透過交換或交流的過程中，有著品味鑑賞詩畫的文化交流活動。這些物品交流中，透過金昌業在北京所看見或接收的之物品的鑑賞、書畫的傳播、山水遊記活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如何形成金昌業對中國的觀感，接下來進行討論。

第三章 人物互動與其中國觀感

依據在第二章討論物品交流的內容中，這些兩國人之間物品的流動，形成了一種人際關係，無論是在朝鮮使節和清朝人物，或使節和譯官之間，都可見物品交換的情形，這兩者關係之間有其必要性。朝鮮人透過這些物品可以跟清朝人交流、有時候還能得到益處、解決問題。相對的，清朝人也在接受這些朝鮮物品後，會表現出些回應，如招待、送中國書籍等。甚至我們可見到除了旅館雜費之外還可以利用在買書、畫帖、文具等地方，極其方便。

在第三章要關注的是，兩國人以物品為主要手段而間接引起的交流、物品互相流通的現象，這當中兩國交流的橋樑為何及譯官在其中的影響力、和金昌業對中國人的看法；並且觀察金昌業在中國所帶回的物品中，有哪些物品或書籍，和它們如何影響了朝鮮文人社群等。尤其是第三節指出的，金昌業從北京回朝鮮的路程中安排了在中國北方遊覽山水，一方面可見當時朝鮮文人熱衷於山水遊覽的盛況，另一方面可觀察金昌業對中國景物之描述和看法。透過討論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更接近探討金昌業對中國的觀感為何的問題。

第一節 人物交流

金昌業在他的燕行紀錄最後有提到燕行過程中得到的詩文總共為四百零二篇。¹⁹⁷這些詩文的交換在兩國文人之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反映出金昌業在中國曾經與無數清朝的知識份子交流。來往共 146 天的路程中，從 12 月 27 日抵達北京，至翌年 2 月 15 日離開北京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金昌業與清人持續交流，此過程中他仔細觀察中國人，漸漸累積出他對中國人的看法。透過金昌業與清朝人交流的過程，可觀察物品在兩國文人交流

¹⁹⁷ 往返五朔共一百四十六日，去來路程共六千二十八里。在燕京出入及在道迂行者，又六百七十五里，得詩四百二篇。《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30日。

中，所扮演的作用，幫助讓金昌業與清人交流之一種手段。在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中，仍然發現金昌業學習前者燕行使節所帶過的物品。因為如此，有些中國人主動詢問金昌業是否能給予扇子、紙筆墨、清心丸等朝鮮物品，更進一步買賣時可使用這些物品為代價。根據 1765 年燕行的洪大容在《湛軒燕記》中，描述關於金昌業在燕行路程中與清人物交流的狀況：

金稼齋，清陰之孫也。當壬辰之行也。去古未遠，瀋館縲絏之辱，餘澤未斬，而乃與朴得仁輩來往贈遺而不辭，趙華、李元英、馬維屏、程洪之徒相與交好無間也。¹⁹⁸

金昌業在中國與文人往來的經驗參考自前人的紀錄，而且從上文可見他的紀錄也刺激了十八世紀以後的朝鮮使節，如洪大容等人在中國的交流模式。因此，我們可以從金昌業與清人的交流中，更進一步觀察金昌業在中國接觸的人有哪些，或許從他們的對談中可看出金昌業對中國的態度和關心的對象為何等。

(一) 譯官

朝鮮人到中國之時，儘管兩國語言不同而必須與譯官（通事）同行，或得拿出筆和紙用寫字的方式溝通，不過如前述的，由於可參閱前人的燕行經驗、路程固定，讓朝鮮人可以預期與清人的交流情況。朝鮮人的燕行，原來是兩國國家之間帶有政治意義的外交活動，漸漸因為使節私帶物品交流的行為，而促成了更多民間的商業活動。這些活動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能溝通兩邊語言的譯官。一方面朝鮮使節為了讓譯官願意提供更多的合作及協助，需要帶更多的朝鮮物品；另一方面譯官與清朝的商人有合作關係，會帶書販來朝鮮使節住宿的旅館，和朝鮮人進行商業活動。¹⁹⁹在此討論燕行過程中，可知金昌業是如何必須透過譯官才能與中國人、中國文物接觸，以及金昌業對譯官有何負面的觀感。

根據《老稼齋燕行日記》可發現十八世紀初與燕行使節同行的譯官，具有不同名稱：如「譯官」、「通官」、「通事」等。朝鮮時代所謂「譯官」是屬於朝鮮司譯院的官員。司譯院為朝鮮太祖二年（1393 年，明洪武二十六年）設立，入屬司譯院可成為預差生徒，之後可稱為前銜。經過生徒和前銜的譯官，通過司譯院的三個階段的考試，終於成為通事。

¹⁹⁸ 《湛軒燕記》，〈外集〉卷七，〈衙門諸官〉，頁248_250a。

¹⁹⁹ 譯輩以為廟有守者，須用賂周旋，可得入見云，而及至門無攔阻者，有一胡自外追至，引余遍觀內外殿宇，其意款曲。譯輩之言不可信，大抵類此。《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7日。

以考試類別不同，取得隨行往燕行或往日本通信使行的資格。透過肅宗年間朝鮮譯官金指南及其子慶門，一同編撰的《通文館志》可知，朝鮮後期成爲通事的三個考試階段：院試、取才、考講。第一個官門爲「院試」，通過後才可進一步考「祿職取才」；祿人才可分爲祿取才、赴京取才、衛職取才，爲了成爲赴京（燕京）通事，得通過赴京取才；考講也可分爲書徒考講和二六考講兩種。通過司譯院這些考試的人才，依照考試的成績分等級，之後往中國入京時，便以該等級的順序成爲通事、押物、打角夫。²⁰⁰

由於朝鮮對清朝的燕行使團規模漸漸變大，²⁰¹朝鮮初期在司譯院所培養之通事，到了十八世紀初的燕行使團已經細分，各稱爲「漢學上通事」、「清學上通事」、「教誨質問通事」、「次上通事」、「押物通事」等。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金昌業最常用來稱呼朝鮮通事的就是「譯官」。

譯官無通漢語者，其中一二人，號爲稍勝，而觀其與彼人酬酌者，爲十言無二三言分明。此所言則彼不解聽，彼所言則此亦不解聽，見之可悶。兩國之情，只憑通官譯官通之，而譯官既如此，通官亦不能爲我國言，凡言語雖備說，尚難使人解聽。今以數少之語，擇而爲之，其於曲折煩多之事，彼此豈有通情之理？是以，若有一事則不能析理爭之，無論大小，惟務行賂，寧有如許寒心者乎。²⁰²

可知金昌業所描述的「譯官」爲能講中國話的朝鮮當地官員。相較而言，可推測「通官」爲懂朝鮮語言的中國官員，也有可能是居住在中國的朝鮮人官員。尤其，金昌業對通官的家庭背景的描述：「蓋通官輩，皆東人之子，故與被虜人子孫。無不親厚往來，自相婚娶。人情之不忘本，可見。」²⁰³；「亦在此家，要見我國人能爲漢語者，員譯數人入去，酬酢而來。文二先父名金，本以我國人，被擄而來爲通官。」²⁰⁴可知大部分的通官爲移居中國的朝鮮人，他們因此歷史和語言背景而成爲翻譯官員。譯官和通官都是在燕行過程中，跟使臣保持著密切關係的重要人物。其中，「首譯」是燕行使團中最有影響力的人。透過金昌業的描述：

任莫重於首譯，人不可不擇。凡館中買賣折價高下與行中聚斂多少、驛奴

²⁰⁰ 金暎綠，〈朝鮮初期通事の活動과 위상變化〉(朝鮮初期通事の活動其地位變化)，《韓國學報》，101（首爾，2000.12），頁53-91。

²⁰¹ 權乃鉉，〈十七世紀後期~十八世紀前期平安道對清使行지원〉(從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前期平安道對清使行支援)，《朝鮮時代史學報》，25（首爾，2003），頁150-151。

²⁰²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7日。

²⁰³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26日。

²⁰⁴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12日。

黜陟，皆在首譯之手。自我國商賈驛卒，至彼人中館夫輩，待首譯若待其主。……以此論之，首譯可謂執兩國之權。使臣有問行事者，首譯未答之前，他人不得開口。聽其所言，從而為辭，以此首譯所欲諱者，使臣無從得聞，良可寒心。²⁰⁵

可知首譯在燕行過程中的影響力，即使是使臣也無法控制他們，他們的權力甚至擴及到中國地區的商人。

根據《老稼齋燕行日記》可見十八世紀初已經出現譯官或通事的腐敗。前面提及，朝鮮時期的譯官為了成為燕行使團中的通事，經過嚴謹的考試，才能得到機會燕行。不過，金昌業所看到的包含兩國的通事，由於溝通不良，不僅沒有處理案件的能力，甚至彼此誤解而產生問題等。

凡文書盡以清書翻譯，然後奏于皇帝，謝恩方物文書有頃，至今不得翻譯。且坐譯官不善辭，一日可決之事，二日不決，行期以此漸退，殊可慨鬱矣。譯官輩雖則逐年入來，而渠之商販外無所知。今番首譯全不解漢語，又昧文字，觸事昏憤。在義州除置太子方物而來，到此見之，則采花席二十五張、苧布二十疋，數外加來。即此一事，餘可知也。²⁰⁶

並且，金昌業在燕行紀錄中許多地方描述，也可推測譯官由於跟北方商人關係深厚，更希望能與使節有深入且全面的接觸，以便促成雙方的生意往來，從中獲取利益。例如，金昌業針對北京商人鄭世泰的描述，可推測北京商人鄭世泰的富有來自燕行的商業利益。

鄭世泰，即北京買頭，我國所買錦緞，皆出於鄭，其價銀多出十萬兩外。自其父時，以此起家，至世泰益富，而婚娶多仕宦家，以此頗有權勢。錦緞外凡干難得之貨，言于鄭，則無不得者。其家在玉河橋大路南邊，而為朝鮮買賣，作廟堂于玉河館門傍，晝夜焚香，其香若盤繩，燃其一端，則燒至一晝夜云。²⁰⁷

譯官透過燕行的機會進行商業活動，不但幫忙使節和中國商人從事書籍或花草等物品買賣，而且透過「玉河館開市」，進行商業活動。朝鮮譯官在玉河館開市時，主要以朝鮮物品為主，購買中國物品，如扇子、紙筆墨等，之後回到朝鮮再出售。透過金昌業在癸巳年

²⁰⁵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7日。

²⁰⁶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20日。

²⁰⁷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7日。

2月14日，即離開北京當天狀況的描述：「譯官輩與鄭世泰爭價猶未決，首譯以下，請退行期一日。伯氏不許，副使亦峻塞，落莫而退。」可知從癸巳年2月10日到該日還沒有解決自己私人買賣的問題，而對使節請求是否能再留一天。並且金昌業又描述，一般朝鮮士大夫請譯官買中國的物品托回的情形，另外也可見在中國小凌河地區（在今日遼寧省）特別買「鹿茸」和「麝香」等藥材的狀況。²⁰⁸

（二）清人

金昌業往來中國途中接觸的人，不但與許多識字的士人、和尚、官員對話，且更可發現金昌業透過譯官願意更多階層的中國人見面交流。金昌業想與中國的交流盼望，可見到在《老稼齋燕行日記》許多地方，如金昌業透過譯官的介紹，有機會與李元英（號誦芬齋）、趙華（文官，當時34歲）、程洪（當時23歲）和馬維屏等交流。

首先，金昌業在北京認識不少清朝的文人，在彼此互動交談中可以看到兩國文人對物品、花草、詩花畫方面的講究。其中特別是李元英，他是主動向金昌業自我介紹的《一統志》纂修官，為金昌業停留在北京時，長期交流的清朝文人之一。他們初次見面時李元英開頭便問金昌業是否要交換紙筆墨：

先問余姓名。兩人皆前，揭見余內外衣服，皆木綿，問貴國布好，有可賣者否。余答無持來者。又問：「以我筆墨紙欲換貴國筆墨紙，何如？」答：「筆墨不必換，當覓送。」年聞之，有喜色。又問：「貴職何衙門？」答：「我無官閒人。」余問姓名，寫李字。問：「何衙門？」言：「《一統志》纂修官。」又問余解作詩否，答粗解做句。少年聞之，即入內，出黃紅兩色牋。置余前。²⁰⁹

還請求金昌業寫詩給他，接著聊起更多話題，討論了花草、書籍、藝術品等。之後金昌業跟李元英用書信交流時，送了他壯紙等物品，金昌業並且向他借讀了《一統志》、《佩文齋廣群芳譜》等書籍。²¹⁰金昌業因和李元英交好，把獻給清朝宮廷貢物品裡其中一樣餘絀私自留

²⁰⁸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八，癸巳年2月28日。

²⁰⁹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0日。

²¹⁰ 又作書李元英，遣元建，而送壯紙二丈、南草二封、粳米、糯米各一升。曾往其家時，見我食物所盛柳器而悅之，故送方結者一部。要送羣芳譜一匣，則答以此書即內府所在，而我為有考事取來，不可久留，還送前去書。《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2日。

下，隔天送給李元英，李元英則贈送徽州墨給金昌業回禮。²¹¹與李元英交流時，金昌業有注意到李元英的家族，描述說：「又一少年自內出坐余傍，年纔二十許。先迎於炕者，元英之兄後來者，皆其弟也。三人外立炕下者亦多，而識字者有之。少年之兄，面貌俊秀，而元英以書問答也。渠則與他人博，其狀似不解字。」同一天，金昌業往忠節祠時，也描述在北京問路時發現，口語不通的情況中，難遇到識字的人的狀況。²¹²

透過金昌業與中國文人之間的詩文交換，金昌業得到對清人的印象。例如，留在北京金昌業與滿人趙華交流，是趙華的邀請而金昌業拜訪他家。他們初次見面時趙華已知針對金昌業的詩文和書法著名而請求一首，金昌業寫給他之後也收到了以半草書七言四韻晉體的趙華詩文：

趙華答曰：昨見華翰，方欲作答，蒙此枉屈，喜出望外，其書見在桌上。書曰：竊慕大雅，思欲望見顏色，未遂鄙懷。昨承翰教，方知使君歸鞭已促，兼有新憂，僕亦不敢再強也。執事工於詩文書法，如果見愛乞求椽筆，以當紆縞。伏承尊命，拙字呈醜。不過拋磚引玉之意。萬勿見哂，竝祈原諒。我見書答曰：僕之筆，已呈拙矣。無可論者，至於詩文，尤為空疏，無可仰答大人之辱問。甚媿甚媿。趙華之筆，以半草，書七言四韻，晉體也。趙華又問曰：願見足下所作詩。答曰：我不能作詩，但能記友人所作詩，無已則當書示之。遂書示前所作律絕數首。²¹³

再著，金昌業從趙華文章中，描述：「趙華又出所作文草，示之，代岳飛遺秦檜請勿返師書也。不特文精耳，辭甚激昂，中有逆虜等文字。此處諱胡虜字，書冊中皆去之，而此文則逆虜二字之外，此等文字，多不擇，可怪。」金昌業向趙華說，要將他的作文帶回朝鮮給朝鮮文人看，並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描述關於趙華的容貌：「趙華貌黑瘦而麻，一目眇，以外貌則不知其為文人。」²¹⁴金昌業對中國人而言，也是來自異國令人好奇的對象。金昌業到趙華家時，趙家人都出來看難得一見的朝鮮衣服和頭髮樣式等。從金昌業對趙華家之敘述，可見金昌業有觀察到趙華的家人、桌子上的瓷器及餅乾等中國特有的食物等。²¹⁵再隔一天金昌業回往朝鮮的前一天趙華又送些自筆書法

²¹¹ 買方物餘紬一疋，使元建送李元英。元英以徽州墨一匣為答。《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2日。

²¹² 用鞭畫地，作忠節祠三字問之，無解字者，不能答。《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0日。

²¹³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巳年2月13日。

²¹⁴ 問趙華曰。滿人耶。漢人耶。對曰。滿州人也。華請改正其文。余曰：「不敢，願歸示東國文人。」遂納於袖中。《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巳年2月13日。

²¹⁵ 出果實六七器，列置桌上。其中有糖餅數器，皆前所見也。五婦人來立炕下，老者華之

作品，金昌業也回禮給趙華紙、僧頭扇、南草以及在北京三忠祠所作五古及律絕數首作。²¹⁶實際上，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許多地方描述滿人指稱「胡人」，雖然有疑問金昌業描述的滿人是否可靠，²¹⁷不過值得注目金昌業在中國對漢人或滿人都很支持要接觸交流的態度。

另外，也是在北京交流的馬維屏交流中，也是常常以詩文、藝術作品來品評、鑑賞。尤其是金昌業爲了與馬維屏見面，寫五絕一首於僧頭扇上，馬維屏來拜訪金昌業以筆談作交流。²¹⁸上前及的李元英也是常常與金昌業請求交換詩文品評。²¹⁹透過這些與頻繁交流的清人和金昌業互動中，常常可見交換詩文以表達情緒的情形。另外，也可見金昌業相當重視與中國人交流的態度。

這些情形在朝鮮的文人交流中並不意外。也許這種行爲在兩國識字的人之間，有其背後所具有的某種社交性的作用及象徵意義。²²⁰如金昌業到沙河驛三皇廟附近的旅館過夜：

主漢出紙要書，余遂作一絕書贈，頗有喜色。蓋主人以賣鹽爲業，不解文字，問答皆倩人書之。……主人出茶果一卓。柑橘、橙丁、閩薑、榛子、西瓜仁、山查正果、猪肉、鷄卵凡十餘碟，極其精美。又出酒一壺，其清如水，而色微碧，香烈味淡。余連飲四盃，亦不甚醉，然杯亦小，一盃僅當我國半杯也。令乾糧給紙束扇刀等物，答其意，又作一絕，書與主人。²²¹

旅館的主人雖然不識字，但還是請求金昌業做詩給她。看到詩的主人不但喜形於色，而且拿

母，少者皆其妾也。老人揭余衣，使炕下婦人見之。又有婦人立戶外，與元建問答，脫元建所着氈笠，觀其髻，趙華妻與妹，在其中云。北邊大客堂階上立衆女，元建曰：「想其宗族盡會也。」華求我國油果，余以二立與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巳年2月13日。

²¹⁶ 晚後趙華送自筆三丈、繡囊一副。余以紙一卷、僧頭扇一、南草一封回禮。來人，與火鐵一箇。書三忠祠所作五古及律絕數首，與王四送于趙華。《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巳年2月14日。

²¹⁷ 劉廣銘，〈《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滿族人形象——兼與其中的漢族人形象比較〉，《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1：2（吉林，2008.4），頁49。

²¹⁸ 書五絕一首於僧頭扇，使元建送馬維屏。維屏卽至坐東邊月廊見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8日。

²¹⁹ 元英又要見余比日所作。余書示咏海棠、梅花、紙菊七言絕句三首、咏琉璃瓶魚五言絕句一首。元英曰。尊作佩服之極，直與唐人並立。余曰。過獎。元英覽詩，時到意會處，以指逐字作圈狀，覽已藏去。《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22日。

²²⁰ 王鴻泰先生認爲作詩在明代科考體制下，已成爲一種別具意義會符號，對這種符號的操作，構成特別的文化活動。詩作爲士人的自我表現憑藉由來已久，能文之士藉此已證實自我，並獲得社會肯認、尊崇，此種藉文取名，因詩得意，至少在唐代，就已經達於極至。見王鴻泰，〈迷路的詩一名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臺北，2005.12），頁32-38、46。

²²¹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1日。

出美食佳餚招待。由此反應可見，文人之間交流溝通的方式，對不同身分階層人而言也有算得上是昂貴的物品的可能。如金昌業生日那天正是跟當年燕行的正使長兄金昌集以詩文來慶祝，²²²

從北京回朝鮮的路上，金昌業在鳳凰店附近角山寺停留過夜一天時，認識了寺廟中的一位讀書人。金昌業從平明出發至鳳凰店，停留在山海關時，至角山寺等地遊覽。雖然當時天氣不適合旅遊，但還是爲了送禮物給山寺的和尚而特地帶了一把扇子去。金昌業在角山寺描述寺廟的美麗外觀，以及認識了自稱爲童子的程洪。兩人以筆談聊了古試、詩法等，金昌業並寫詩給他。金昌業在角山寺和秀才程洪筆談，他描述說：「少年又問我國科舉之法，余畧答之。是夜問答說話頗多，而所書紙，皆留少年處，不能書記。少年眉目清俊，舉止閑雅，言語不苟，文字亦精，前後所見秀才，無如此人也。」²²³最後金昌業以白紙兩張、筆墨各一個來付住宿的費用，再另外送給程洪紙筆墨各一。²²⁴雙方更互相留著對方的書法，約定透過以後的燕行使節來通書信。後來金昌業回到朝鮮三年後，還透過往燕京的使節，與程洪互相來信，維持兩國人物的交流。²²⁵

其中，金昌業與滿人提督之子和皇帝皇子時，都很詳細記在了容貌、衣服等的外表，並描述了：「儀表俊秀，且有貴重之狀。」等金昌業的印象。²²⁶此外，金昌業引用上前所述的該年御醫金德三，到皇宮拜見皇子的描述：「皇子所着衣服衾枕甚儉，不如常胡之富者，如器用之類，亦無一奇物。」²²⁷

使節團到北京約 20 日後，「方物移準」文書中針對「歲幣」項目的記載出現了有差距的問題，在處理過程中，金昌業描述了他在中國廣泛地與各階層的人接觸，而使逐漸改變了自己對中國人的想法：

嘗聞此國人多慾，近來無紀綱，百事皆以賄成。今來見之，亦不如此矣。

²²² 今日，卽余之生日。作一律，伯氏和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2日。

²²³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2月23日。

²²⁴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八，癸巳年2月23日、24日。

²²⁵ 朴智鮮，〈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頁158。

²²⁶ 柳鳳山携一胡兒入來，謂是提督之子。儀表俊秀，且有貴重之狀。問：其年？答：十四。問：其姓名？只書傳字名，終不言。其衣服極華麗，上衣內繫青絲廣組，其左右前後，皆有鏤金帶眼，以前眼鎖之，制作奇巧。所佩刀，卽我國青黍皮銀粧刀，禮單物也。與柏子餅一片，食其半而止。《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4日：貴同言皇帝孫兒來在通官所。余令驛卒引來，非皇帝孫，乃七寸姪。其父諸王，而通官文奉先，卽其奴，故此兒養于奉先家云。其年九，而人事穎悟，手引金世泓帶，索扇子、筆墨。金譯携至伯氏牕外與僧頭扇、筆墨各一送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29日。

²²⁷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6日。

此國人心明量大，非事則雖極有口辯，以飾其辭，亦無信聽之理，是事則初雖誤認，以理爭之，旋即解惑。雖以今番事觀之，初則只見文書誤認，而聞張遠翼言後，即為解惑，無少持難。此等事，亦非我國人所及處。²²⁸

除此之外，金昌業停留在北京時，就其瀏覽城內外，以及所有親眼所見、親耳所聽到的經驗，也讓他改變了對康熙皇帝的印象。金昌業以前的燕行使節的關於康熙皇帝的紀錄中，描繪成一個舉止輕浮，行為放縱，進退失据的荒誕等負面的形象，²²⁹不過金昌業親自見聞的經驗，給了金昌業跟以前不同的看法。金昌業在2月7日的日記中描述了對康熙皇帝的印象：

舊聞皇帝於暢春苑，作離宮十五處，貯以北京及十四省美女，宮室制度及衣服飲食器皿，皆從其地風俗，而皇帝沈湎其中。今來見之，與所聞大異。暢春苑南北二百餘步，東西百餘步，其內豈容寘十五處離宮乎？圍其三面，而終未見屋薨，其不高大，可知。且觀其門與牆，制度朴野，無異村莊。誠如事遊行奢侈，則棄太液五龍之倚麗，而居乎此乎？竊意此處，與西山玉泉相近，山水之景，田野之趣兼焉，似愛此而來耳，以此觀之，其人性稟可繁也。

第其為人，明秀有餘，渾厚不足，才多。故好自用，量狹，故喜自矜。雖以今番事觀之，頒書於我國，以示序父與題目，所以矜文翰也。召我國人試射，又親射而鳴鼓，所以伐武藝也。似此舉措，近乎誇張，又聞通官之言，惡聞諫諍，峭直之臣，不容於朝，此豈君天下之量也？其稱我后之享國者，與誇己力者，先詡他人同也。其不受尊號者，欲兼謙遜之名而取之也。儉德雖可尚，過儉而近於吝，官府壞弊，而使其官自為修葺，試射遠人，而無所賚賜，此亦不足貴矣。見此數事則其人長短得失，可知也。²³⁰

以上所述，可見金昌業留在北京時和中國人交流的過程。他長期交流的階層對象大部

²²⁸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7日。

²²⁹ 劉廣銘，〈《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康熙形象——兼與同時期歐洲語境中的康熙形象比較〉，《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9：2（洛陽，2006.3），頁120。

²³⁰ 初往見時，北牆內有竹樹。又此《羣芳譜》，有皇帝詠暢春苑碧牡丹詩，即此可知不無花草之植。然引玉泉水入苑中，而左右岸不用石甃，雖有池臺園林，而終儉素耳。且暢春苑不設官府，百官入於僧廬，又使日日往來於二十五里之地，或以此為怪，而亦不無意思。蓋胡人以馬上為家，能耐飢寒，其長技也。入中國七十年，居處飲食漸奢侈，失其本色，以故使之朝夕往來，以習其驅馳，不設其所居，以警其安逸，其意可謂深遠。其避暑于熱河，觀魚于霸州者，亦非徒為巡遊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7日。

分爲識字的士人，他們充分利用詩文、藝術品、花草等物品，在口語不同的情況下，做爲兩國士人交流的媒介。透過金昌業與清人交流的過程，可知金昌業詳細觀察清人家飾、家族，及詩或文章的風格，來判斷對方的個性或身分背景。至於譯官是這些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利用溝通語言和每年可以到中國的機會，將朝鮮使節和中國的商人連接做商業活動。因爲他們利用自己的身份，透過北方的後市、北京的開市可以買賣東西，並朝鮮和中國的東西更可得到利益。如北京譯官的家中，具有西洋製造的物品等之描述，²³¹讓我們推測當時該地區的商業活動非常頻繁，又有相當大的規模。這些譯官的問題和腐敗，可發現一直到十八世紀中後期，如洪大容《湛軒燕記》描述：「往往信其誑誘，仰其指示，終不免其管束也。是以凡爲遊觀入燕者，信諸譯則不可以盡其觀。呵叱太偏，則招其怨而有行賂之費。」²³²儘管如此，譯官擁有相當豐富經驗，了解朝鮮使節所需要的物品有哪些，相對一生可能只有一次到北京燕行的朝鮮使節，便需要倚靠譯官的交易經驗，購買中國的物品、與中國人見面交流。尤其是，我們可以發現與金昌業交流的清人的階層幾乎都不高，也許是因爲金昌業都透過譯官的介紹的緣故，可能仍然有限金昌業可以接觸的清人階層。總之，金昌業的家庭背景中，祖父金尙憲在當地當人質的事情，應該對金昌業已造成對清朝負面的看法，不過金昌業對中國人仍保有開放的態度，讓他能夠和更多階層的中國人接觸，如前所提及的，這更改變了他對中國人的看法，即清人的態度都是朝鮮人需要學習的。

第二節 文物交流

朝鮮文人從高麗時代後期開始文人之間以詩、繪畫、書法，常常使用於互相的理念和感興的交換、心意表出、修養心性。這些文人之間的互動，可能由於北宋文人的畫理論影

²³¹ 得仁呼其家丁出一櫃，高二尺許，廣半之。前爲兩扇門，開之，中有沈香假山，其人物并用密羅爲之，樓閣樹木花葉，皆銀與珊瑚青碧也。山之前面有小竅，用鑊匙納而拗之，中作碌碌聲，而人物禽獸皆自動。山上有一寺，僧在樓中撞鍾，一邊有虹橋，騎驢者從橋上過。上有小菴，一僧開門俯視。其扇乍開乍闔。山下有城門，舟從城外到門，門輒開，舟入還閉。山底則爲水草及波浪，而中有躍鯉又有蛤方開口，鶴俯而啄之。其機皆左旋，周而復始，良久乃止。止則又拗之。得仁謂是西洋人所造，而得之於南方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26日。

²³² 《湛軒燕記》，〈衙門諸官〉，頁248_250a。

響下形成，一直到朝鮮時期被視為文人交流的重要部分。²³³或許因為如此，許多中國商人和朝鮮使節買賣書，文人之間雙方拿給各種繪畫、藝術品請品味鑑賞。上前討論關於物品交流的作用，其實也帶動了兩國間書籍、花草和藝術品等的流動。以下討論的部分是金昌業所關注的中國物品中，繪畫、畫帖和書籍有關，針對這些中國的物品給朝鮮使節留下的印象、以及其態度等的問題。

(一) 繪畫作品

透過各種燕行使節的記錄，可知朝鮮使節在中國找當地畫工畫肖像的狀況。例如，元代著名的畫家陳鑑如畫的《李齊賢肖像》（藏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就是高麗文人李齊賢（1287-1367，字仲思，號益齋、櫟翁、實齋）1319年留下的肖像畫。譯官在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朝鮮使節靠贈予譯官物品，來使譯官進一步介紹或帶來中國物品給這些朝鮮使節，藉此得以獲得畫肖像、得到當地畫作。金昌業也同樣透過譯官在北京特別找畫工，即為了替長兄金昌集畫肖像畫。第一次金昌業透過首譯找到畫工羅延（當時四十歲，號梅林）：

為寫伯氏真求畫工，首譯領一人來。姓名羅延，號稱梅林，年四十。為人樂易，入到炕下叩頭，命陞炕，又叩頭後陞坐。自言家在江南省池州府，問以何事到京。曰：為寫闕內壁畫，見徵而來云。請伯氏具朝服坐椅，渠亦坐椅相對，兩間置一卓。先出紙草，仍上綃設色，畫品姑未知其如何，而用筆熟而有法。²³⁴

說明了金昌業注意到羅延用筆的方法及程度，不過待數日後肖像畫完成時，金昌業卻認為就正面畫而言、整個畫風並不够生動，因此，金昌業請羅延再一次以側面的方式來畫。²³⁵這段時間金昌業與畫家羅延的互動中，金昌業描述：「贈我一書帖，即清朝節婦曹孺人墓誌，而翰林學士胡希恩撰，兵部侍郎宋俊業篆，翰林院待詔曹曰瑛書。……羅延言：曹曰瑛，即己之親黨，故得此書以來。書晉體，篆亦善，其意，似欲傳孺人行蹟於外國，而亦誇其文與筆也。」²³⁶金昌業對此畫帖有著高評價，他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詳細介紹了它的故事，雖然此本畫帖在韓國沒有流傳下來，

²³³ 洪善杓，〈朝鮮初期繪畫觀〉，《第三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城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5），頁597-614。

²³⁴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6日。

²³⁵ 食後，羅延入來畫像，彩色斷手，全不近似。此本乃正面，故令更寫視面，則請持歸其家，設彩而來。然觀其畫法太妍，少生動底意，似非高手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7日。

²³⁶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7日。

但讀過金昌業燕行紀錄的人得以多少了解它的內容。從這些紀錄我們可推測，使節們在北京帶回了不少畫帖，在朝鮮社會中流通著。再著，又找了另一畫師，稱為王勛，他曾經畫過前朝鮮使節閔鎮遠（1664~1736，字聖猷，號丹巖、洗心）的肖像畫。²³⁷雖然，目前該畫沒有留傳下來，無法得知其作品的樣貌和特色，但對曾經畫過宋時烈肖像的金昌業而言，這兩位畫工所畫的肖像畫並不令人滿意，認為技術應該要更好才行。由此可見，在中國當地找畫工畫肖像是朝鮮使節相當頻繁的活動之一（圖七）。

除此之外，做為文人畫家的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多會詳細描述針對中國畫作的觀感。上前提及，停留在北京時認識的清人李元英，是與金昌業常常筆談交流的對象。他們交流過程中，常常交換與欣賞詩畫：

次李元英律詩，使元建傳之。元英答書，有橘餅及青梅糖煎者各少許，蘭亭一本亦隨至，而非真本也。崔壽星持二畫來，一宋徽宗《白鷹圖》，圖上有御寶，寶右有察攸識，畫法佳，而摹本也。一《美人圖》，一女人坐凳子，引領看雙蝶之飛，而眉目如生。此非近工所為，紙亦有古色矣。《鷹圖》使師許淑模之，《美人圖》張于壁數日，歸之。²³⁸



圖七 金昌業筆《宋時烈肖像》

上文中的譯官帶來了兩幅畫，敘述中可見金昌業能從各個細節來判斷出畫法，深具藝術品的鑑賞能力；我們也可以看見金昌業對這些作品能鑑定出真偽。更重要的是，還描述了讓當年使團中的畫員許淑，摹寫兩幅畫中宋徽宗《白鷹圖》的情形。透過燕行的機會，讓兩國的文人能以贈答或交換的方式來接受對方的書籍或畫作，甚至在不便購買時，請畫員摹寫的情形。

另外，金昌業能有機會拜訪北京天主堂，也是由於譯官申之淳的關係。朝鮮燕行使節於十七世紀後期使得前往五龍亭和天主堂，透過安鼎福《順菴集》可見其相關紀錄，²³⁹在 1695 年冬至使行中的副使洪禹鼎（1660-？）與譯官申之淳

²³⁷ 畫師王勛，曾畫閔參判像者也。是日，首譯率來，使畫伯氏真，日晚未畢而去。畫法視羅延似勝，而年已六十四，眼昏手且戰，筆畫羸。價要天銀十六兩，而起草時，先索一兩矣。《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 1 月 21 日。

²³⁸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 1 月 23 日。

²³⁹ 安鼎福，《順菴集》卷十七，〈雜著〉，〈天主考〉。

(1666-?) 爲首次參觀的朝鮮使節團，進入了從前禁止的五龍亭和天主堂。²⁴⁰申之淳也是在 1712 年金昌業燕行時一同前往的譯官，所以他也帶了金昌業參訪了北京天主堂(南堂)。金昌業見到天主堂牆壁上的雕像，覺得表現得栩栩如生。²⁴¹由此可推測，金昌業對中國肖像畫、畫帖等繪畫方面相當有興趣，積極地觀察這類文物。另外也可推測透過燕行使節，有更多的兩國物品，包含書籍和繪畫，得以交流。

(二) 書籍

在第一章討論，關於中國禁止買賣的物品包括書籍、地圖、畫帖，以及中國的物產，不過朝鮮使節到達的地區，都可見由賣書的商人或地方秀才，到使節住宿之處販賣書籍、書畫、畫帖類。使節在北京停留在玉河館時，包含金昌業及朝鮮使節都遇到從南方來的書吏「序班」：

蓋北京解文字者稀少，以南方之人爲序班，而定送玉河館者凡六人，此皆南方人也。顏貌本不龐厚，雖有料，亦涼薄，萬里羈旅，生理艱難，貧窘之色。見於面目使行時書冊賣買，此屬擔當，以此有若干見利之事。²⁴²

根據上文，序班從南方來到北京過生活，爲了賺些錢，朝鮮使節在北京的時間，常常到玉河館賣書。金昌業又描述了，他們透過譯官的許可，早晚不斷地可以進來玉河館賣書的狀況：

自昨朝書冊連入，而每書各送頭一卷。看品不買之前，不入全帙，入後不得不買，是以所欲見者，不得隨意得覽，可鬱。在前甲軍見書則禁，故卷卷潛懷而來，全帙若來，夜從牆上入送，而今番則書冊肆然持來，可怪云。夕時，譯官崔台相入十餘種書，其中有《本草綱目》餘皆還。²⁴³

透過上文，可發現金昌業由讀過的前燕行紀錄中已得到關於書販的印象，他們都把書帶進來給朝鮮使節看。不過該年在玉河館的朝鮮使臣行動比前期寬鬆，譯官多把賣書的人帶進來對使節做買賣活動。朝鮮使節在玉河館或來往燕行的路程中接觸的中國物品，不只是書

²⁴⁰ 鄭恩主，〈燕行使節對西洋畫認識及와寫真術之의傳入：北京天主堂을中心으로〉(燕行使節對西洋畫認識及寫真術之傳入：從北京天主堂爲中心)，《明清史研究》，30(首爾，2008.10)，頁157-199。

²⁴¹ 至門內向東望，有一鐵鍾，高出人家上，此天主臺也。曾聞申之淳言，隨洪禹鼎見之。外面扁書天主臺三字，門內有臺，其高三四丈高。南面開一虹門，入其中，北壁掛一像，其人散髮袒臂，持火珠，面如生。其上有天地真主四字及敬天二字，即皇帝筆。左右壁各掛一像，其貌皆似北壁者。《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六，癸巳年 2 月 9 日。

²⁴²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 1 月 3 日。

²⁴³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 1 月 4 日。

籍類，還不少機會看到譯官帶來「蘭」或「水仙花」等，金昌業也對這些花草有興趣，也可見金昌業曾經買過中國花草的情形：「鄭世泰入送水仙花，一盆種十餘莖，花盛開。花大如單瓣桃花，色白有雅韻。此花曾屢次買來，而終不開，今日見之，特奇。」²⁴⁴金昌業曾經與馬維屏交流中，描述爲了鑑賞名花的事實，並且依據與馬維屏玩賞中可知金昌業從少有看花草相關書籍。²⁴⁵此外，透過譯官問價，並以清心元二丸、蘇合元五丸等藥品，買「探春花」和「茶□花」。²⁴⁶金昌業從李元英借讀的《佩文齋廣群芳譜》一書，也是介紹各種花、藥、菜果、草木及這些花草的培法的書，並且收入古今人的詩文。金昌業提到該書上康熙皇帝的序文，由此可見《佩文齋廣群芳譜》一百卷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朝鮮肅宗三十四年）自明王象晉（1561-1653）《二如亭羣芳譜》而編修出來的當代新書。²⁴⁷

金昌業跟譯官之間合作關係中，值得注意的是留在北京時，譯官吳志恒帶給金昌業的《大興縣志》一書。《大興縣志》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朝鮮顯宗十三年）詔令編一統志，並命省府川縣各自編修當地方志，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鮮肅宗十年）五月編成共六卷，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鮮肅宗十一年）十二月，由大興知縣張茂節總纂定稿。²⁴⁸金昌業描述相關內容：「譯官吳志恒得來一書，名《大興縣志》。蓋北京城內有二縣：東曰大興、西曰宛平。北京城東邊內外宮闕祠壇村坊山川人物風俗，靡不記載，其土產花果禽獸，亦皆見錄。得此書，益生出外之心矣。」²⁴⁹之後，金昌業留在北京

²⁴⁴ 堂上譯官朴再蕃得入蘭一盆。凡種二十餘莖，而葉瘠，長才六七寸。似是新種，而未著根者。問其出處，言得之館夫。並水仙花置之簾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5日；《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4日。

²⁴⁵ 書曰：「特來相訪，兼欲一見各□名花。」維屏即命從者，取一蘭盆置卓上。余問：「何蘭？」維屏答曰：「草蘭。」花色如何？答曰：黃。余問曰：「有建蘭，願一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2月3日；維屏曰：「足見多學之徵，拜服。」余曰：「從少性愛花草，看過幾卷花譜，記得一兩種名，何足稱多學？」《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8日。

²⁴⁶ 西牕內置長卓，上置一盆，梅一樹、海棠二樹、迎春二樹，北壁下置蘭草一盆。壁間倚一竹杖，取視之，有節而中實無孔。使金譯問可買否，僧曰：「此乃官員所贈，而其人常常來見，不可賣云。」《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八，癸巳年2月28日；乾糧以壯紙、青粧刀、清心元、長烟竹等物酬之。余亦贈清心元二丸、蘇合元五丸、紫金丁二錠，求探春茶□二花，待明春使行寄送許諾。主人見余所服木綿布，問價於元建，請於明年送二疋，許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七，癸巳年2月20日。

²⁴⁷ 少年出示卓上書一匣，題以《佩文齋廣羣芳譜》，是乃皇帝新編之書，凡花、藥、菜果、草木之屬，靡不錄栽培之法、古今人詩亦合載。皇帝詩亦在其中，序亦皇帝所作。後見暢春苑所出給之書，皆書《佩文齋》，蓋皇帝齋號也。是書凡四匣，合二十卷，而卷厚字細，又有一書求見，抽示之，是《左傳》也。冊□亦如《羣芳譜》，而粉紙點朱衣以黃紙，此亦皇帝所纂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0日。

²⁴⁸ （清）張茂節修、羅保平等點校，《大興縣志》（北京：北京古籍，2002），頁1-3。

²⁴⁹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6日。

時，常常引用《大興縣志》描述的北京地區相關內容。金昌業偶而由於《大興縣志》的介紹，而去該地遊覽：

遂騎馬出大街，南行二里許、抵天壇後，絕而西入，路左小鋪。問關帝廟所在。此廟，《大興縣志》謂是隋代所造，而塑像可觀。主人指東壁外曰：「即此便是。」至則廟不甚大，度一門。即為殿守者開殿門鳴鐘。余前再拜仰視，神貌特異。被甲怒目，以兩手按膝，向東側視，若有所問。跪者一人背縛，其面向外，作不服狀，云是吳將姚彬盜神馬被獲：身雖挫，心猶梗也。侍者四五人，其中一人在姚彬後背綫索，一人持槌而臨之，若將擊之狀，皆仰而承神命，莫不意在彬也。馬左右顧，神怒目揚鬣。人物皆如生，非近所及也。²⁵⁰

根據上文可知，《大興縣志》的內容導致金昌業想遊覽北京城的興致。金昌業留在北京常常交遊的李元英，他是《大清一統志》纂修官，金昌業跟他借讀了《一統志》、《佩文齋廣群芳譜》等書籍。²⁵¹根據《清史稿·藝文志》記載，乾隆八年（1743年，朝鮮英祖十九年）敕撰《大清一統志》340卷，後來乾隆皇帝拓展國土，重劃疆界，乃下詔崇修，於二十九年成書《大清一統志》500卷。而金昌業向李元英問關於《一統志》刊印的時間，李元英回答說，明年（康熙五十三年）冬間，依據《老稼齋燕行日記》的說法，《大清一統志》早在康熙年間便已籌畫編纂，且已刊印。²⁵²至於《明一統志》在朝鮮的流傳情形：朝鮮中宗時代（1506-1544），朝鮮已經刊出《大明一統志詩詠集類》（活字本，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和《大明一統賦》，該兩本書據推測是《明一統志》進入朝鮮後，重新編輯或選出內容，再加以標題而成。²⁵³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紀錄》中描述自己對燕行路程中所見文的內容，再加上引用《大清一統志》、《大興縣志》。因此可推測金昌業往來燕京的過程中寫的筆記，回到朝鮮，故寫成《老稼齋燕行日記》，並引用帶回朝鮮的《一統志》、《大興縣志》加以補充。

接著，清與朝鮮之間書籍交流中，值得注意的是，該年康熙皇帝特別詢問朝鮮

²⁵⁰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24日。

²⁵¹ 又作書李元英，遣元建，而送壯紙二丈、南草二封、粳米、糯米各一升。曾往其家時，見我食物所盛柳器而悅之，故送方結者一部。要送羣芳譜一匣，則答以此書即內府所在，而我為有考事取來，不可久留，還送前去書。《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四，癸巳年1月12日；金昌業提及《清一統志》時，是以《一統志》指稱，本文為了避免與《明一統志》混淆，便直接稱為《大清一統志》。

²⁵² 余又問：「《一統志》，聞方纂修，當於何時印行耶？」答曰：「似在明年冬間。」《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3日。

²⁵³ 金學主，《朝鮮時代刊行中國文學關係書研究》（首爾：首爾大學校出版部，2000），頁9、26-27。

使節帶來的書有哪些。透過《老稼齋燕行日記》2月3日的描述，可知朝鮮使節寫給皇帝，在朝鮮有的中國書籍目錄包含：《四書》和《五經》以外，還有《唐詩》、《古文真寶》、《諸子》、《綱目》和《事文類聚》等十種。另外，兵書中也寫了《孫武子》、《吳子》、《三略》等。而且，更有趣的是，朝鮮使節寫上了《春秋》之後，譯官提醒朝鮮使臣該書為禁書而不可寫上，不過使節認為不寫還是不妥，而加寫為《五經》，再加上《六選工集》、《唐律廣選》二本，以及《國朝詩刪》。在《國朝詩刪》中選出35首詩，把它摹寫後該摹寫本獻給皇帝看。兩天後皇帝認為朝鮮的書不夠多，而將《淵鑑類函》20套、《全唐詩》20套、《佩文韻府》12套、《古文淵鑑》4套等共370本的書給朝鮮國，下令透過下一次的使行帶來《東國詩賦》和雜文等。²⁵⁴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簡介這些書籍：

昨自暢春苑受來四部書，各抽其首卷視之：《淵鑑類函》以《唐類函》演成，蓋類聚也；《佩文韻府》凡例，一如《韻府羣玉》，而極其該博；《全唐詩》即盡取唐人之詩者；《古文淵鑑》即選自《左國》，以至宋人之文者。其序皆皇帝親製也。²⁵⁵

至於中國書籍在朝鮮出版的狀況，朝鮮世宗年代（1419-1450，明永樂十七年至景泰元年）由於銅活字的鑄造，已刊出更多中國各朝經典的書籍。透過朝鮮時代的中國文學相關刊行書目：《詩經》、《書經》、《莊子》、《楚辭》、《昭明文選》；唐代李白、杜甫、杜牧、韓愈、柳宗元等；宋代蘇軾、黃庭堅、陸游等；明代李東陽等的詩文集。詩文選集方面則是《楚辭》、《文選》以外，還有《文章正宗》、《古文真寶》、《唐詩鼓吹》，詩論書方面則是《詩人玉屑》等書。

經過朝鮮中宗、明宗（1506-1567，明正德元年至明嘉靖四十六年）年代刊行關於受朱子學影響的相關書籍，如《陶淵明集》和歐陽修、蘇洵、陳師道等詩文集；朱熹的《朱子大全》、《晦庵文抄》、《文公朱先生感興詩》、《訓蒙絕句》等。前提及的《大明一統志詩詠集類》和《大明一統賦》以外，《明太祖文集》、《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聖元名賢播芳續集》也在該年出版。宣祖年代（1568-1608）到壬辰倭亂²⁵⁶前仍然保持前代的潮流，刊行《朱子語類》、唐詩類、王安石《唐百家詩》、《唐詩彙選》、

²⁵⁴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6日。

²⁵⁵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7日。

²⁵⁶ 即豐臣秀吉出兵朝鮮的戰爭。



圖八 鄭敦,〈讀書餘暇〉,《京郊名勝帖》。

《唐詩絕句》等。仁祖（1623-1649）年代，由於丙子胡亂（1636）²⁵⁷等國內外的戰亂，刊行的中國書籍較少，反而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學者自己編輯書籍的狀況比較多。

肅宗（1675-1720，清康熙十四年至康熙五十九年）年代刊行的書籍量變多，朝鮮學者自己的書籍和中國的書籍都增加，除了《詩》、《書》等的儒家經書以外，還有《莊子》、《楚辭》、《文選》；晉陶淵明；唐代韓愈、柳宗元、韋應物、李商隱；宋代蘇軾；明代方孝孺、茅坤等的詩文集。詩文選方面，如《唐宋八大家

文抄》、《古文真寶大全》、《古詩選》、《儷文抄》、《儷文集成》、《古文》等；此外，還有關於文學論的《藝苑卮言》；小說類的《世說新語補》、《剪燈新話句解》；加上韻書或故事成語相關的書。²⁵⁸透過肅宗年代書籍的類別，可推測當時朝鮮文人有興趣的範圍相當廣泛，這些也反映出朝鮮時期文人對「花草」或「遊記」等的關心（圖八）。

金昌業在燕行紀錄的〈往來總目〉中列出燕行路程中所購買的書目：「所買書冊：《朱子語類》、《異同條卞》、《漢書評林》、《杜工部集》、《劍南詩抄》、《本草綱目》、《農政全書》、《奎壁四書五經》、《文選》。」²⁵⁹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金昌業購買這些書籍的狀況，除了《本草綱目》和《文選》之外，沒有清楚描述何為買這些書。並且，金昌業解釋在豐潤縣（在今日河北省）購買《文選》的理由：「又有《昭明文選》無註者，字□大，宜於老眼，其價別扇八柄，而亦不能買。」²⁶⁰後來，往回朝鮮的途中，又遇到同樣的書，這次以九把僧頭扇買該書。²⁶¹金昌業購買的書類，包含朱子學、醫書、經書、農書、史書、詩文各種不同類別。根據上述各書成書的時間可知，金昌業所購買的書籍大多並非清代文人的著作，而

²⁵⁷ 即朝鮮與清朝的戰爭。

²⁵⁸ 金學主，《朝鮮時代刊行中國文學關係書研究》（首爾：首爾大學校出版部，2000），頁10-19。

²⁵⁹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往來總目〉。

²⁶⁰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三，壬辰年12月22日。

²⁶¹ 多出書冊要賣，其《文選》亦在，而其直更討，僧頭扇九柄，乃許之。《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七，癸巳年2月19日。

是在朝鮮已有流傳，且較為著名的中國前朝書類。

在第二章的討論中，見到當年使節團中御醫金德三在北京時，曾被找去太和殿替皇帝的第七個皇子看病。至於朝鮮醫術或朝鮮書籍在中國的狀況相關內容，並沒有被描寫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不過十八世紀後期燕行的朴趾源《熱河日記》中，介紹 1780 年（朝鮮正祖四年，清乾隆四十五年）在中國所見到的朝鮮醫書《東醫寶鑑》之相關描述：

我東書籍之八梓於中國者，甚罕，獨《東醫寶鑑》二十五卷盛行，板本精妙。我國醫方未廣。鄉藥不真，我宣祖大王命太醫許浚與儒醫鄭古玉碯及醫官楊禮壽、金應澤、李命源、鄭禮男等，設局撰集。出內府醫方五百卷，以資考據，書始於宣廟丙申，而成於光海三年庚戌，實萬曆三十八年也。其所刊弁卷之文，頗疎暢。……原任湖南邵陽醴陵興寧桂陽縣事，充庚午壬申癸酉丙子四科湖廣鄉試同考官番禺凌魚撰。²⁶²

並且，朴趾源引用了乾隆年間由凌魚所寫在中國出版的《東醫寶鑑》之序文。此外，徐有聞的《戊午燕行錄》（1798 年燕行，朝鮮正祖二十二年，清嘉慶三年）一書中也提到，在琉璃廠每家書店都有三、四套的《東醫寶鑑》，而徐有聞認為中國人也很看重《東醫寶鑑》。²⁶³

以上所述，討論金昌業靠譯官而尋得畫工、繪畫作品、並參訪天主堂欣賞西洋雕像，接觸了各種中國的藝術，並且寫下他的觀感。首先，他爲了長兄金昌業找過兩位畫肖像的畫師時，對該畫師的筆法來推測出畫作的構圖和角度、色彩而來評價整個畫作的品質。金昌業的燕行錄之所以經常出現描述所見中國藝術的鑑賞相關內容，一方面因爲他本身是一位畫家，已具有詩書畫方面的鑑賞能力；另一方面，讓我們理解這與兩國文人交流的方式，一定有密切的關係，如經常一起鑑賞作品、並加以評語等。

除此之外，透過金昌業的例子，可知朝鮮使節在中國最有興趣的文物是繪畫作品和書籍，因此燕行日記中可見購買各種繪畫或書籍的狀況。本文透過歷代在朝鮮出版的中國書籍的情況來觀察，金昌業買的書籍並不屬於當代出版的新書。雖然不清楚金昌業何爲選購這類朱子學、醫書、經書、農書、史書、詩文書籍，但可以觀察到固定的燕行路程中，使節可以接觸到各種中國書籍，甚至南方來的書籍等等。當時康熙皇帝問使節關於在朝鮮中國書籍的流通狀況，並且康熙皇帝給朝鮮國不少

²⁶² 朴趾源，《熱河日記》，〈口外異聞〉，頁252-191d。

²⁶³ 徐有聞，《戊午燕行錄》，戊午年12月22日。《戊午燕行錄》爲以韓文寫而成的燕行紀錄。

中國書的一事，讓我們了解當時書籍交流的情況，也相當值得關注。依據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描述，可知金昌業針對《大興縣志》、《一統志》和《佩文齋廣群芳譜》相當興趣，雖然他的燕行日記看不出是否將這些書摹寫的情形，不過可推測金昌業往來燕京的過程中寫的筆記，及《一統志》、《大興縣志》的相關內容加以補充，回到朝鮮，故寫成《老稼齋燕行日記》，並引起了十八世紀後期北學派文人思想家的注意。

第三節 山水遊覽與書寫

金昌業來往北京途中經過許多地方，燕行使節得按照固定路線的情況中，金昌業經過的各城中拜訪寺廟、市集觀察人物、文物和建築等。留在北京的時間，也是利用在金昌業身上的朝鮮物品當作禮物給譯官或中國軍官，到天安門、朝陽門、三忠祠、北京天主堂、欽天監等地遊覽，²⁶⁴總述寫在《老稼齋燕行日記·山川風俗總錄》中。²⁶⁵值得注意的是，金昌業在回到朝鮮的途中，離開了中國所指定的固定路線，也離開使節團金昌業自己去山水遊覽的情形。

透過前面討論的關於書籍的交流，可知朝鮮使節對中國書籍的關心與重視，這些書籍流傳到朝鮮文人社會，也產生許多文化現象。明清時代派往中國的朝鮮使節，以燕行的機會，迅速接觸當代在中國流行的新書，而且來自南方的中國秀才或商人帶來書籍賣給朝鮮人，如後七子王世貞（1526-1590，字元美，號鳳洲），是對十七世紀前期朝鮮文人而言，是相當有影響力的明文人之一。王世貞等人主編之《名山勝槩記》等明代山水記行相關書籍，隨著兩國使節的往來，傳進朝鮮並且流行，如常被提到的金昌業叔父金壽增的文集《谷雲集》中。朝鮮時代盛行的山水旅遊，在十七世紀以後，由山水旅行而出現的「遊山記」、

²⁶⁴ 本為登觀象臺，而到此無其路，遂還下，問於人，觀象臺由欽天監可登，而欽天監在臺之四邊云。然已過，故不復尋，仍從城底路北去，出朝陽門大路，到西牌樓，汲水人已來待。《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五，癸巳年2月3日。

²⁶⁵ 道上所見近山：九連城之松鶴山、鳳凰城之鳳凰山、廣寧之醫巫閭山……其遠山：昌黎縣之文筆峯、遼東之千山，最奇秀……水：遼東太子河、瀋陽渾河……市肆：北京正陽門外最盛，鼓樓街次之……北京城周四十里、南邊重城周二十八里、通州城周八九里、西有重城……凡城皆甃築，而高三丈以上，山海關最壯。《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山川風俗總錄〉。

「遊山錄」或相關詩文和山水畫作品，相當豐富。²⁶⁶對於燕行使節而言，燕行可說為一種國外旅遊，因此朝鮮使節盼望到北京遊覽北京城，這是在十八世紀許多燕行紀錄中容易見到之現象。

1712年燕行的金昌業也並不例外，由於該年他以「弟子軍官」的身份，隨行往北京出使，有遊覽北京城的目的，而在《老稼齋燕行日記》的描述中充分反映出來：

壬辰六月二十三日政，伯氏為冬至兼謝恩使時，伯氏大病新瘳，子弟一人宜隨往。且吾兄弟，皆欲一見中國，於是叔氏欲行，已而止，余乃代之以打角，啓下。一時譏謗譁然，親舊多勸止。余談諧曰：「孔子微服過宋，為今世通行之義，吾何獨不可乎？」聞者皆笑，及治行。圍陰以沿路《名山大川古蹟錄》一冊、月沙《角山閭山千山遊記錄》一冊，並《輿地圖》一張，置橐中。²⁶⁷

根據上文可知金昌業攜帶著其弟金昌緝（1662~1713，字敬明，號圍陰）給他的《名山大川古蹟錄》、《角山閭山千山遊記錄》和《輿地圖》等書和地圖前往燕京。

至於金昌業所帶的《名山大川古蹟錄》和《角山閭山千山遊記錄》，在目前沒有留下的狀況下，不太清楚它的詳細內容。該書為其弟金昌緝帶給金昌業的書，或許在金昌緝的文集《圍陰集》中，也許可見該書相關資料。首先，在《圍陰集·年譜》中，可見金昌緝曾經從許多古今名山記書籍中挑選記事，並編撰《澄懷錄》的情形。之後又從《名山記》選出記事，撰成《名山最勝》四冊。²⁶⁸雖然這些書沒有留下來，所以光從他的書名來看，並不知道這是屬於哪類的名山記。不過在《澄懷錄》序文中，可知該書為從宋至明代中國山水記行文中彙集而成。²⁶⁹由上可知，在金昌業家族成員中，包含叔父金壽增等人，大概都讀過中國名山記類書，並且從這些中國名山記書中選取記事編輯成書，因此金昌業帶往燕京的《名山大川古蹟錄》應該是介紹中國名山記的書。

接著，李廷龜（1564~1635，字聖徵，號月沙、保晚堂、凝菴）的《角山閭山千山遊記錄》，是李廷龜被派往明朝時，經過中國北方地區的角山、閭山、千山遊覽的紀錄。依據《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可知李廷龜曾經出版《朝天記行錄》，並且國王已經閱讀過該書，朝鮮國王下令將李廷龜的《朝天記行錄》描述中的《契繪圖》找回來。

²⁶⁶ 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頁7-64。

²⁶⁷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一，〈往來總錄〉。

²⁶⁸ 金昌緝，《圍陰集》，〈附錄·年譜〉。見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頁65。

²⁶⁹ 上自奴姬，下訖宋明，凡得若干篇，錄為一卷。金昌緝，《圍陰集》卷之六，〈澄懷錄序〉。

²⁷⁰同時，透過收入於《燕行錄全集》中，李廷龜撰寫的關於中國的紀錄總共有七種。於是可推測李廷龜數次以使節的身份前往明代的中國，其中《角山閭山千山遊記錄》為李廷龜到中國北方角山、醫巫閭山和千山的經驗而寫成的書。

這些推測更清楚的反映在《老稼齋燕行紀錄》的描述之中。本文第一章提及的關於清代燕行的規律，除了中國所指定的固定路線以外，朝鮮燕行使節不可前往中國的其他區域。然而，金昌業在回到朝鮮的途中，離開了中國所指定的固定路線，在癸巳年（1713年）2月23日到角山寺（角山在鳳凰店至山海關之間地區）過夜；同年3月1日到醫巫閭山（離閭陽驛40里遠之地方，在小黑山與使團會面）過夜；又從3月5日至3月9日（在甜水站與使團會面）共5日的時間到千山，即旅遊大約100年前李廷龜所去過的角山、閭山和千山等地。²⁷¹並且，可見在《老稼齋燕行日記》都常常引用李廷龜書上的描述，²⁷²因此可推測該書刺激了金昌業想去名山旅遊的期望。

朝鮮文人之間盛行的山水旅遊風氣，加上金昌業手上的這些書籍，也許引起讓金昌業想往北京城以外其他地區進行山水旅遊的興趣。金昌業在回到朝鮮的途中，使團停留在山海關時，他首先帶著各種食物和扇子等的物品到角山的角山寺：「齋脯二條、鯪魚數箇、藥果二片、燒酒二盞，皆掛鞍，以備療飢。又帶別扇一把，是則擬與寺僧也。」²⁷³金昌業到角山寺，跟寺僧和讀書秀才筆談，又有機會在角山寺過夜，並且寫信給長兄

²⁷⁰ 傳曰：「見李廷龜《朝天記行錄》，則有千秋、聖節兩行契會圖云，此圖覓入。」《光海君日記》158卷，十二年（1620年，明萬曆四十八年）11月17日。

²⁷¹ 申之淳曰：「月沙後，百年間無來此者，今日我輩之遊，豈不奇哉？」又謂崔曰：「我輩今番買賣，必失利矣。崔曰：「何謂也？」申曰：「享此清福，又安有得利之理哉。」飯後，遂訪觀音閣。《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1日。

²⁷² 三行欲過舊遼東，觀永安寺及白塔，飯後，余先行。七八里出一谷，野色茫茫無際，此乃遼東野……其中年少者一人，眉目有清氣，試問千山路，能知之？言自遼東南行五十餘里至山。遂歷數山中，寺名與月沙記相符。取清心元一丸，從馬上與之，受而熟視，似不知用處。《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二，壬辰年12月4日；月沙所記以為：「從堞上北望山缺處，黃沙白沙渺渺接胡村。」意謂登此可望沙漠，却恨其不然也。蓋山勢非不高峻，而山後又有山隔胡地，不知其幾重。恐月沙未曾上此而記之爾。《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八，癸巳年2月23日；兩驛曰：「如此勝地，我輩實初見，到此，頓無歸去之意。」申之淳曰：「月沙後，百年間無來此者。今日我輩之遊，豈不奇哉？」《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1日；古人遊蹟之勝如此，其勝可知，而月沙記中不載，未可知也……有畫薨出其間，異而問之，村人謂之小觀音。月沙記中立馬凝望不忍失之者此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2日；月沙記中自八里站，迤南行者即此也……月沙所記佛殿後層樓及玉皇殿，蓋無存者……月沙以為此石在玉皇殿傍，與今所見相左。又含澤宣氣所刻石壁，不過數丈，而謂之萬仞。此恐追記，故未免誤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7日；此似月沙所謂巡安廳所在，而蕪沒無其址矣……月沙記中二佛菴踞其上者此也……月沙謂合三角道峯，可敵此山，斯論亦然。《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8日。

²⁷³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2月23日。

說，爲了給該地認識的寺僧和讀書秀才送禮，請他派人帶紙和筆墨過來。²⁷⁴

對金昌業而言，李廷龜的《角山閭山千山遊記錄》又激起他到閭山旅遊的興致。從角山寺回來五天後，他自己描述說：「余久畜遊巫閭之計。明日當宿耕廣寧，擬於朝飭後，先發疾馳，到山中一宿，翌日可追及行次于前站。」²⁷⁵可知金昌業心目中已經有閭山旅遊的詳細計畫。閭山今日在於遼寧省北鎮縣西邊，另稱爲「醫巫閭山」或「巫閭山」。金昌業引用在閭山遇到的修行人的說法，來描述閭山中的寺觀。

秀行自言是蓋州人，因謂遼東本是貴國地方。蓋州亦遼東，是俺與足下同爲高麗人云。……余問山內外寺觀之名，僧書閭山大觀音閣，西玉泉寺、西北琉璃寺、滴水寺、南雙鳳寺、靈山寺、五鳳寺、觀音洞、甘露菴、桃源洞、桃花洞。西北望海寺、雙泉寺、清安寺。望海寺在此山最高處，登此，不但見海水，蒙古地方，亦可俯臨云。²⁷⁶

他順著觀音閣、觀音洞、桃源洞等地，來到北鎮廟的無梁閣，見到正殿中閭山之神的塑像，又在廟庭園的六面亭附近看到許多歷代的碑石，²⁷⁷其中，建立於永樂十九年 3 月的碑文描述：「勅遼東都司北鎮醫巫閭之神，自昔靈應顯彰，而衛國祐民，厥績尤著。獨其廟宇頽廢，至今弗克修治，朕心眷切，夙夜弗忘。勅至，爾等即擇日興工，建立祠宇，飭嚴祀事，以稱朕崇仰之意，故勅。永樂十九年三月初七日。」依據金昌業對北鎮廟的描述，可知閭山幾乎都被每個朝代重視而舉行祭祀，可說是中國名山之一。同時，金昌業在閭山旅遊中，描述閭山的景觀時，在許多地方都引用李廷龜的描述：「村後石峯攢簇，有畫薨出其間，異而問之，村人謂之小觀音。月沙記中

²⁷⁴ 作書于伯氏曰：到寺日已暮，勢難還，寺中又有讀書秀才，願與同宿，故遂留，當趁明早下山。分付廚房，具朝飭以待，寺僧及秀才，俱不可無面皮，紙束筆墨各若干，馬來時，伏望覓送。《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 2 月 23 日。

²⁷⁵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八，癸巳年 2 月 29 日。

²⁷⁶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 3 月 2 日。

²⁷⁷ 夾路左右，立七碑。右邊第一碑，成化所立。第二碑，正德所立。第三碑，萬曆元年所立，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學顏所撰也。左邊第一碑，成化所立。第二碑，正德所立。第三碑，康熙所立。第四碑，萬曆丙午所立。階下左右立五碑，右一碑，弘治，其二，皆康熙所立。左一碑，書永樂十九年三月勅建碑……一碑，康熙所立也。正殿後又有一碑，庭中共有二十四碑。弘治碑三，四年、六年、十八年所立也。成化碑五，元年、四年、十三年、二十年、二十三年所立也。正德碑三，元年及八年所立兩碑也。正統碑一、九年所立也。隆慶碑一，元年所立也。萬曆碑一，元年所立也。其二，忘其年矣，碑上只刻行祭年月祝文，無他文字爾。殿後有一帶墻，其外瓦礫滿地，皆廢址也。當中者兩屋，左右各一屋，砌礎皆宛然。其在後者最大，而北邊一壁猶存，以青甃爲之。中刻大龍，日照其上，鱗甲欲動。畫法亦奇，雲物波濤，上下滃渤，而龍作正面，奮鬚張目，望之如生，不可狎視。此處地勢益高，而閭山撐立其後，氣像尊重，宜爲北鎮神之居也。《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 3 月 2 日。

立馬凝望不忍失之者此也。」²⁷⁸金昌業在閩山旅行時，詢問當地人往千山的路。根據金昌業的描述，可知千山甚至是皇帝也曾去過的中國名山之一：

余問秀行曰：「千山距蓋州不遠，曾見不？」曰：「曾見過。」問：「千山奇勝，比此山如何？」曰：「相等。」又曰：「千山，皇帝亦曾往見云矣。」余夜得一絕，遂書贈秀行。秀行未解詩意，申譯以華語釋喻，喜而藏去。²⁷⁹

透過上文可知，他在當地作詩，並與修行人唱和，顯示了他嚮往千山之旅的意願。金昌業從閩山回到使團中，到中國白旗堡時說：「余以閩山千山，牽掛胸中，今閩山纔得放下，而千山又當前，意益憧憧，寢食不甘。正所謂得隴望蜀者，還可笑也。」顯示金昌業盼望中國名山旅遊，並且在他的計畫中早就有了千山之旅的打算。

千山屬於長白山山脈，約在今日遼寧省西南部，由於山峰連綿，據稱有一千多座山峰，故稱「千山」。²⁸⁰因此，金昌業開始考慮在千山旅遊期間，可能會遇到的許多難關：

蓋閩山往返，不過經宿，而千山則雖先發疾馳：非四五日不可，其難一也；千山去遼東，或曰五十，或曰六十里。不得此處人知路者為向導則難往，其難二也；自瀋陽先發一日，達遼東，其翌日往千山。然後又其翌日，可及行次于狼山，若不及狼山，則青、會兩大嶺素多虎，不可獨過，其難三也；瀋陽門，明後始開，自瀋陽至遼東，乃一百三十里之路。若待門開而行，則一日內不可得達，其難四也；千山一路，荒僻去處，非我國人往來之地，行色孤單，或逢歹人，則難免不測之危，其難五也；一路所過客店寺觀，皆有告示榜，其文曰：「面生話異，凡係來歷不明人，一切不許容留云云。」所到或遇讖詰，則不但一身狼狽，恐或弄出事來，累及使行，其難六也；二千里跋涉，人馬力盡，已為強弩之末勢，而又自今日越站。若往千山，則當連六日疾馳，其難七也；七難之外，飯具寢具，皆當擺落，然後可行，此又一難也；以此八難，籌度於心者，亦審矣，而最緊者，得諾於麻貝，自孤家先行，而不入瀋陽城，直向遼陽也。²⁸¹

儘管如此，金昌業還是積極地準備千山之旅。他得到首譯的同意，並且得到當地人

²⁷⁸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2日。

²⁷⁹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2日。

²⁸⁰ 朴智鮮，〈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頁163。

²⁸¹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3日。

麻貝的協助，²⁸²解決了往來千山的交通工具問題之後，就準備往千山的行李，如大米、銅鍋、燒酒、藥果、飯饌等的食物類，及旅費之正銀、扇子、紙束、煙竹、火鐵、鞘刀的朝鮮物品。金昌業爲了進行千山之旅，在他準備的旅具中，除了食物的部分以外，他爲了旅費又準備了朝鮮物品。他的千山之旅並不屬於一般城市的旅遊，不過他以朝鮮物品來付旅費一事，可以看出朝鮮物品在像千山這樣偏遠的地區依舊可以代替貨幣：

分付善興，潛理行裝。用藿葉浸醬而曬之，爲代羹也。用一兩正銀換錢，爲盤纏之用也。正銀二兩，爲備不時之用也。扇子、紙束、煙竹、火鐵、鞘刀各若干，爲面皮之用也。大米六升，爲飯資也。銅鍋一口，爲烹飲食也。燒酒三四盞、脯若干條、藥果若干立，爲療飢也。飯饌則筒中炒醬與石魚數箇、蒸昆布數條而已，詹胡要得扇子，而乏盡不得與，以白紙一束與之。以朱煙竹一箇與麻貝奴將車者，又以海蔘一斤、厚白紙一束，送于麻貝，車直也。²⁸³

不過，金昌業的千山旅遊的計畫，被長兄金昌集知道，金昌集寫五言絕句說：

萬里同賓雁。惟宜莫少違。豈知臨鶴野。不肯一行歸。

金昌業回詩給兄金昌集說：

已涉萬里遠。休嗟數日違。聯翩渡鴨水。殊道竟同歸。

表明了自己對該旅遊的期待和意志。²⁸⁴金昌業用了共四天的時間，經過遼陽的永安寺、龍泉寺和大安寺，在各地與當地人作詩互相唱和，在《老稼齋燕行日記》和《老稼齋集·燕行墳笈錄》中，可見作者對千山旅遊的印象和所見之風景、及名山水旅遊的樂趣。

以文人畫家身份之金昌業，除了名山旅遊中作詩文以外，又從文人畫家的角度，描述了一種視覺的印象。金昌業在千山的大安寺西閣近處描繪千山的景觀：

自毘盧殿轉至西閣。閣在寺西四五十步，與彌勒殿側對，地勢頗高，左右巖巒奇秀。到此更別，真所謂移步換形者也。有一石出谷中，當階挺立，如怪石然，形秀色潤，其高十餘丈，上生松，老而昂藏。雖善畫者描之，不可彷彿，造化亦巧矣。²⁸⁵

並且，金昌業引用《一統志》上的介紹：「《一統志》所云龍泉寺方丈前，有大石

²⁸² 「麻貝」爲負責使節的護行之胡人迎送官員。

²⁸³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3日。

²⁸⁴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5日；金昌業，《老稼齋集》卷五，〈燕行墳笈錄·次伯氏詠鴈韻〉，頁175_111d。

²⁸⁵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8日。

如屏，松迸石叢出，奇秀可觀者，恐指此而言也。」²⁸⁶

更重要的是，金昌業描述在閭山觀音閣附近景色的壯觀：

秀行導余出東邊虹門。百步許登一岡。岡脉來自觀音閣，左峙為平臺，上有層巖可坐。仰見峯巒，俯視洞壑，亦一勝處也。岡兩旁亦皆桃田，而間有梨李櫻桃之屬。其地沙而瘠，樹皆壅其根，傾瀉處皆聚土為壟，使壅不流，此皆寺僧所為也。計一山所栽，無慮千萬樹，而以十數人力能辦此，可謂健矣。此地人作事，多類此，可畏。

並且，他當場描繪了此壯觀的景色。金昌業在他每天所寫的燕行日記本中，描繪了他正看見的山形，並與朝鮮山脈做比較，描述他對大自然的看法：

余在岡上，踞石周覽，遂拈筆略摸山形於日記冊張。僧見之，笑曰：「便移得山也。此山，路上望見，不過蜿蜒磅礴雄大而已，不知峯巒巖洞之勝如此，其載職方有以也。」然此山以掩抱六里，亦名六重山，而今余所觀不過一面，則亦何能盡山之蘊哉！然見其沙與石，與我國京山。同其色理，清淑所種，遠近同範。沙白而水清，石潤而峯秀。此必然之理，美妻不生醜兒，一鬻可知全鼎，此山典形，又何待遍歷六重，而後知哉！²⁸⁷

雖然目前沒有留下金昌業在閭山描繪的此件作品，不過從身為文人畫家的金昌業在閭山旅遊中，描繪了山形的行為一事，我們可以理解在當時朝鮮山水旅遊活動中，也有畫家到山上旅遊並進行山水畫描繪的情況。朝鮮文人對山水旅遊的喜愛，也影響到朝鮮畫家的旅遊山水畫作上，例如十七世紀起在朝鮮流行的《九曲圖》和《金剛山圖》等，該系列的作品都是因山水旅遊而起的山水畫作。²⁸⁸

以上所述，本文金昌業在燕行回程中，關注離開固定燕行路線的山川遊覽。他弟弟金昌緝所給的《名山大川古蹟錄》、《角山閭山千山遊記錄》兩本書，我們可推測讓金昌業引起進行山水旅遊的興趣，最後到中國北方角山、閭山和千山的旅遊，這些都不是燕行使節固定的路線。並且，金昌業家族長久派往中國的背景，及叔父金壽增和金昌業六個兄弟對中國《名山記》之類書籍的喜愛，或許也是影響金昌業往中國名山旅遊的理由。除此之外，金昌業在中國名山旅行當中留下了作詩文、摹寫山形的畫作，讓我們可以了解當時朝鮮流行的名山旅記、旅遊詩、山水畫作等，具有幾乎與明末清

²⁸⁶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8日。

²⁸⁷ 《老稼齋燕行日記》卷九，癸巳年3月2日。

²⁸⁸ 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頁116。

初中國流行的山水旅遊一致的風氣和習慣，²⁸⁹並且理解金昌業已認知兩國文化交流中燕行的重要作用，而為何會帶著朝鮮畫家鄭敷畫作一事（圖九）。金昌業從前者的燕行日記中想像中國，得到機會往北京的路程中見聞許多名地，他以中國親自見聞過的經驗，故而寫成《老稼齋燕行日記》。之後，金昌業的日記被朝鮮人讀過，因此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的燕行紀錄中，也隱隱然可發現從金昌業對中國的態度與觀感的影響力。即金昌業對中國仍保有開放的態度，讓他更多地方經驗寫成燕行日記，這本書逐漸改變了朝鮮人對中國的看法，也許清朝的先進文物等這些都引起了朝鮮人需要學習清朝的北學態度。



²⁸⁹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聯經出版公司，2007），頁 177-213。



圖九 鄭叡，〈金剛山圖〉，1734年。

結 論

本論文從 1712 年派往北京的朝鮮文人金昌業私帶物品，來考察清朝與朝鮮文人如何交流、交換哪些物品，以及朝鮮文人為與清朝人交流，是否特別準備特定物品等的問題。過去以《燕行錄》做為主要材料的研究，是透過朝鮮使節在中國經驗的自述為主，來討論朝鮮人眼中的中國，但這其實並不能完全代表朝鮮人真正的觀點，也許從他的行為或使用的媒介來切入討論，可以更貼近朝鮮人當下實際的看法。所以，本文所關注的焦點在於兩國交流的面貌上，即朝鮮文人金昌業私帶的物品，它們在口語不通的兩國文人交流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以及透過這些物品本身、或各種運用方式，來看金昌業對中國有什麼樣的觀感。因此，我們可以試著理解這些朝鮮物品在中國的地位、以金昌業為代表的兩國文人交流的模式，及對朝鮮人對中國人物、文物及景觀之態度。

1712 年朝鮮和清朝之間，政治上重大的事件，當年燕行規模為整個燕行歷史中規模最大的一次，還同時有兩國邊界問題的存在等，讓我們值得探討的歷史背景。並且，在康熙年間朝鮮使節的行動範圍比較自由的情況下，金昌業甚至可以獨自脫離固定的路線，與清人交流或購買中國的書籍等，甚至到角山、閻山、千山山水遊覽，這更是該年燕行特別值得關注的另一理由。透過前者的研究，可見燕行具有固定路線、限制私帶物品、更無法買帶中國書籍、地圖等等特性。因為具有這些限制，本文更加關注金昌業實際上是私帶了朝鮮的紙、摺扇、清心丸等物品，而他是如何充分利用了這些物品來跟清朝人接觸交流。

朝鮮文人金昌業，是由於他的長兄金昌集在康熙五十一年以正使的身份被遣到北京時，以「弟子軍官」的身份一同前往北京。金昌業跟清人交流時，在口語不通的情況下，送朝鮮的物品給清朝人，進而有機會筆談交流。歷代以來，金昌業家族中有約 20 個人被派往明清時代的中國，同時金昌業讀過很多前者的燕行記錄；所以，對燕行路程中可能有機會遊覽哪些地方、與當地人交流，是有概念的。過去被重視的十八世紀後期朝鮮作品中，常見引用了十八世紀初期金昌業的燕行記錄；由此可知金昌業與清人的交流模式，對後代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許多朝鮮文人看過金昌業的記錄起而效尤，金昌業燕行記錄是有突出重要地位的。

金昌業所帶的紙、摺扇、清心丸等的物品是供 146 天長期旅遊的往北京路程中，方便

攜帶的物品。尤其是透過中國文獻中的相關紀載，可見這些物品是長期以來朝鮮朝貢物品中，中國人所喜愛的朝鮮特產品。這些朝鮮物品，除了它具有本身的異國物品價值以外，還有等價的地位，也就是可以代付於燕行路程中的旅費和購買中國書籍或物品。即使當時以八包法的制度來限制跨國買賣活動，不過以《老稼齋燕行日記》可見朝鮮人在中國使用銀兩，同時直接使用朝鮮物品扇子、紙筆墨等代付的情況。扇子是金昌業所攜帶的物品當中數量最多者，除了購買書或付旅費以外，跟清人交流時，甚至托運之小費等，它的使用範圍相當廣泛。本文的觀察中，朝鮮的各種紙，也是在不同的情形中被廣泛使用，尤其針對付旅費時，或配著筆墨送給識字的清人時。清心丸是一種藥品，相對其他物品數量較少，使用在對方主動索求時，或想表達更多感謝的時候。金昌業不止會將這些物品送給清朝人，也會用在來自朝鮮的譯官身上，這點是金昌業的許多紀錄中可見到的一點，這也許與北方商業活動有關，也就是在北京或邊市，都是以朝鮮物品直接買賣的關係。如此可見，朝鮮物品具有等價的價值存在。

金昌業的物品之所以也流到來自朝鮮的譯官手中，不單是這些物品具有價值，而且使節需要譯官的協助，帶他們去想去的的地方遊覽，或買書等。這些譯官是得通過考試才有機會與使節一同前往北京的，但他們真正關心的是燕行中的商業活動，而不是外交人士的角色。金昌業在中國見過的商人住宅相當富麗堂皇，可想見他們從燕行得來的商業利益和北方商業規模有多大。對於因此漸漸腐敗的譯官，金昌業在《老稼齋燕行日記》多有批評，即便如此，身為在北京的朝鮮人，他也還是無法避免需要譯官的協助。譯官在中國已經有商業的通路，因此可以一直送販賣書籍的人到玉河館，讓朝鮮使節以朝鮮物品來購買所喜愛的書籍。因此，我們不應忽略譯官們對朝鮮使節的各種協助，而朝鮮使節才得以在中國購買書籍，帶回朝鮮等文化交流的面貌。金昌業在中國交流的中國人士也是大部分都是透過譯官而認識，或許因為如此金昌業所接觸的中國人似乎階層不高，這點則讓我們理解譯官對使節的行動範圍之影響力。順帶一提的是，從金昌業的記載中，可看出賣書籍和畫帖的人是來自南方識字的人，雖然關於這部分，本文沒有再深入討論，不過透過這些賣家，也許更可理解朝鮮使節在中國購買的書籍和畫帖等的來源和特色，也是一值得研究的題材。

而關於金昌業在中國買的書籍，其實透過朝鮮時代刊行的中國書籍名目來看，大部分都是很可能在朝鮮已經有的朱子學、醫書、經書、農書、史書、詩文等書籍。但是在北京自譯官得到的書《大興縣志》，以及向清人李元英借讀的《一統志》、《佩文齋廣群芳譜》，金昌業對這些書相當有趣，導致金昌業想遊覽北京城或購買花草的興致。

更值得注意的是金昌業受到弟弟金昌緝送的《名山大川古蹟錄》、《角山閭山千山遊記錄》和《輿地圖》等書和地圖的影響，在回朝鮮的路上特地到這些地區遊覽。透過本節的討論，可知金昌業已經預期前往這些地區並有所期待，即使遇到許多難關也一一克服，如願遊覽。更有趣的是，這些旅程中他都帶上正銀、扇子、紙束、煙竹、火鐵、鞘刀等朝鮮物品來當做路途上的旅費。其中繪出閭山山形一段，更可讓我們了解金昌業文人畫家的身份，並可推測朝鮮人在山水旅遊中描繪實景畫的習慣，更加把朝鮮人「真」的觀念，表現在山水畫中成為「真景山水畫」。此外，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也有朝鮮人之間，在中國送禮的狀況，如作詩文和畫肖像給長兄等一事。金昌業家庭一直以來都贊助畫家，金昌業帶著其中朝鮮畫家鄭澈的作品，送給了中國人馬維屏，由此更可推測金昌業已經認知了燕行為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這件事情也可以說在兩國文化交流中具有最重大的意義，展現以金昌業為代表之朝鮮文人的交流模式。

基本上，金昌業過去對清朝負面的觀感，來自他的曾祖父金尙憲在瀋陽當人質的記憶。不過金昌業對中國充滿的好奇，讓他透過譯官與中國人、中國文物接觸。雖然我們可以看到金昌業對譯官有何負面的觀感，不過他也從譯官得到協助，而在北京有很多機會見聞，讓金昌業改變了對清朝的誤解。這是因為金昌業對中國人、中國文物等仍保有開放的態度，讓他能夠和更多階層的中國人接觸，這更改變了他對中國人的看法，即清人對事情心胸寬大的態度都是朝鮮人需要學習的。另外，金昌業長久以來接觸許多中國物品，再就其兄弟對中國物品的態度和嚮往可見，也許金昌業也對中國已具有同一種觀感存在。我們可以見到金昌業在回往朝鮮路程中的山川遊覽，即金昌業從前人在中國的山川遊覽的書籍中想像的中國，具有燕行的機會親自見聞，將這些內容寫在他的燕行紀錄中，引起了朝鮮文人社會中對中國的新看法，更導致了學習清朝的北學觀念。

金昌業在與中國人的交流上，非常擅於運用這些朝鮮物品，而除了買賣東西以外，我們還可以在這看出金昌業對中國人、事、物的強烈好奇心，總是盡其所能地利用身邊的朝鮮物品與清朝人先建立關係、交換書籍等，以得到想要的中國物品或難得的各種中國經驗。而且，金昌業在中國摹寫中國畫、畫肖像、並帶鄭澈的畫作給中國人，從這些行為可看出金昌業對中國文化、文物抱尊敬態度的一面。這些對中國的態度，來自金昌業家庭燕行的經驗、前者的燕行記錄等，種種已經接觸的中國印象有關。尤其是，金昌業在中國以物品的交流中呈現出來的態度，影響到十八世紀後期以來的朝鮮文人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徐有聞、韓弼教等的文人世界，更進一步引起了學習清朝的「北學」思想。

原來本文的討論除了金昌業的個人背景以外，還想要找出他屬於畫家的面貌，尤其是針對金昌業與鄭澈之間的互動關係，及金昌業對藝術品的鑑賞能力等。不過，本文很可惜沒有機會帶到這方面的討論。另外，煙竹、火鐵、鞘刀等朝鮮物品也曾出現在《老稼齋燕行日記》中，不過由於筆者能力有限，短期之內無法掌握到充足的相關文獻；所以，沒有深入研究到這些項目，盼日後會有更精彩的相關研究出現。



引用/參考書目

(本文書目依類別及發表語言別爲序)

一、傳統文獻

(一) 漢文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篇》，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宋應星著，鍾廣言注譯，《天工開物》，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明)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譯，《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2004。
- (清)汪灝等撰，《廣群芳譜一百卷》，合肥：安徽教育，2002。
- (清)張茂節修；(清)李開泰等纂，(康熙)《大興縣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據清康熙二十四(1685)年修烏絲欄清鈔本，2002。
- 朴趾源，《熱河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4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
- 李肯翊，《燃藜室記述》，收入《國譯燃藜室記述》第12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67。
-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首爾：首爾大學校古典刊行會，1977。
-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
- 金昌業，《老稼齋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176輯，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 金昌集，《夢窩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159輯，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 金昌翁，《三淵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166、167輯，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 金祖淳，《楓臯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90輯，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6。
-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1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
-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42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
- 崔德中，《燕行錄》，收入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刊，《燕行錄選集》下卷，首爾：第一寫真製版社印，1962。
-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太宗實錄》，首爾：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
-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景宗實錄》，首爾：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
-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宣祖實錄》，首爾：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
- 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肅宗實錄》，首爾：朝鮮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
- 鄭昌順等編，《同文彙考》七十九卷，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1980。

閨章閣資料叢書官署志篇，《通文館志》，首爾：首爾大學校閨章閣韓國學研究院，2006。
韓弼教，《隨槎錄》，收於《燕行錄選集·補遺》中卷，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2008。

（二）韓文


徐有聞，《戊午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63 冊，首爾：東國大學出版部，2001。

崔 豈，《簡易集》，收入崔豈著、Lee Sungmin 編，《國譯簡易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委員會，2002。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1、中文

- 
- 朱云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
李山竹，《古代朝鮮文獻解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李孝聰，《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聯經出版公司，2007。
吳哈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松浦章，《明清時代中國與朝鮮的交流：朝鮮使節與飄着船》，台北：樂學書局，2002。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陳尙勝，《中韓關係史論》，濟南：齊魯書社，1997。
陳尙勝，《朝鮮王朝（1392~1910）對華觀的演變—《朝天錄》和《燕行錄》初探》，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9。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1619—1643》，台北：三民書局，2000。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富 麗，《康乾時期北京人的社會生活》，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楊昭全，《中韓關係史論文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
楊昭全、孫玉梅，《中國—朝鮮·韓國關係史》，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楊昭全、何彤梅，《中韓關係史論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劉 爲，《清代中朝使者往來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2002。

閻雲翔，李放春、劉瑜譯，《禮物的移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臺灣韓國研究學會編，《中韓關係史論文集》，台北：台灣韓國研究學會，1983。

2、韓文

Kum, Bok-hyen，《傳統부채》（傳統扇子），首爾：Daewonsa，2006。

高蓮姬，《朝鮮後期山水紀行藝術研究》，首爾：一志社，2001。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朝鮮時代文房諸具》，首爾：通川文化社，1992。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朝鮮時代風俗畫》，首爾：韓國博物館會，2002。

國立中央博物館編，《朝鮮時代肖像畫》國立中央博物館韓國書畫遺物圖錄第 15 輯，首爾：韓國博物館會，2007。

金學主，《朝鮮時代刊行中國文學關係書研究》，首爾：首爾大學出版部，2000。

尹忠男，《哈佛燕京圖書館韓國貴重本解體》五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4。

尹忠男，《哈佛燕京韓國館資料研究》，首爾：景仁文化社，2004。

李哲成，《朝鮮後期對清貿易研究》，首爾：國學資料院，2000。

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

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

崔韶子，《明清時代中韓關係史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1997。

崔韶子教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東亞시아歷史속의中國과韓國》（東亞歷史中的中國與韓國），（首爾：西海文集出版社，2005）。

崔韶子、鄭惠仲、宋美玲點校，《十八世紀燕行錄과中國社會》（十八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首爾：Hyeon 出版社，2007。

鄭 珉，《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の發現》（十八世紀朝鮮知識分子的發現），首爾：Humanist 出版社，2007。

諸洪圭，《韓國書誌學辭典》，首爾：景仁文化社，1974。

3、日文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日鮮關係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

夫馬進編，《使琉球錄解題及研究》，沖繩：榕樹書林，1999。

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中國東亞外交交流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

岩井茂樹編，《中国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中國近世社会的秩序形成），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4。

岩井茂樹、榕樹書林共著，《使琉球錄改題および研究》（《使琉球錄》改題及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1999。

林春勝、林信篤，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3冊，東京：東方書店，1981。

- 金泰俊，《虚学から実学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從虛學到實學——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的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1988。
- 東京大学文学部編，《明代満蒙史料：李朝実録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 東亜研究所編，《異民族の支那統治研究：清朝の邊疆統治政策》（異民族的中國統治研究：清朝的邊疆統治政策），東京：至文堂，1944。
-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朝貢體系與近代亞洲），東京：岩波書店，1997。
- 藤塚鄰，《日鮮清の文化交流》（日鮮清的文化交流），東京：中文館書店，1947。
- 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清朝文化東傳的研究——嘉慶・道光學壇與李朝金阮堂），東京：国書刊行會，1975。

4、英文

- Brook, Timothy.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Brook, Timothy.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Distributed to the trade by Macmillan, 2008.
- Clunas, Craig.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 Clunas, Craig. *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1470-1559*. London: Reaktion, 2004.
- Davis, Natalie Zemon. *The Gif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Kim, Hongnam. *Korean Ar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plendor and Simplicity*. New York: Weatherhill: Asia Society Galleries, c1993.
- Smith, Judith G. *Arts of Kore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9.

（二）論文

1、中文

- 王汎森，〈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第1號（大阪，2008.3），頁93-96。
- 王政堯，〈18世紀朝鮮「利用厚生」學說與清代中國——《熱河日記》研究之一〉，《清史研究》第3期（北京，1999），頁31-37、73。
- 王政堯、赫曉琳，〈簡論《燕行錄》與清代中朝文化交流〉，《韓國學論文集》第7期（北京，1998），頁320-327。
-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十八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收入尹忠男編，《哈佛燕京韓國館資料研究》，首爾：景仁文化社，2004，頁

135-171。

- 王鴻泰，〈迷路的詩——名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0（臺北，民國94年12月），頁1-54。
- 全紅，〈朝鮮文學家朴趾源的北學派實學思想矛盾探析——以《許生傳》和《熱河日記》為例〉，《延邊教育學院學報》，20：6（延吉，2006.12），頁13-20。
- 任桂淳，〈試論十八世紀清文化對朝鮮的影響——以李朝出使清朝的使節問題為中心〉，《清史研究》第4期（北京，1995），頁28-39。
- 吳士英，〈論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特點〉，《山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濟南，2000），頁57-68。
- 李敦球，〈論十八世紀后期朝鮮進步文人的中國外交使行〉，《世界歷史》第3期（北京，1998），頁81-88。
- 李巖，〈樸趾源《熱河日記》的北學意識和實業方略〉，《東疆學刊》第1期（延吉，2007），頁1-6。
- 李巖，〈樸趾源《熱河日記》的實學精神和文藝觀探析〉，《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延吉，2007），頁25-29、83。
- 朴現圭，〈朝鮮使臣與北京琉璃廠〉，《文獻》第1期（北京，2003.1），頁269-285。
- 何炎泉，〈中國古代之高麗紙〉，《中華文物學會年刊》（臺北，2009.3），頁106-109。
- 祁慶富、金成南，〈清代北京的朝鮮使館〉，《清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4.8），頁107-114。
- 苗威，〈華夷觀的嬗變對朝鮮王朝吸收中國文化的影響〉，《東疆學刊》第3期（延吉，2002），頁67-71。
- 孫衛國，〈《朝天錄》與《燕行錄》——朝鮮使臣的中國使行紀錄〉，《中國典籍與文化》第1期（北京，2002），頁74-80。
- 張存武，《清太宗時代的滿鮮關係》，臺北：臺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56。
-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4：5（臺北，1967.1）。
- 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7）。
- 曹力強，〈清政府對朝鮮海關的控制〉，《東北師大學報》，154：2（長春，1995），頁47-51。
- 陳尙勝，〈論17-19世紀朝鮮王朝的清朝觀演變〉，《韓國學報》第16期（台北，2000），頁89-102。
- 黃美子、禹尙烈，〈朝鮮燕行使與中國琉璃廠〉，《東疆學刊》，21：2（延吉，2004.4），頁10-13。
- 廉松心，〈十八世紀中韓文人學士之間的友好交流〉，《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7：2（吉林，2006.2），頁49-53。
- 廉松心，〈《熱河日記》與清代民族政策研究〉，《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8：3（吉林，2007.2），頁70-74。

- 梁泰鎮，〈《朝鮮王朝實錄》所見明清時代圖書傳入論考〉，《當代韓國》第1期（北京，1998），頁56-59。
- 陽雨蕾，〈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玻璃廠〉，《中國典籍與文化》第4期（北京，2004），頁55-63。
-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第10期（開封，2005），頁41-48。
- 葛兆光，〈想象異域悲情——朝鮮使者關於季文蘭題詩的兩百年遐想〉，《中國文化》第22期（北京，2006），頁138-145。
-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第1期（上海，2006），頁29-58。
- 葛兆光，〈鄰居家里的陌生人——清中葉朝鮮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傳教士〉，《中國文化研究》第2期（北京，2006），頁1-11。
- 葛兆光，〈攬鏡自鑒——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上海，2008），。
- 廖振旺，〈初論乾隆朝北京城書籍市場的分佈與貨源——以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為中心的探討〉，《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6（臺北，2006.12），頁53-100。
- 劉為，〈清代中朝宗藩關係下的通使往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0：3（北京，2000.9），頁25-36。
- 劉為，〈朝鮮赴清朝使團的文化交流活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0：3（北京，2001.9），頁74-82。
- 劉廣銘，〈《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康熙形象——兼與同時期歐洲語境中的康熙形象比較〉，《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9：2（洛陽，2006.3），頁119-123。
- 劉廣銘，〈《老稼齋燕行日記》中的滿族人形象——兼與其中的漢族人形象比較〉，《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1：2（吉林，2008.4），頁45-50。
- 劉靜，〈從《燕行錄》看十八世紀中國北方市集——兼論中朝文化交流與文化差異〉，《北京社會科學》，第3期（北京，2006），頁34-38。
- 鄭錫元，〈華夷觀念在朝鮮〉，《韓國中國學會》，44（首爾，2001.12），頁441-466。

2、韓文

- 夫馬進，〈東亞의 觀點에서 본 清史研究：清史工程을 中心으로；1609年 日本의 琉球 併合以後中國、朝鮮對琉球外交-東亞4國의 冊封、通信 그리고 杜絶〉（從東亞 觀點看清史研究：以清史工程為中心；1609年日本琉球併合以後中國、朝鮮對琉球外交-東亞4國的冊封、通信和杜絶），《梨花史學研究》，37（首爾，2008），頁1-41。
- 丘凡真，〈清의 朝鮮使行人選과 「大清帝國體制」〉（清對朝鮮使行人選和大清帝國體制），《（首爾大學校）人文論叢》，59（首爾，2008.6），頁179-228。

- 尹忠男，〈哈佛燕京圖書館韓國學資料의現況과展望〉（哈佛燕京圖書館韓國學資料的現況與展望），《國學研究》第2號，（首爾，2003春、夏），頁149-182。
- 尹景喜，〈十八世紀初壯洞金氏일문의燕行體驗——金昌集《燕行墳簾錄》을中心으로〉（十八世紀初壯洞金氏家族的燕行體驗——以金昌集《燕行墳簾錄》爲中心），《漢字漢文教育》，19（首爾，2007），頁325-349。
- 尹景喜，〈金昌業의燕行文學에나타난瀋陽〉（金昌業燕行文學中描述的瀋陽），《韓國語言文學》，67（首爾，2008），頁299-318。
- 白玉敬，〈朝鮮前期使行일무역研究：赴京使行을中心으로〉（朝鮮前期使行私貿易研究：以赴京使行爲中心），《歷史文化研究》，25（首爾，2006.12），頁3-40。
- 白玉敬，〈《壬戌使行錄》에나타난譯官의活動과日本認識〉（從《壬戌使行錄》看譯官的活動與日本認識），《韓國思想史學》，26（首爾，2006），頁233-273。
- 朴元燾，〈近代以前中韓關係史에대한視覺과論點：東亞시아國際秩序의理論을덧붙여〉（關於近代以前中韓關係史的視覺與論點：加以東亞國際秩序的理論），《韓國史市民講座》，40：1（首爾，2007），頁40-58。
- 朴智鮮，〈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研究〉，首爾：高麗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1996。
- 朴銀順，〈朝鮮後期寫意的真景山水畫의形成과展開〉（朝鮮後期寫意的真景山水畫的形成與展開），《美術史研究》，16（首爾，2002.12），頁333-363。
- 宋美玲，〈想像속의中國——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을통해본淸潮의統治〉（想像中的中國——從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看淸潮的統治），收入崔韶子教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東亞歷史中的中國與韓國》，京畿：西海文集，2005，頁145-165。
- 李弘斗，〈十七世紀對淸交易에관한연구〉（關於十七世紀對淸交易研究），《國史館論叢》，81（首爾，1998.10），頁73-110。
- 李垞丘，〈壯洞金門文의物收容論과藝術活動〉（壯洞金門文對物收容論和藝術活動），《韓國學報》，29：3（首爾，2003，秋），頁138-167。
- 李哲成，〈1798年冬至使行을 통해 본 對淸貿易의 실상〉（從1798年冬至使行看清貿易的真相），《（首爾大學校）人文論叢》，3（首爾，1999.2），頁261-280。
- 李哲成，〈十八世紀後半朝鮮의 對淸貿易實態와 私商層의 성장——帽子貿易을 中心으로〉（十八世紀後半朝鮮對淸貿易實態和私商層的成长——以帽子貿易爲中心），《韓國史研究》，94（首爾，1996），頁113-150。
- 李哲成，〈朝鮮後期貿易商인과 政府의 일무역 대책——使行貿易을 中心으로〉（朝鮮後期貿易商人和政府對私貿易政策——以使行貿易爲中心），《史叢》，58（首爾，2004.3），頁83-117。
- 李泰浩，〈謙齋鄭敦의家系와生涯—그의家庭과行跡에대한再檢討〉（謙齋鄭敦的家系

- 與生涯—他的家庭和行跡再檢討》，《梨花史學研究》第 13、14 合輯（首爾，1983），頁 83-93。
- 李泰浩，〈朝鮮後期有利家門의一例：壯洞金門을中心으로〉（朝鮮後期有利家門의一例：以壯洞金門爲中心），《奎章閣》，26（首爾，2003），頁 133-150。
- 李敬子，〈老稼齋燕行日記小考〉，《漢城語文學》，3（首爾，1984），頁 159-171。
- 李萬烈，〈十七~八世紀史書與古代史認識〉，《韓國的歷史認識》（首爾：창작과비평社，1997）。
- 林基中，〈燕行錄의對清朝意識과對朝鮮意識〉（從燕行錄看對清朝意識與對朝鮮意識），收入韓國實學思想論文選集補遺篇，《兩亂以後的思想界》第二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4，頁 321-356。
- 金暎綠，〈朝鮮初期通事의活動과 위상變化〉（朝鮮初期通事的活動其地位變化），《韓國學報》，101（首爾，2000.12），頁 53-91。
- 金暎綠，〈朝鮮時代朝貢體制와對中國使行〉（朝鮮時代朝貢體制及對中國使行），《明清史研究》，30（首爾，2008.10），頁 91-128。
- 金明昊，〈熱河日記研究〉，首爾：首爾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1989。
- 金聖七，〈燕行小攷：朝中交涉史의일착〉（燕行小攷：關於朝中交涉史初談），《歷史學報》，12（首爾，1960.5），頁 1-79。
- 金三基，〈朝鮮後期製紙手工業研究〉，首爾：中央大學校史學科博士論文，2003。
- 金賢漢，〈十八世紀《燕行錄》的展開及特性研究〉，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2004。
- 孫承喆，〈朝鮮後其實學思想과對外認識〉（朝鮮後其實學思想與對外認識），《朝鮮學報》，122（首爾，1987），頁 33-52。
- 俞俊英，〈《谷雲九曲圖》을中心으로 본實景圖發展의一例〉（從《谷雲九曲圖》爲例看實景圖發展的一例），《精神文化研究》，8（城南，1980.12），頁 38-46。
- 洪善杓，〈朝鮮初期繪畫觀〉，《第三屆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城南：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5），頁 597-614。
- 高蓮姬，〈鄭澈의真景山水畫와明清代山水版畫〉（鄭澈真景山水畫與明清代山水版畫），《美術史論壇》，9（首爾，1999.11），頁 137-162。
- 高蓮姬，〈朝鮮時代詩箋紙版畫考察〉，《美術史學報》，23（首爾，2004.12），頁 253-285。
- 陳寧寧，〈朝鮮朝實學派文學과清代文化의關聯性研究：十八世紀를中心으로〉（朝鮮朝實學派文學及清代文化的關聯性研究：以十八世紀爲中心），首爾：建國大學校國語國文學博士論文，1988。
- 崔耕宛，〈朝鮮後期對清繪畫交流와清繪畫樣式의受容〉（朝鮮後期對清繪畫交流與清繪畫樣式的受容），首爾：弘益大學校美術史學碩士論文，1996。
- 崔韶子，〈十八世紀後半朝鮮知識人朴趾源의對外認識：《熱河日記》를통해서본乾隆年間的中國〉（從十八世紀後半朝鮮知識人朴趾源的對外認識：從《熱河日記》看乾隆年間的中國），《韓國文化研究院論叢》，61（首爾，1992）。

1)，頁 273-313。

- 崔韶子，〈清과朝鮮：明清交替期東亞國際秩序에서〉（清與朝鮮：明清交替期東亞國際秩序），《梨花史學研究》，22（首爾，1995. 12），頁 183-196。
- 崔韶子，〈十八世紀後半『燕行錄』을 통해 본 朝鮮知識人의 對中國認識〉（從十八世紀後半從『燕行錄』來看朝鮮知識人對中國認識），《國史館論叢》，76（首爾，1997. 10），頁 191-223。
- 崔韶子，〈十八世紀末東西洋知識人의 中國認識比較：朴趾源의 《熱河日記》와 G. Macartney 의 《中國訪問使節日記》을 中心으로〉（從十八世紀末東西洋知識人的中國認識比較：以朴趾源的《熱河日記》及 G. Macartney 的《中國訪問使節日記》爲中心），《東洋史學研究》，59（首爾，1997），頁 1-39。
- 崔韶子，〈明清文化와 朝鮮〉（明清文化與朝鮮），《梨花史學研究》第 25、26 合輯（首爾，1999），頁 15-30。
- 崔韶子，〈明清代文獻의 朝鮮認識〉（明清代文獻的朝鮮認識），《梨花史學研究》，28（首爾，2001. 12），頁 79-103。
- 崔韶子，〈明清時代對外關係의 成國와 課題〉（明清時代對外關係的成國及課題），《明清史研究》，19（首爾，2003. 10），頁 33-61。
- 崔韶子，〈朝鮮後期先進朝鮮知識分子의 中國訪問과 交流〉（朝鮮後期先進朝鮮知識分子的中國訪問及交流），收入崔韶子教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東亞시아 歷史속의 中國과 韓國》，京畿：西海文集，2005，頁 101-124。
- 鄭弘俊，〈朴趾源對中國世界認識：「熱河日記」를 中心으로〉（朴趾源對中國世界認識：以「熱河日記」爲中心），《韓國思想史學》，18（首爾，2002），頁 23-46。
- 鄭恩主，〈朝鮮時代明清使行關聯繪畫研究〉，城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博士論文，2008。
- 鄭恩主，〈燕行使節對西洋畫認識及와 寫真術之의 傳入：北京天主堂을 中心으로〉（燕行使節對西洋畫認識及寫真術之傳入：從北京天主堂爲中心），《明清史研究》，30（首爾，2008.10），頁 157-199。
- 鄭惠仲，〈十八世紀朝鮮士人의 北京之旅〉（十八世紀朝鮮士人的北京之旅），收入崔韶子教授退休論叢刊行委員會，《東亞시아 歷史속의 中國과 韓國》，京畿：西海文集，2005，頁 125-144。
- 權乃鉉，〈十七世紀後期~十八世紀前期平安道對清使行 지원〉（從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前期平安道對清使行支援），《朝鮮時代史學報》，25（首爾，2003），頁 145-172。

3、日文

- 伍 躍，〈朝貢關係と情報收集〉（朝貢關係與情報收集），《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185-221。

- 一ノ瀬雄一，〈清代瑠璃廠書肆に関する一考察——朝鮮使節の記録を中心に——〉（關於清代瑠璃廠書肆的考察——以朝鮮使節記錄爲中心），《史泉》，67（関西，1989），頁 25-39。
- 夫馬進，〈趙憲《東還封事》にみえる中国報告〉（從趙憲《東還封事》看中国報告），收入谷川道雄編，《中国邊境社會の歴史的研究》，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89，頁 53-70。
- 夫馬進，〈萬曆二年朝鮮使節の中華国批判〉（萬曆二年朝鮮使節的中華国批判），收入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委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 547-569。
- 夫馬進，〈閔鼎重《燕行日記》にみえる王秀才問答について〉（從閔鼎重《燕行日記》看關於王秀才問答），收入河内良弘編，《清朝治下の民族問題と国際關係》，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91，頁 71-94。
- 夫馬進，〈日本現存朝鮮燕行錄解題〉，《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42（京都，2003），頁 127-238。
- 夫馬進，〈明清中国による対朝鮮外交の鏡としての対ベトナム外交——冊封問題と「問罪の師」を中心に〉（明清中国作爲對朝鮮外交之鏡的對越南外交——以冊封問題與「問罪之師」爲中心），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会，2007，頁 225-252。
- 夫馬進，〈明清中国の対朝鮮外交における「礼」と「問罪」〉（明清中國對朝鮮外交中「礼」和「問罪」），收入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会，2007，頁 311-353。
- 松浦章，〈明朝末期の朝鮮使節の見た北京〉（明朝末期朝鮮使節所見之北京），收入岩見弘等編，《明末清初史の研究》，京都：明文舎，1989，頁 97-129。
- 松浦章，〈明清時代北京の會同館〉（明清時代北京的會同館），收入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編纂委員會編，《清朝と東アジア：神田信夫先生古稀記念論集》，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頁 359-379。

4、英文

- Yi, Song-mi. "Artistic Tradition and the Depiction of Reality: True-View Landscape Painting of the Choson Dynasty," in *Arts of Korea*, fro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ed. Judith G. Smith(exh. Cat., New York: June 9, 1998-January 24, 1999), pp. 331-365, 461-468.

圖片出處

圖一：金昌業，《秋江晚泊圖》，紙本水墨，18.5×20.5cm，首爾，潤松美術館藏。
來源：<http://blog.naver.com/anathema81?Redirect=Log&logNo=110037049021>（下載日期：2009.7.23）。

圖二：燕行路程圖

來源：林基中，《燕行錄研究》，首爾：一志社，2006，頁 83。

圖三：《白頭山境界碑拓本》，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藏。

來源：崔韶子、鄭惠仲、宋美玲點校，《十八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十八世紀燕行錄與中國社會），首爾：HYEAN 出版社，2007，頁 60。

圖四：《白頭山境界碑拓本復原圖》，金澤，金澤大學藏。

來源：<http://blog.daum.net/sabul358/18321758>（下載日期：2009.7.23）。

圖五：《天工開物》造紙圖

來源：（明）文震亨著，海軍、田君注譯，《長物志圖說》，濟南：山東畫報，2004，頁 368。

圖六：僧頭紅摺扇

來源：Kum Bok-hyen，《傳統扇子》，首爾：Daewonsa，2006，頁 65。

圖七：金昌業《宋時烈肖像》

來源：<http://blog.naver.com/bfyoon?Redirect=Log&logNo=50054084288>（下載日期：2009.7.23）。

圖八：鄭澈，〈讀書餘暇〉，《京郊名勝帖》，1740-41 年，首爾，潤松美術館藏。

來源：國立中央博物館編，《朝鮮時代風俗畫》，首爾：韓國博物館會，2002，頁 36。

圖九：鄭澈，〈金剛山圖〉1734 年，紙本水墨淡彩，130×94cm，龍仁，湖巖美術館藏。

來源：Kim, Hongnam. *Korean Art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plendor and Simplicity*. New York: Weatherhill: Asia Society Galleries, c1993, p. 65.